古族新考

余太山 著





http://www.cp.com.cn



古族新考

余太山　著

商务印书馆

2012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族新考/余太山著.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2
ISBN 978 - 7 - 100 - 08490 - 1

Ⅰ.①古… Ⅱ.①余… Ⅲ.①古代民族－民族歷史－
研究－中國 Ⅳ.①K28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145859號

古族新考

余太山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三河市尚藝印裝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8490 - 1

2012年6月第1版　　開本 880×1230　1/32
201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張8 7/8

定價：25.00圓

目錄

下卷

再版緒說

再版增加總論一篇，旨在指出這樣一種可能性：操 Toχrï 語之族群卽楔形文字資料中常見的 Guti 人和 Tukri 人；其人在公元前三千紀末或更早離開波斯西部，踏上東來征途，部份到達中國者就是可溯源於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的允姓、大夏和禺知，後三者應卽西史所見 Sakā 部落 Asii、Tochari 和 Gasiani 之前身。

緒說

本書旨在勾勒少昊氏、陶唐氏、有虞氏的遷徙過程，以構建關於“塞種”諸部淵源的假說。

《漢書·西域傳》所見“塞種”，應卽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Darius I, 前 521—前 486 年）貝希斯登（Behistum）銘文所見 Sakā 人，主要包括四個部落：Asii、Tochari、Gasiani 和 Sacarauli。

公元前七世紀末葉，Asii 等部已出現在伊犂河、楚河流域。遲至公元前六世紀二十年代末，Asii 等部西向擴張至錫爾河北岸。此後，他們被波斯人稱爲 Sakā。

約公元前 177 / 前 176 年，由於大月氏人西遷，塞種被迫放棄伊犂河、楚河流域，一部份南下，散處帕米爾各地，亦東向進入塔里木盆地諸綠洲。

公元前 140 年左右，塞種渡錫爾河南下，一支進入 Ferghāna，一支進入 Bactria，建立了《史記·大宛列傳》所見大宛國和大夏國。大概在此同時，另一支塞種順錫爾河遷往鹹海乃至裏海沿岸，《史記·大宛列傳》將這一支塞種稱爲奄蔡，而將留在錫爾河北岸

的塞種稱爲康居。

公元前130年，烏孫人在匈奴人的支援下，遠征大月氏，戰而勝之，奪取了伊犂河、楚河流域。大月氏人再次西遷至阿姆河流域，擊敗大夏，佔領其地。《史記·大宛列傳》的烏孫國和大月氏國於是成立。

公元前七世紀末出現在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塞種諸部可能來自東方。Asii、Tochari、Gasiani 和 Sacarauli 之前身可能就是先秦典籍所見允姓之戎、大夏、禺知（禺氏）和莎車。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稱霸西戎，拓地千里，或因此引起諸部的西向遷徙。

允姓之戎、大夏、禺知（禺氏）可分別溯源於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

少昊氏原居若水，史稱允姓國；後遷往魯北窮桑。少昊氏之裔有一支居鄀，其中遷往瓜州者史稱“允姓之姦”。允姓之姦除若干內徙外，餘衆西走，抵達伊犂河、楚河流域者成爲塞種之一部，停留在今哈密以西者便是烏孫。

陶唐氏是以堯部落爲核心、包括被堯部落征服的有唐氏在內的部落聯合體；“陶唐氏”一名得自有唐氏。晉南的大夏之虛應爲陶唐氏或有唐氏之遺蹟。陶唐氏有一支後來經由河西遷至伊犂河、楚河流域，成爲塞種之一部。

有虞氏之祖爲顓頊。顓頊始居若水，後東遷窮桑，取代少昊，復隨舜自魯遷至晉南。舜亡後，部份有虞氏踏上遷徙之途，一支北遷，發展爲月氏，另一支經河西來到伊犂河、楚河流域，成爲塞種之一部。

此外，據希羅多德《歷史》的有關記載可以考知，Asii、Tochari 和 Gasiani 等西遷伊犂河、楚河流域即《漢書·西域傳》所謂“塞地”是被 Arimaspi 人驅逐的結果，而 Arimaspi 人可以指爲秦穆公所逐緄戎。緄戎與犬方、鬼方、𢀛方、獫狁、犬戎、匈奴同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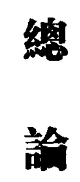
相傳少昊爲己姓青陽，堯之祖爲姬姓青陽，有虞氏之祖爲昌意。二青陽及昌意均黃帝之子，而與緄戎、鬼方、犬戎、匈奴等同源的鬼國即一目國據傳出自少昊。這就是說上述諸部均可歸屬黃帝系統。

必須說明，《漢書·西域傳》所見“塞種”，雖係 Sakā（Sacae）之對譯，但不能將“塞種”與 Sakā（Sacae）完全等同起來。Sakā（Sacae）是波斯人對錫爾河以北遊牧部落的泛稱，並非某一部落的專稱。對於西方銘文、文獻所見 Sakā（Sacae）的內涵應作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例如大流士一世納克澤·羅斯塔姆（Naqš-e Rostam）銘文 a 中提到的“海對面的 Sakā 族”應該是黑海以北的斯基泰人，希羅多德所謂 Sacae 則可能指 Massagatae 人。而按之時間和地點，“塞種”似乎應即希羅多德所謂 Issedones 人。這 Issedones 人很可能是由於逐走了 Massagatae 人，西向擴張到錫爾河北岸後，纔被稱爲 Sakā 的。因而，不能根據已知其他 Sakā（Sacae）部落的人種、語言推論“塞種”四部的人種、語言。

另外，《史記·大宛列傳》稱：“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顫。”既然“自大宛以西至安息”這一範圍包括了奄蔡、大夏、大月氏、康居諸國，安

息人又無疑是歐羅巴種，則 Asii、Tochari、Gasiani 和 Sacarauli 也可能是歐羅巴種。而如果本書關於塞種淵源的假說成立，則似乎還不妨進一步認爲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同樣有歐羅巴種的嫌疑。然而這一推論有待考古學、語言學、人類學、遺傳學等方面證據的支援，故本書於此存而不論。

何謂考據？一言以蔽之曰：擺可能性。不言而喻，將所有可能性一一臚列是不可能的，在不少情況下，考據者所能做的不過是示例而已。

總論

吐火羅問題

吐火羅語文書的發現和對吐火羅語以及有關歷史地理問題的研究，既是比較歷史語言學界的大事，也是中亞學界的大事。蓋自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在我國西北地區出土的古文書殘卷中，有若干以當時未知語言寫成，其一卽“Toχrï 語”，定名之前一度被稱爲“第一種語言”。[1] 定名的依據是回鶻文《彌勒會見記》（Maitreyasamitinātaka）的一則題記。該題記稱此記乃自 Toχrï 語文本譯爲突厥語（Türk）者，而 Toχrï 語文本乃由聖月（Aryač(a)ntrï）自印度語（Äntkäk）編譯而成。既然“第一種語言”的《彌勒會見記》有若干寫本的原編譯者正是聖月，可見這“第一種語言”應卽 Toχrï 語。[2]

大部份殘存的 Toχrï 語資料是譯自梵語等的佛教文獻，年代在公元 500—800 年間。經研究，Toχrï 語屬印歐語系，且有 A 和 B 兩種方言，兩者的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相同或相似。A 方言被回鶻人稱爲 Toχrï 語，其本名則爲 Ārśi 語。[3]Ārśi 卽“焉耆”（Ārgi）之突厥語譯。[4]B 方言則被回鶻人稱爲 Küsän 語。Küsän 卽“龜兹”

(Kučā, Kuči) 之突厥語譯。[5]A 種方言主要流行於焉耆及高昌一帶，而 B 種方言則集中在龜茲，亦見於焉耆等地。

若干語言特徵表明（如：數詞 100 在 A 和 B 兩種方言中分別作 känt 和 kante，等於拉丁語的 centum），Toχrï 語屬於 centum 語組。[6] 其發祥地當在歐洲，與凱爾特語及其以東的日耳曼語、希臘語、波羅的語等有較密切的關係。[7] 這似乎表明操 Toχrï 語之族群在非常早的時代就脫離了印歐語系共同體，在經過長途跋涉後，有一部份東向進入了中國境内。

Toχrï 語的情況果如前述，就不僅給語言學家，也給歷史學家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釋的問題。

其一，不管操 Toχrï 語的族群起源於何處，既然它很早就來到中國，應在中國史籍中留下印蹟。換言之，他們究竟是以什麽名稱出現在中國史籍中的?

其二，果如多數學者所指，原始印歐語系部落起源於西方 [8]，則操 Toχrï 語的族群是何時、大致沿著什麽路線東遷到達中國及其西北地區的?

其三，“Toχrï”一名究竟何指? 按之對音，無妨視爲“Θογαρ, Θαγουρ-、Τοχαρ-、Tuχār、Təχwār、Tukhār-”，亦卽漢語“吐火羅”之對音。果然，操這種語言的族群和 Sacae（塞種）是什麽關係? 蓋據 Strabo（XI，8)，Tochari 係 Sacae 部落之一

其四，“Toχrï”果卽 Tochari，何故同時代 Tokharestan 以及其他 Tochari 人活動地區居民的語言並不操 Toχrï 語? 尤其是被稱爲“吐火羅斯坦”地區（《大唐西域記》卷一所謂“覩貨邏國故地”）

的居民的主要語言可能是伊朗語[9]，無疑不同於 Toχrï 語。[10] 玄奘的時代去出土 Toχrï 語文書的年代不遠，如果玄奘所記阿耆尼國和屈支國居民的語言分別是 Toχrï 語 A 和 B 兩種方言，則玄奘所記“覩貨邏國”的語言又該如何解釋?

其五，A 方言已有本名，回鶻人何故還稱之爲“Toχrï 語”？

其六，既然 B 方言被回鶻人稱爲 Küsän 語，且有譯自 Küsän 語之 Toχrï 語文獻，如《十業道譬喻鬘》（Daśakarmapathāvadānamālā）等，[11] 足見兩種方言有較大的區別，然則操 A、B 兩種方言之族群又是什麼關係?

以上六個問題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個問題，回答這個問題，中國學者責無旁貸。本篇是我有關上述諸問題的一些思考，以第一個問題爲核心。

引起我們注意的是 Toχrï 語有多種方言。這應該是操這種語言之族群的分化導致的，因而操 Toχrï 語的族群可能以若干不同的名稱出現，不僅不同方言的族群可能有不同的名稱，操同一種方言的人亦可分屬不同的集團，從而具有不同的名稱。換言之，Toχrï 語族群應該具有若干漢語名稱，而能夠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者應予優先考慮:

一、其名稱應能與 Toχrï、Küsän 或 Ārśi 勘同。

二、其人登上中國歷史舞臺的時間足夠早，能與印歐語族的出現相銜接。

三、其語言和體貌特徵爲印歐人種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在先秦典籍中，大致符合以上條件的有大夏、月氏和允姓之戎三者。以下依次敍說這三者的有關情況。

一[12]

1.“大夏”最早見於《左傳》。《左傳·昭元年傳》載：“遷實沈于大夏。”《左傳·定四年傳》載：“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此大夏或夏虛既可能在翼城也可能在虞鄉、平陽或太原。

又，《呂氏春秋·本味篇》稱美“大夏之鹽”，鹽指解池之鹽，此大夏當在安邑。《戰國策·秦策四》稱：“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朝爲天子，天下皆從。”魏都安邑所在本爲夏虛卽大夏之虛。

又，《史記·秦始皇本紀》等有“禹鑿龍門，通大夏”之語，此大夏在鄂，近龍門。《世本》稱唐叔虞“居鄂”，亦因其地有大夏之虛。

又，《史記·吳太伯世家》：“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此夏虛在大陽。

以上文獻所見大夏或夏虛應卽卜辭所見土方。“土方”之“土”[tha]不妨視爲“大夏”[dat-hea]之“大”，“土［方]”是“大夏”的省稱。兩者地望相同，均在殷之西北，亦卽晉南。卜辭有“唐”或“唐土”亦卽大夏。“唐”[dang]、“土”乃同名異譯。武

丁曾封築大邑於唐土以鎮壓土方。

《詩·商頌·長發》稱“禹敷下土方”,《楚辭·天問》稱“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知禹曾治理土方。而相傳禹都陽城、平陽、安邑、晉陽。而平陽、安邑、晉陽均可能有大夏之虛。

要之，晉南亦即翼城（今翼城)、虞鄉（今永济)、平陽（今臨汾西)、太原、安邑（今夏縣)、鄂（今臨汾西鄉寧縣)、大陽（今平陸）均有大夏之虛或夏虛，亦即大夏人的遺蹟。

2. 晉南的大夏人後遷至臨夏乃至河西。

《管子·小匡篇》載齊桓公西征“拘泰夏，西服流沙西虞”。同書“封禪篇”亦稱：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這兩則記載中的“大夏”(“泰夏”）應在河西。

又,《穆天子傳》(卷四）稱穆天子西征曾經由“西夏氏”之地。“西夏”即大夏，其地亦在河西。稱爲“西夏”，因大夏之故地更在其東。《穆天子傳》成書年代當早於前三世紀，所描述的時代至遲爲春秋，故所載“西夏”或即齊桓公所征討的大夏。此外,《呂氏春秋·古樂篇》等亦載往赴昆侖（今阿爾泰山）需經由大夏。

又,《山海經·北山經》所載敦薨之山和敦薨之水乃指今祁連山和黨河。“敦薨”與“大夏”得視爲同名異譯，上述山水皆因大夏人而得名。可知直至河西走廊西端均曾有大夏人活動。漢代“敦煌”[tuən-huang] 郡應得名於“敦薨”[tuən-xuəng]，亦即得名於“大夏”。

不僅河西曾見大夏活動，更東南的臨夏地區亦有其遺蹟。《漢書·地理志下》載隴西郡有縣名“大夏”。《水經注·河水二》則

載：洮水“左會大夏川水……又東北逕大夏縣古城南”。

除遷往河西外，似乎還有一支大夏人自晉南遷往晉北或河套以北。《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所作“琅邪臺銘”稱：“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其中的地名“大夏”或者便是這支北遷大夏人的遺蹟。

托勒密《地理志》[13]（VI，6）所載Thaguri人、Thaguri山和Thogara城均應位於河西地區，業已由對藏語、和闐語有關文書的研究得以證實。Thaguri、Thogara均得視爲“大夏”的對譯。這可以視作旁證。[14]

3. 晉南的大夏可溯源於陶唐氏，卽以堯部落爲宗主包括有唐氏在內的部落聯合體。

相傳“堯伐有唐”（《鶡冠子·世兵》）後，被封於晉南唐土，故稱“唐侯”，而在繼嚳卽位後，號陶唐氏，是因爲堯或其後裔曾有遷徙之舉，所居之地因而亦得名爲“唐”；或譯稱爲“陶”、爲“唐”，“陶唐氏”一號由此而生。

有唐氏本爲一古國，地在夏虛。唐人之得名於大夏，正如商人之得名於商丘。可見就名稱而言，“唐”卽“大夏”。“陶”[du]、“唐”[dang]均“大夏”之略譯。

堯伐有唐氏後，其胤繁衍遷徙，晉南諸地遂有夏虛卽大夏之虛。當然，其中若干也可能是堯所伐有唐氏之遺蹟。至於鄂地之大夏，很可能便是《逸周書·史記解》所見“西夏”。因被堯所伐，有唐氏有一支西遷至今鄉寧一帶，後被其東鄰所幷；翼城旣在大

夏之西，故稱“西夏”。《逸周書·王會解》有所謂“北唐戎”，或在太原晉陽。陶唐氏或有唐氏有一支北上到達這一帶也未可知。

陶唐氏衰亡後，夏后氏命彭姓之豕韋氏鎮守其地。夏孔甲封陶唐氏之後劉累代豕韋氏守唐土，豕韋氏於殷末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

劉累及其後裔，除服事夏商周者外，有一部份先後踏上了北遷、西徙之路。不妨認爲早在舜繼位之初，這種遷徙的序幕已經揭開。

西遷者已如前述，北遷者可能就是《逸周書·王會解》所載貢“茲白牛”的大夏，亦即同篇所附“伊尹朝獻篇”與“月氏”同列於“正北”的“大夏”。其地當在晉北或河套以北。“琅邪臺銘”所見“大夏”或者也是其遺蹟。

4. 中國史籍所載，除晉南、河西等地之大夏外，還有西域的大夏。據《史記·大宛列傳》等記載可以考知，西域之大夏國位於嬀水（今阿姆河）之南，其人“土著”，約公元前 130 年，被西遷的大月氏人征服。

被大月氏征服的大夏國，一說應即希臘巴克特里亞（Graeco-Bactria）王國。[15] 今案：此說未安。《史記·大宛列傳》載，大夏國“無大君長”，“兵弱，畏戰”。這與已知希臘巴克特里亞的情況不符，且“大夏”非 Bactria 之對譯。[16]

另外，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亡於公元前 140 年左右，也就是說當大月氏西遷阿姆河流域時，該王國已滅亡了十年左右。因此，大月氏征服的大夏國不可能是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

據斯特拉波《地理志》[17]（XI，8）的記載可以考知，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應爲自錫爾河北岸南下的 Sacae（塞種）諸部：Asii、G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因此，大夏應卽 Sacae 四部之一的 Tochari。“大夏”[dat-hea] 可以視爲 Tochari 的確切對譯。由於進入阿姆河流域，原來遊牧的 Tochari 人開始了農耕生活。

《史記·大宛列傳》“無大君長”云云，也許正反映了進入巴克特里亞的塞種各部互不統屬的局面。至於塞種諸部治下的巴克特里亞被稱爲“大夏”，則可能是因爲當時 Tochari 人是諸部名義上的宗主；否則，便是其人佔壓倒多數的緣故。

有學者在指大夏爲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同時，指 Tochari 人爲大月氏，試圖使斯特拉波關於塞種四部從希臘人手中奪取巴克特里亞的記載與《史記·大宛列傳》關於大月氏滅亡大夏的記載相一致。[18] 其實，斯特拉波所載 Tochari 是塞種，塞種和月氏在中國史籍中有明確區分，而且“月氏”與 Tochari 對音也不相符。由此可見大月氏不可能是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 Tochari。滅亡大夏國的大月氏不見載於西史，猶如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不見載於漢史，都是很正常的。

應該指出，Tochari 中國史籍稱之爲“吐火羅”或“吐呼羅”等。而首次將大夏和吐火羅聯繫起來的是《新唐書·西域傳下》：“吐火羅，或曰土豁羅，曰覩貨邏，元魏謂吐呼羅者。居葱嶺西，烏滸河之南，古大夏地。……大月氏爲烏孫所奪，西過大宛，擊大夏臣之。治藍氏城。大夏卽吐火羅也。”此處所述“吐火羅”卽大夏無疑就是《史記·大宛列傳》所載大夏，而顯然有別於大

月氏。[19]

阿姆河流域的大夏人來自伊犁河、楚河流域：據斯特拉波《地理志》（XI，8）的記載可以考知，自錫爾河北岸南下、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的 Asii、Tochari 等四部塞種來自伊犁河、楚河流域（《漢書·西域傳》所謂“塞地”）。塞種佔領這一地區的時間不能確知，但最早可能在公元前六世紀二十年代，亦即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即位（前 521 年）之前。

大月氏被匈奴擊敗、西遷至伊犁河、楚河流域時，將該處的塞種逐走。於是一部份塞種南下帕米爾，另一部分則退縮至錫爾河北岸。很可能由於繼續受到來自東方強鄰的壓力，包括若干 Tochari 人在內的部份塞種終於在公元前 140 年左右南渡錫爾河，經索格底亞那，侵入希臘人統治下的巴克特里亞，佔領了主要位於阿姆河南岸的後來被稱爲吐火羅斯坦的地區，《史記·大宛列傳》所見大夏國於是成立。

可能在部份塞種南下巴克特里亞的同時，另有一支以 Tochari 人爲主的塞種進入費爾幹納盆地，建立了《史記·大宛列傳》所見大宛國。“大宛”[dat-iuan] 亦得視爲 Tochari 之異譯。[20] 南下帕米爾的塞種中，有一部份進入西北次大陸，另有一部份則可能東向進入塔里木盆地諸綠洲，後者之中亦有吐火羅人。《漢書·西域傳》所見西域南北道若干國名和地名，例如：“渠勒”[gia-lek]、“桃槐”[do-huəi]、“渠犁”[gia-lyei]、“單桓”[duat-huan]、“兌虛”[duat-khia]、“丹渠”[tan-gia]，均得視爲 Tochari 之異譯。

5. 西域大夏遷自晉南還有以下一些旁證：

其一，西域大夏國的信息是張騫首次西使獲得的。張騫這次西使的目的地本是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國。由於大月氏西遷，張騫跟蹤而至阿姆河流域，纔得知有大夏國。張騫在大夏地逗留了一年多，對當地的風土人情定有較充分的瞭解。因此，他採用“大夏”這一古稱命名一個由 Tochari 人建立的、當時業已臣服大月氏的國家，顯然不會僅僅出於爲 Tochari 找一確切音譯的考慮。他稱呼大夏國所臨阿姆河（該河時名 Vakhshu 即 Wakshu）爲“嬀水”，考慮到晉南有一條嬀水顯然是一個重要因素。《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皇甫謐曰：“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虞鄉，如前所述，相傳有夏虛即大夏之虛。張騫採用“大夏”這一名稱時，顯然想到了晉南乃至虞鄉的大夏。

其二，張騫首次西使旨在聯合月氏共同抵抗匈奴，雖因形勢變化，這一目的未能實現，然張騫此行往返一十三年，備歷艱辛，終於使西域諸國與西漢開始了雙向的交往，即史遷所謂“鑿空”。但是，《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在敍及張騫出使西域的功績時，提到的僅僅是“使絕域大夏”，隻字未及同時出使大月氏、大宛、康居之事。足見時人評價張騫西使是如何偏重大夏的發現！《漢書·敍傳下》竟用“博望杖節，收功大夏”八字總結張騫的一生，也就不足爲怪了。

又據《史記·西南夷列傳》，張騫歸國，“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從此，西漢開始大規模經營西南夷，並自元鼎六年（前 111 年）至元封二年（前 109 年）先後設置了牂牁、越巂、沈黎、汶

山、武都、益州等郡；據《史记·大宛列傳》，置郡的目的主要在於“欲地接以前通大夏”，而武帝確曾遣使十餘輩，企圖“出此初郡抵大夏”，終因昆明阻撓而未果。武帝不顧當時客觀條件，大事西南夷，正是張騫“盛言”的結果，可見張騫有關大夏的報告必有能深深打動武帝的地方。

嗣後，據《史記·大宛列傳》，“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乃說武帝通使烏孫，其辭曰：“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果以爲然，命騫使烏孫。據同傳，“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竇、扜罙及諸旁國”。張騫卒“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由此可知，張騫使烏孫雖有聯結烏孫抵抗匈奴的目的在，但歸根結蒂還是爲了招徠大夏，而大夏使者隨騫副使俱來，簡直被視作西北國通於漢的標識。

太初年間，李廣利征大宛，初戰不利，敗歸敦煌，公卿、議者皆願罷擊宛軍，獨武帝不以爲然。其原因，據《史記·大宛列傳》，乃在於武帝擔心，“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不惜“天下騷動”，再起大兵伐宛。在此，武帝首先考慮的仍然是大夏。

西漢君臣如此念茲在茲的大夏國，不過是一個早已臣服於大月氏的、兵弱畏戰的遠國。當時該國的中心完全處在大月氏王的控制之下，僅東部山區有五個互不統屬的翎侯。雖據《漢書·西域傳》，這五個翎侯有一定的自主權，能“共稟漢使者”，但以此爲

外臣，意義畢竟不大。到底大夏的吸引力從何而來？目前看來衹有一個答案：張騫和武帝相信西域的大夏遷自晉南，乃陶唐氏之裔胄。蓋張騫身臨其境，沐浴陶唐氏之遺風，歸報於國，使好大喜功的武帝不勝嚮往之情。僅僅由於史遷謹慎，視張騫之見聞爲類似《山海經》之奇談，不敢言之，纔湮沒無聞至今。

其三，《史記·大宛列傳》稱："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頿，善市賈，爭分銖。"所謂"自大宛以西至安息"，當然包括大夏國在内，蓋同傳又稱："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張騫首次西使已取道大宛，親臨大夏地。嗣後，據同傳，"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漢書·西域傳》且載大夏五翖侯曾"共稟漢使者"。可知漢人對西域大夏的情況是比較熟悉的，對西域大夏人體貌特徵的概括亦即"深眼、多鬚頿"沒有理由懷疑。

另一方面，據《史記·高祖本紀》載："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而《漢書·高帝紀》贊曰引《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並肯定高祖爲劉累之後。果然，"隆準而龍顏、美須髯"與"深眼、多鬚頿"如出一轍，恐非巧合。質言之，劉邦與西域大夏人體貌特徵的一致，正說明西域之大夏即吐火羅人的前身主要是以堯部落爲宗主、可能包括有唐氏在内的部落聯合體。這似乎也有助於理解武帝對西域大夏國的特殊興趣。

其四，《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羲和是陶唐氏的重要職官。而據《漢書·西域傳》，西域的大夏國

有職官曰“翖侯”[xiəp-ho]，與“羲和”[xia-huai] 讀音近似；翖侯源自羲和也未可知。

6.總而言之，大夏可溯源於陶唐氏，其故地在晉南。其支裔後來逐步遷離晉南，一部份北徙至河套以北，一部份西徙至臨夏和河西。最早在公元前七世紀二十年代，河西的部份大夏人西遷至伊犁河、楚河流域，與先後抵達該處的 Asii、Gasiani 和 Sacarauli 等部落結成聯盟，並西向伸張其勢力至錫爾河北岸。

約公元前 177 / 前 176 年，大月氏首次西遷，佔領伊犁河、楚河流域，包括大夏人在內的塞人遭驅逐，部份退縮至錫爾河北岸；部份南下帕米爾，或越興都庫什山南下，或東進塔里木盆地、佔有南北道包括焉耆和龜茲在內的一些綠洲。

公元前 140 年左右，在錫爾河北的塞人南下，其中一支進入費爾幹納，一支進入巴克特里亞，後者滅亡了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他們各自建立的政權（可能均以大夏人爲主），中國史籍分別稱之爲大宛國和大夏國。約十年後，大夏國被再次西徙的大月氏人滅亡。

二 [21]

1.“月氏”[njiuk-tjie]，也寫作“禺知”[ngio-tie] 等。《穆天子傳》卷一：“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隃之關隥。己亥至於焉居、禺知之平。”“焉居、禺知之平”或在今河套東北。

《逸周書·王會篇》附“伊尹朝獻篇”列“月氏”於“正北”。是篇係戰國時所作，所載以騊駼貢周之“月氏”可能是春秋時期的月氏，其居地當在黄河以西。

《管子·輕重乙》稱：“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阸。”“國畜”諸篇所載略同。“輕重甲”且說：“懷而不見于抱、挾而不見于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崐崘之虛可得而朝也。”“禺氏”之“旁山”産玉，此山卽“崐崘之虛”；是虛和月氏去周都距離大致相等。或因月氏一度壟斷玉石貿易，故所産之玉稱“禺氏之玉”。此處“崐崘”應指阿爾泰山，故在《管子》所描述的時代，月氏人已西向伸張其勢力至阿爾泰山東麓。“禺氏”[ngio-tjie] 亦卽“月氏”。

又，《史記·大宛列傳》稱：“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閒。”“敦煌”應指“敦薨之山”卽今祁連山，“祁連”應指今天山。可知月氏故地東起今祁連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爾泰山東麓。結合以上有關先秦典籍所見月氏人活動範圍的描述，以及《史記·匈奴列傳》關於冒頓單于“西擊走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以後、匈奴“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的記載，可知月氏人的勢力曾一度東向伸展至河套內外。

2. 月氏（禺知）可能是有虞氏之一支，遷自晉地。晉地之有虞氏則遷自魯地。

據《墨子·尚賢中》，“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歷山、河濱、雷澤之地望，歷來注家的說法可大別爲兩

類：一類置諸魯，另一類置諸晉。這可能是因爲“歷山”等地名既見於魯或齊、又見於晉。對此，合理的解釋應該是：“歷山”等原係有虞氏在齊魯時居地之名稱，隨著舜，有虞氏最著名的部酋，自齊魯西遷，晉地也就出現了相同的名稱。“服澤之陽”，在蒲州，則不妨視作西遷有虞氏與陶唐氏接觸的最初地點。

據《尚書·堯典》，可知舜自魯西遷晉南後曾居於嬀水之汭。嬀水之汭因成爲舜所部有虞氏居地而得名“虞地”。

《孟子·離婁下》稱舜爲“東夷之人”，《史記·五帝本紀》稱舜爲“冀州之人”。結合兩者，可見舜率所部有虞氏自魯遷晉，終於從“東夷之人”變成了“冀州之人”。

3. 有虞氏乃顓頊部落自蜀遷魯之一支。

《國語·魯語上》稱：“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這表明有虞氏之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顓頊。據《大戴禮記·帝繫》，可知顓頊之故地在若水（今四川雅礱江）流域。又據《國語·楚語下》等，顓頊族（更可能是其中之一支）因佐少皞（少昊）自若水遷至窮桑。窮桑（亦作“空桑”），地在魯北。

顓頊以“高陽”爲“有天下號”，“高陽”[ko-jiang] 應即“窮桑”[giuəm-sang]、“空桑”[khong-sang] 之異譯。而有虞氏之“虞”[ngiua] 亦不妨視作“高陽”或“空桑”之略譯（見疑、溪疑旁紐），有虞氏正是顓頊族東遷空桑的一支卽高陽氏之後。換言之，“有虞”與“高陽”實係同名異譯，乃東遷顓頊族之專稱。“空桑”或“窮桑”乃至“高陽”或“虞氏”等的原意均與日出有關。

東遷顓頊部族事實上的始祖很可能是《國語·鄭語》中與夏

禹、商契、周棄並舉的虞幕，亦卽顓頊之子窮蟬。“窮蟬”[giuəm-zjian]，亦得視爲“窮桑”之異譯。顓頊國號“高陽”、其子幕一名“窮蟬”，均因顓頊部落繼少昊之後居於窮桑之故。

要之，顓頊之一支自若水東遷窮桑，始佐少昊，後取而代之，遂得號“高陽氏”卽“有虞氏”。“有虞氏”或“高陽氏”最初可能得名於魯北之空桑山，但“空桑”一旦成了一個地緣政治集團的稱號，一般情況下會隨著這集團之人的遷徙而遷往各地。舜率所部有虞氏自魯西遷至晉南嬀水之汭，將“空桑”一名也搬到了晉地；嬀水之汭於是得名“虞地”。後來封於“虞地”的太伯之後亦因而得名爲“虞公”。

4. 舜亡後，部份有虞氏已經開始離開晉地。其中一支有虞氏則經北地、安定等地西向進入河西。

大約在前七世紀二十年代末，河西的有虞氏卽《管子·小匡》所謂“西虞”復西遷至伊犂河、楚河流域，同時或先後遷去的還有一部份大夏人和允姓之戎。蓋據《史記·秦本紀》載，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有虞氏等放棄河西，西遷伊犂河、楚河流域或在此時。

5. 西遷伊犂河、楚河流域的有虞氏等部在該處組成的部落聯合體被希羅多德《歷史》[22]（I，201；IV，13，16）稱爲Issedones；其中，有虞氏可能就是斯特拉波《地理志》（XI，8）所載Gasiani人，允姓之戎和大夏分別爲Asii和Tochari。至遲在公元前六世紀二十年代末，Issedones西向擴張至錫爾河北岸，逐走了原居該處的Massagetae人，從此與波斯人發生關係，被阿喀美尼朝波斯大

流士一世（Darius I，前 521—前 486 年）的貝希斯登（Behistun）銘文稱爲 Sakā，Sakā 亦卽中國史籍所見“塞種”。

由於大月氏人的西徙，塞種卽包括有虞氏在內的四部組成的部落聯合體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除一部份退縮至錫爾河北岸外，餘衆南下葱嶺，散處帕米爾各地。約公元前 140 年左右，塞種諸部紛紛離開錫爾河北岸，其中一支渡過阿姆河，侵入並滅亡了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形成了中國史籍所謂“大夏國”。約十年之後，這個主要由塞種四部構建的“大夏國”被來自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征服。

散處帕米爾地區的部份有虞氏後來還東向進入塔里木盆地諸綠洲，建立了一些城郭小國。《漢書·西域傳》所載西域國名和地名，例如：高昌 [ko-thjiang]、姑師 [ka(kia)-shei]、車師 [kia-shei]、危（𢧵）須 [khiai-sio]、龜兹 [khiuə-tziə]、休循 [xiu-ziuən] 等，地名有車延 [kia-jian]、居延 [kia-jian]、貴山 [giuət-shean] 等，均得與“空桑”、“窮桑”、“高陽”、“虞氏”、“鳩兹”等視爲同名異譯。“高昌”、“龜兹”更與“高陽”、“鳩兹”前後、東西相映成趣。當然，以上國名或地名中有一些也可能是有虞氏在公元前七世紀末西向遷徙時留下的遺蹟。

6. 可能在一支有虞氏西遷的同時，另一支有虞氏北遷雁門。後者西向伸張其勢力抵達阿爾泰山東端，一度稱霸天山南北，壟斷了當時的東西貿易。直至公元前 177 / 前 176 年被北亞新興的遊牧部落匈奴擊敗，其大部纔被迫西徙伊犁河、楚河流域，逐走了原居該處的塞種。史稱這部份有虞氏卽月氏人爲“大月氏”，而將

留在原地的小部份人稱爲“小月氏”。約公元前130年，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又被匈奴支持的烏孫人擊敗，放棄伊犂河、楚河流域，西徙至阿姆河流域，滅亡了當地的大夏國，定居下來。

大月氏領有大夏地後，直接統治 Bactra 及其周圍地區，而通過所謂“五翎侯”控制東部山區。“五翎侯”均係原大夏國人，是大月氏人扶植的傀儡。

後來推翻大月氏，開創貴霜王朝的原貴霜翎侯丘就卻，應爲公元前140年左右入侵巴克特里亞的塞種諸部之一 Gasiani 之後裔，如前所述，Gasiani 卽公元前七世紀末以前西遷之有虞氏。“貴霜”[giuət-shiang]，亦得視爲“空桑”、“禺知”、“月氏”等的異譯。因此，中亞史上盛極一時的貴霜帝國，可以說也是西徙有虞氏建立的。

7. 以下是指月氏之先爲有虞氏的若干說明：

其一，名稱相同：“禺知”、“禺氏”等和“月氏”顯係同名異譯，與“高陽”、“窮桑”、“空桑”亦係同名異譯，而有虞氏之“虞”亦不妨視作“高陽”或“空桑”之略譯。《山海經·大荒北經》：“逮之于禺谷。”郭注：“禺淵……今作虞。”此“禺”、“虞”互通之例。

其二，有虞氏與月氏及其前身禺知的遷徙在時間和地域上可相銜接，可作出連貫的敍述。

其三，據《史記·大宛列傳》，張騫於公元前129年訪問大月氏歸國後向武帝報告稱：大月氏“都嬀水北爲王庭”。“嬀水”卽今阿姆河。張騫稱阿姆河爲“嬀水”，顯係實錄。蓋如前述，舜所

部有虞氏的發祥地正是晉地嬀水之汭。而如果相信《史記·五帝本紀》"正義"的說法：舜父"瞽叟姓嬀"，則舜自魯西遷後，所居"嬀汭"即"嬀水之汭"其實得名於父姓。由此可見，遠赴中亞的有虞氏即大月氏人之王庭所臨河水被張騫稱爲"嬀水"決非偶然。張騫命名時考慮的不僅僅是大夏與嬀水的關係，更重要的因素也許是有虞氏與嬀水的淵源。

其四，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月氏或大月氏是遊牧部落。但沒有明確的資料表明有虞氏是遊牧部落，似乎不能將有虞氏與月氏或大月氏勘同。其實不然。衹要條件具備，生活和生產方式是可以改變的。有虞氏在故地時即便是土著，一旦踏上西遷之路，特別是到達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大草原後，轉變爲遊牧人不是不可想像的；而一旦到達阿姆河流域，特別在進入巴克特里亞的農耕區後，相對安定的生活環境，又使他們逐步放棄遊牧、趨向定居。再說，史載舜率有虞氏耕、漁、陶，乃至成聚、邑、都，豈不說明在舜之前沒有聚、邑、都的有虞氏，正是一個遊牧部落，至少存在過遊牧的生活方式。更何況，沒有理由認爲舜以後便完全不存在遊牧的有虞氏部落，也就是說北遷、西徙者正是有虞氏中一直以遊牧爲生者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8. 總而言之，大月氏之前身月氏（禺知）之先爲有虞氏之一支。其人自蜀遷魯，復自魯徙晉，後逐步遷離晉地。一支經北地、安定等進入河西。大約在公元前七世紀二十年代末，這一支復西遷至伊犂河、楚河流域，同時或先後遷去的還有部份大夏人和允姓之戎等。其人在該處組成的部落聯合體被希羅多德稱爲

Issedones。Issedones 後西向擴張至錫爾河北岸，並被波斯人稱爲 Sakā。由於大月氏人的西徙，包括有虞氏在內的部份塞種放棄伊犂河、楚河流域，除一部份退縮至錫爾河北岸外，餘衆南下葱嶺，散處帕米爾各地，並東進塔里木盆地，佔有包括龜茲、焉耆在內的一些南北道綠洲。

另一支有虞氏則北遷雁門。至遲在公元前三世紀二十年代，這一枝有虞氏已西向伸張其勢力抵達阿爾泰山東端，一度壟斷了東西貿易。直至公元前 177 / 前 176 年被匈奴擊敗，其大部纔被迫西徙伊犂河、楚河流域，逐走了原居該處的塞人。史稱這部份人爲“大月氏”，而將留在原地的老弱稱爲“小月氏”。約公元前 130 年，大月氏人又被烏孫擊敗，放棄伊犂河、楚河流域，西徙至阿姆河流域，滅亡了約十年前進入該地的塞人所建“大夏國”。

三[23]

1. 允姓之戎始見於《左傳》。其人原居瓜州，其內徙陰地者，被稱爲陰戎。允姓在瓜州之居地名陸渾，內徙允姓又被稱爲陸渾戎，而陰地亦有地得名陸渾。陰地屬九州，故陸渾戎亦九州戎之一支。

瓜州很可能在涇水上游，今平涼至固原一帶。“瓜州”[koa-tjie] 可以視作“月氏”或“禺知”之異譯。允姓原居地得名“瓜州”可能是該地曾被月氏征服的結果。

居於秦、晉西北卽涇水上游的允姓受秦人迫逐，除一部份附秦並在後來被晉惠公徙往伊川外，可能有一部份遷往瓜州之西。

2.《廣弘明集·辨惑篇》（卷七）載梁荀濟“論佛教表”引《漢書·西域傳》之文有曰：“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爲月氏迫逐，遂往葱嶺南奔。”[24] 荀氏在此將允姓與塞種聯繫在一起。儘管荀氏所引《漢書》之文不見今本，因而也許僅僅是他個人的一種推測。但允姓屬於塞種的客觀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謂“塞種”應卽波斯人所謂 Sakā，其前身便是希羅多德所謂 Issedones。遲至公元前七世紀末，Issedones 已經出現在伊犂河、楚河流域、亦卽《漢書·西域傳》所謂“塞地”。Issedones 後西向擴張至錫爾河北岸，從此被波斯人稱爲 Sakā。Sakā 原是波斯人對錫爾河北岸遊牧部落的泛稱。

塞種主要由 Asii、Gasiani、Tochari、Sacarauli 四部組成。Isse [dones] 實卽四部中的 Asii（“don”似爲表示場所的後綴，亦見於後世 Osset 語中）。在希羅多德描述的時代，伊犂河、楚河流域很可能已是四部的居地，故 Issedones 實際上成了一個部落聯合體的名稱。這個聯合體被稱爲 Issedones，也許是 Asii 人佔有統治地位的緣故。

前述秦穆公開疆拓土的舉動，很可能引起諸戎的西遷。允姓也許便在這時離開瓜州及其以西，西走塞地。這與希羅多德所載 Issedones 在伊犂河、楚河流域出現的時間正相符合。

據《漢書·西域傳》，伊犂河、楚河流域有地名“惡師”[a-shei]，不妨視作 Issedones 之異譯，亦允姓據有塞地之證。“允

姓”[jiuən-sieng] 不妨爲 Isse[dones] 或 Asii 的對譯。

3. 允姓（Asii）自瓜州逐步西遷至“塞地” 尚有軌蹟可尋：

在晉惠公十三年（前 638 年）即允姓、姜戎氏内徙的前後，已可能有一部份允姓遷至後來的金城郡境内，《漢書·地理志下》所載“允吾”、“允街”等地名卽其遺蹟。此外，據《後漢書·西羌傳》，金城郡境内有“大允谷”。“大允谷”或因允姓所居而得名。

又據《漢書·霍去病傳》，張掖郡境内有“焉支山”（同書“匈奴傳上”作“焉耆山”）。“焉支（耆）”[ian-tjie(tjiei)] 得視作“允姓”或 Asii 的異譯，允姓西遷經過此山時或曾留下部衆。

《左傳·昭九年傳》杜注稱瓜州卽敦煌，固然非是。但杜氏似乎不至於僅僅因爲敦煌産好瓜便遽斷古瓜州在敦煌。杜氏曾親至河西，很可能發現敦煌一帶有允姓活動的蛛絲馬蹟，遂指該處爲古瓜州。這說明允姓西遷時曾經過該地並一度逗留。

《漢書·張騫傳》稱：烏孫“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焞煌間”。此處“祁連”指今天山，而“焞煌”卽“敦煌”指今祁連山。在傳文描述的年代，具體而言爲公元前 177 / 前 176 年以前，烏孫的居地在今祁連山與天山之間。“烏孫”[a-siuən] 旣得視爲“允姓”或 Asii 的異譯，不妨認爲烏孫是公元前七世紀末遷往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允姓留在祁連山和天山之間的餘衆。

4. 公元前 177 / 前 176 年大月氏被匈奴冒頓單于擊破、放棄故地西遷。大月氏的進攻，使塞種（實卽 Asii、Gasiani、Tochari、Sacarauli 等四族組成的部落聯合體）放棄了“塞地”，一部份塞種西向退縮至錫爾河北岸，其中一些 Asii 人更西走至鹹海、裏海以

北，形成《史記·大宛列傳》所載“奄蔡”[iam-tsat]，亦即西史所謂Aorsi。另一些Asii人與其他三部一起侵入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一部份塞種還自“塞地”南下帕米爾，其中一些進入西北次大陸，另一些東向進入塔里木盆地，沿西域南北道建立了若干綠洲小國。《漢書·西域傳》所載城郭諸國名稱有“溫宿”[uen-siuet]、“烏壘”[a-liuei]、“焉耆”、“烏秅”[a-deai]、“伊循”[iei-ziuən]等均可視作“允姓”或Asii 的異譯，說明這些綠洲最早的開拓者可能是允姓即Asii人。

值得注意的是：“焉耆”，在佉盧文書中作Argi，中古波斯語作Ark；Argi、Ark以及其王治之名“員渠”[hiuən-gia]與“允格”的關係頗爲明顯；如果再考慮到焉耆王家姓“龍”[liong]無妨視爲“陸渾”[liuk-huən]的縮譯，其淵源便更清楚了。

5. 允姓是允格之後，“允姓”與“允格”[jiuən-keak]得視爲同名異譯（[k]齶化爲[s]），允格乃金天氏即少昊之裔。黃帝之子有二青陽，姬姓青陽與己姓青陽。前者即玄囂，後者即少昊。姬姓青陽降居泜水，降居若水者爲昌意。在昌意降居之前若水流域已有允姓國。這說明少昊之據有若水當先於昌意，若水應爲少昊可以追溯的最早故地。相傳少昊之子允格居鄀、有子鄀姓，鄀之得名顯然是因爲少昊曾居若水之故。

據《漢書·西域傳》烏孫國王治“赤谷城”。《釋名·釋采帛》（卷四）：“赤，赫也，太陽之色也。”又，《東觀漢記·顯宗孝明皇帝》（卷二）：“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陽生，豐下鋭上，顔赤色，有似於堯，上以赤色，名之曰陽。”由此可知，赤谷者，陽谷也。

而《太平御覽》卷三引《尸子》:“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窮桑。”《尚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偽孔傳”曰:“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窮桑”、“嵎夷”[ngio-jiei]得視爲同名異譯,知少昊金天氏所邑窮桑卽暘谷,亦卽陽谷。

又,《史記·大宛列傳》載烏孫始祖傳說曰:“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弃於野。烏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知烏孫的始祖與烏有關。“烏孫”一名或由來於這一傳說:“烏孫”者,“烏之子孫”也。而“烏嗛肉蜚其上”云云,明此烏乃取食之烏。

而《左傳·昭十七年傳》載少皞氏以鳥名官,知金天氏之始祖傳說與鳥類有關。其中司啓之“青鳥”卽倉庚又稱三足烏,爲西王母取食之神鳥。王充《論衡·說日篇》:“日中有三足烏。”《淮南子·精神訓》:“日中有踆烏。”高注:“踆,猶蹲也。謂三足烏。”《太平御覽》卷三引《春秋元命包》曰:“陽數起於一,成於二,故日中有三足烏。”烏孫王治名“赤谷”,表明烏孫人崇拜太陽。知三足烏與太陽崇拜有關。

由此可見,烏孫與金天氏兩者的始祖傳說存在某種内在聯繫。“烏孫”者,青鳥卽三足烏之子孫也。

最後,《山海經·大荒南經》“有羲和之國”。郭注引《啓筮》曰:“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暘谷。”羲和之子所出“暘谷”旣爲赤谷,知烏孫官號“翎侯”,得視爲“羲和”之異譯。

6. 總而言之，允姓之戎原居瓜州（涇水上游），因受秦人迫逐，徙於瓜州之西。至遲在公元前七世紀末，因秦穆公開疆拓土，其大部遂與一些大夏、禺知人一起抵達伊犁河、楚河流域，組成部落聯盟，其中允姓可能扮演了宗主的角色，因而該聯盟被希羅多德稱爲 Issedones，後因擴張至錫爾河北岸，被波斯人稱爲 Sakā。西遷過程中留在祁連山與天山之間的餘種，後來發展爲烏孫，進一步西走至鹹海、裏海以北者則爲奄蔡。

由於大月氏人的西遷，Issedones 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除一部份退縮至錫爾河北岸外，其餘南下帕米爾，或進入西北次大陸，或東進塔里木盆地、進入焉耆等南北道綠洲。

允姓是允格之後，允格爲少昊之裔。有虞氏之祖顓頊降生於若水，蓋顓頊之父昌意據有若水，該水原爲少昊之居地。昌意據有若水之前已有允姓國，該國應爲少昊所建。而顓頊後來又東遷魯地輔佐少昊。凡此皆可見允姓與有虞氏關係之密切。兩者也許是同部別出的關係。“允姓”與“虞氏”、“烏孫”與“月氏”、Asii 與 Gasiani、“焉耆”與“龜兹”等等儘管代表不同的政治、部落實體，其名稱同出一源。

四

關於操 Toχrï 語之族群的起源，學者們提出了不少假說，其中似以中近東起源說最具合理性。說者以爲这一族群之前身應即

楔形文字資料中常見的 Guti 人（結尾的 i 是名稱的一部份，加上 Akkad 語的格尾音就成爲 Gutium 等形式）。Guti 人來自波斯西部山地。他們擊敗了巴比倫統治者納拉姆辛（Narâm-Sin），主宰整個巴比倫達百年之久，時在公元前 2100 年左右。楔形文字資料中另有名 Tukriš（此名末尾的咝音可能是當地語音的格尾音，詞幹實爲 Tukri）之部落，其居地從東面和東南面與 Guti 人居地鄰接。按之年代，Guti 與 Tukri 要早於小亞的赫梯人。這兩者一起於公元前三千紀末離開波斯西部，經長途跋涉到達中國，部份定居，其餘繼續遊牧，遊牧者即後來見諸中國史籍之“月氏”。“月氏”與 Guti 乃同名異譯。“吐火羅”一名則來源於 Tukri。[25]

上說的基礎是印歐人起源於中近東，由於較充分地消化了有關吐火羅語的研究成果而深受關注。[26]

以下試圖說明此說和以上有關大夏、月氏（禺知）的考證有著內在的一致性。

1. 名稱：說者以爲 Guti 和 Tukri 是兩個兄弟部族，在遙遠的過去共同從波斯出發，後來逐步融合成了一個新的整體。因此，既可用這一個、又可用另一個名稱稱呼他們。今案：既然 Guti 和 Tukri 可以分別和“月氏”和“大夏”勘同，則似乎可以認爲早在他們離開波斯之前，操 Toχrï 語之族群已經分化成兩個部落。或者說這一時期 Toχrï 語業已形成兩種方言。

說者以爲在中國史籍中操 Toχrï 語之族群是以“月氏”的名稱出現的，其人爲匈奴所逐西遷後纔以“Tochari”這一名稱爲各種語言的史料所著錄。具體而言：月氏西遷阿姆河流域後，“印度

人、波斯人、粟特人、希臘人——人人都用這個新的名稱稱呼月氏，巴克特里亞本身也被叫做吐火羅斯坦（Toχāristān）即‘吐火羅人之地’。似乎這個民族途中改變了名稱，而把月氏之名留在中國一邊，到了巴克特里亞就稱吐火羅人了”。其實不然，Toχāristān在漢文史籍中也有對應的名稱：“大夏”。如前所述，月氏西遷，征服大夏之後，纔立足阿姆河流域，月氏顯然有別於大夏。質言之，Guti 和 Tukri 在東遷後早已分道揚鑣。

2. 時間：禹的年代一般認爲在公元前 2100 年左右（學界暫以公元前 2070 年作爲夏代的始年），有虞氏、陶唐氏和顓頊的年代應該更在此前。說者據西史推定的 Guti 與 Tukri 人在巴比倫失敗的時間爲公元前三千紀末，認爲兩者從此離開波斯西部踏上東來征途。但我們不妨設想其人的東遷可能略早於此。換言之，不能排除他們在遷入波斯西部之前已有部份踏上東遷征途。果然，Guti 與 Tukri 的東來和陶唐氏和有虞氏的出現正相銜接。

3. 遷徙路線：Guti 和 Tukri（至少其中的一部份）在東遷的途中，首先到達今中國四川地區，這便是傳說中有虞氏始祖顓頊之由來。

三星堆高度發展的青銅文明，與中近東文明有某種聯繫是十分明顯的。至少從青銅雕像、神樹、權杖和金面罩等若干因素構成的文化叢分析，巴蜀與西亞近東文明的交往最遲在公元前十五、十四世紀已經存在了。[27] 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青銅神樹，應即若木。[28] 而相傳顓頊之故地在若水（今四川雅礱江）流域。[29] 如所周知，若木之所在爲若水。

儘管不能說三星堆的主人便是東來的操 Toχrï 語之族群，但至少說明巴蜀地區和中近東在遠古交往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4. 陶唐氏和有虞氏，亦卽東遷的 Guti 和 Tukri 兩者之間關係至爲密切。

其一，《國語·魯語上》：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左傳·文十八年傳》則稱：“舜臣堯……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知有虞氏舜繼堯卽位，兩者一脈相承。

而據《墨子》、《國語》等，堯、舜、禹、湯、文、武稱爲四代聖王。既然禹、湯、文、武無疑屬於夏、商、周三代，則堯、舜應同屬虞代。這是因爲儘管堯所出青陽一系與顓頊所出昌意一系一度是各自獨立發展的，但在後來有了聯繫。蓋據《史記·五帝本紀》，“帝顓頊生子曰窮蟬。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這裏所說由帝嚳繼承的“顓頊”衹能是前述東遷窮桑的一支。玄囂之孫雖取代昌意之後，但“有天下號”，亦卽以某一血緣關係集團爲核心發展起來的地緣政治集團的符號未變。蓋“高辛”[ko-sien] 與“高陽”一樣，亦得視爲“空桑”、“窮桑”或“嵎夷”之異譯。

既然“窮桑”、“高陽”、“高辛”是同名異譯，不無理由認爲帝嚳的繼承人堯也繼承了相同的國號。蓋“堯”[ngyə] 與“虞”[ngiua] 音近，與“高陽”、“高辛”等也不妨視作同名異譯，很可能一度也是“有天下之號”。堯繼承的既是少昊、顓頊的“天下”，與其說堯爲虞帝，不如說舜號“有虞氏”乃本堯之故號。堯作爲少昊窮桑氏、顓頊高陽氏和帝嚳高辛氏的繼承人自然也是虞帝。

舜率所部有虞氏自魯遷晉在堯部落西遷之後，舜應即所謂“造唐”的羣臣之一。

其二，《管子》、《國語》均有齊桓公西征，拘泰（大）夏、服西虞（吳）的記載，時在公元前七世紀六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拘大夏與服西虞一前一後，似乎也表明了兩者在當地脣齒相依的關係。

其三，公元前 140 年左右，大批塞人渡錫爾河南下，一支進入 Ferghāna（費爾幹納），一支進入 Bactria（巴克特里亞）。後者滅亡了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他們各自建立的政權，《史記·大宛列傳》分別稱之爲大宛國和大夏國。值得注意的是大宛國，其國名是 Tochari 的對譯，其都城之名“貴山”，則是 Gasiani 的對譯；而“大夏”國內有“貴霜”（Gasiani）人。Guti 和 Tukri 兩者後身之間的密切關係同樣可說明兩者本身之間的關係。

儘管有一部份東遷的 Guti 和 Tukri 分道揚鑣，終於出現了《史記》所載西遷大月氏征服大夏的事件，但這不能據以否定兩者的淵源。

5. 語言：指月氏、大夏爲東遷 Guti、Tukri 的基本證據應該是語言學資料。遺憾的是，至少目前，由於以下三個原因，不可能獲得這方面的證據。

其一，月氏、大夏，在中國典籍中有關記載非常貧乏。其前身有唐氏（陶唐氏）和有虞氏的事蹟更具傳說色彩，可供研究的語言學資料自然更爲稀少，真僞難辨。尤其重要的是，有關記載沒有出自月氏或大夏本族之手者，這增加了利用的困難。

其二，無論大夏還是月氏，在遷徙和發展過程中，不可能保

持純粹的血統，勢必出現種類糅雜的情況。尤其是月氏，後來日益強大，役使許多異種部落，這些異種部落都可能自稱或被稱爲月氏。月氏實際上成了一個部落聯合體的名稱。類似的情況恐怕對於大夏也不可避免。僅阿姆河流域的大夏人數多達百萬，不能不認爲其種類早已不純。這也使得今日對其語言的探索障礙重重。

其三，Guti 和 Tukri 人在長途遷徙過程中，勢必和操各種語言的族群接觸，自己的原始語言的語法和詞彙不免受到形形色色外族語言的影響。由於異族通婚的存在，這種現象將更加嚴重，部份 Guti 和 Tukri 人甚至可能放棄自己的母語，改用其他語言。也就是說，同血統的部落可以操不同的語言。

正因爲如此，我們既不可能發現肯定月氏、大夏曾操 Toχrï 語的絕對根據，也不可能發現確鑿的反證。因此，我們衹能後退一步，採取一個近似的標準：尋找與月氏、大夏等有關的語彙，看看這些語彙能否用 Toχrï 語詮釋。經過學者的努力，這樣的語彙，儘管寥寥無幾，據說已有發現：

首先是月氏、大夏等數者所共有、可以用 Toχrï 語詮釋的語彙。這樣的語彙似乎衹有一個：翖侯（A *yapoy*, B *ype*）：

《漢書·西域傳上》明載“大夏有五翖侯”。《尚書·堯典》載陶唐氏的重要職官有“羲和”。“翖侯” [xiəp-ho]，與“羲和” [xia-huai] 讀音近似，應同出一源。

雖然沒有月氏有翖侯的直接記載，但大夏五翖侯役屬月氏，表明月氏認可“翖侯”這一稱號。且五翖侯之一爲貴霜翖侯，貴霜應即進入阿姆河流域的 Gasiani 人，其人與月氏同根同源。

另據《史記·大宛列傳》，烏孫也有翖侯。如前所述，烏孫與操 Toχrï 語之族群不無淵源。

而據《漢書·陳湯傳》，康居亦有翖侯號。康居人應該說一種 Sakā 語，其人有翖侯號可能在它作爲 Sakā 部落時受 Tochari 或 Gasiani 影響所致。

其次，分別與月氏、大夏等有關的語彙。如與月氏有關的"若苴"（A ñäkci, B ñäkc(i)ye）（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祁連"（A klyom, B klyomo）（見《史記·大宛列傳》）[30]；與烏孫有關的"靡"（A wäl, B walo）（見《史記·大宛列傳》）等。[31] 而與焉耆有關的"爵離"（《後漢書·班勇傳》）、與龜茲有關的"雀離"（《水經注·河水二》）、"昭怙釐"（《大唐西域記》卷一）等，均被視爲 Toχrï 語 cakir 之音譯。[32] 這些語彙果如說者所言，可以 Toχrï 語詮釋之，則亦可加強月氏、大夏數者曾操 Toχrï 語的證據。

其三，月氏等在中國北方活動時代漢語中出現的可以用 Toχrï 語詮釋的語彙。例如："狗" [*kooʔ, kəu] （A ku）、"望" [*maŋs, mĭan-]（A mañ）等。[33] 如果禹知、大夏等皆係操 Toχrï 語之族群，則應該是上古漢語中 Toχrï 語彙的主要來源。

既然如此，Toχrï 語 B 方言稱爲 Küsän 語的原因就不難說明了：Toχrï 語 B 方言本來是 Guti 的語言。而龜茲人亦 Guti 後裔之一支。由於今天尚不完全清楚的原因，龜茲人在較長時期內保留了其原始語言。

至於在阿姆河流域以及其他 Guti 和 Tukri 人及其後裔遷徙過程中可能停留的地區沒有發現 Toχrï 語文獻，而且有證據表明在這

些地區的有些可指爲 Guti 和 Tukri 人後裔者所操並非 Toχrï 語，顯然是因爲其人放棄了自己的語言、轉而使用土著語言的緣故。

五

以下敍述允姓和操 Toχrï 語之族群的關係，重點在說明爲什麽 Toχrï 語 A 方言的本名爲 Ārśi 語。

1. 允姓（Asii）與大夏（Tochari）的關係。

河西地區既有允姓的、也有大夏的遺蹟。但是沒有證據表明兩者在河西地區有過接觸。已知遲至公元前七世紀五十年代末，河西已有大夏人。而允姓離開它在瓜州的故地恐怕最早也要到公元前七世紀三十年代初，到達河西或在二十年代末。

大夏離開河西，可能是受允姓等西遷引起的連鎖反應的影響。在伊犂河、楚河流域，大夏很可能被隨後到達的允姓征服，成爲後來被稱爲“塞種”的部落聯合體的組份之一。之所以認爲大夏在伊犂河、楚河流域曾被允姓征服，不僅是因爲中國史籍認爲塞種便是允姓，而且因爲希羅多德記載公元前七世紀末活躍在後來被稱爲“塞地”卽伊犂河、楚河流域的部落時也祇提到 Isse[dones] 卽允姓，而大夏又無疑曾與允姓同時活動於伊犂河、楚河流域的緣故。

荀濟引《漢書·西域傳》之文稱允姓之戎“世居燉煌”，固然可能是因爲誤以爲古瓜州位於當時的敦煌，其實遷入“塞地”的

允姓來自涇水上游。但是如果考慮到“燉煌”得自“敦薨”，乃Tochari之異譯，似乎從允姓“世居燉煌”這一傳說中，可以窺見允姓和大夏的悠久聯繫。

約公元前140年，允姓與大夏一起南渡錫爾河，侵入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Trogus Prologues稱佔領巴克特里亞的Asiani(Asii)爲“Tochri的王族”(XLII)，[34] 則表明允姓佔支配地位的形勢至此並未變化。但是，公元前129年到達阿姆河流域的張騫卻衹知有大夏，不知有允姓，這很可能是因爲大月氏來犯時，作爲宗主，允姓首當其衝，受創深重，終於銷聲匿蹟。大夏由於人數衆多，其名反而顯彰。

離開“塞地”南下帕米爾，後來又進入塔里木盆地周邊諸綠洲的Asii和Tochari人也有保持著聯繫的。一個最好的例子便是焉耆國。該國國名“焉耆”、王治名“員渠”均係Asii人的遺蹟，而周遭山水名“敦薨”乃Tochari人的遺蹟。恐怕在焉耆國中允姓仍爲大夏（Tochari）人的宗主。

以上所述，都是大夏役屬允姓，下面似乎是一個例外。《漢書·西域傳上》載有婼羌，其種遍佈西域南道，其中一支，卽傳文所說辟在陽關西南的“婼羌國”，其國“王號去胡來王”。“去胡來”早已有人指出，應爲“吐火羅”之異譯。[35] 而“婼羌”可以認爲是允姓與羌人的混血種，蓋允格封鄀，有子鄀姓，允姓可溯源於允格之子。“婼”、“鄀”可通，“婼羌”實卽“鄀羌”。如前所述，臨夏既有允姓、又有大夏的遺址，該地復爲羌人出沒之處，由此沿祁連山南麓往西可達西域。陽關西南有以大夏人爲宗主的

婼羌部落，或非偶然。

2. 允姓和月氏的關係。

其一，允姓之祖少昊曾據有若水。有虞氏之祖顓頊降生於若水，後復東遷魯北窮桑輔佐少昊。由此可見允姓與有虞氏（月氏前身）關係之密切。

其二，《穆天子傳》載穆天子西征，途經“焉居、禺知之平”。“焉居”[ian-kia] 得視爲“允姓”之異譯，見允姓與禺知關係之密切。

其三，允姓與禺知一起西遷伊犁河、楚河流域，成爲希羅多德所載 Issedones 之組份，以後又一起西赴錫爾河北岸，並從該處入侵巴克特里亞。

其四，烏孫和月氏同處河西及其以西地區，在匈奴強盛並驅逐月氏之前，兩者相安無事可知。這和允姓和禺知的歷史淵源是一致的。

其五，龜茲，其名與“禺知”、“月氏”同源，然《一切經音義》稱：“或曰烏孫（Asii），或曰烏壘（Asii）。”此處雖用了“烏孫”一名，但未必是由於該地有烏孫人，而很可能是有允姓人的緣故。當時人但聞其音，不察其實，不恰當地用了“烏孫”這個已有特定內涵的譯稱。

其六，莎車（Sacarauli），《魏書·西域傳》稱之爲“渠莎”（Gasiani），《大唐西域記》卷十二稱之爲“烏鎩”（Asii），也說明了同樣的問題。

昌意降居之前據有若水的允姓國、自若水東遷窮桑的少昊族、作爲少昊族後裔的允姓之戎、以及後者西遷成爲塞種一部、且最

終散處西域各地之 Asii 等雖然同出一源，但由於彼此際遇不同，可能在語言、習俗甚至體貌特徵上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從允姓和有虞氏、大夏的特殊關係來看，他們應有共同的起源。

據此或可推論，允姓及其支裔本屬操 Toχrï 語之族群。而允姓在許多場合都是 Tochari 之王族，這可以很好說明爲什麼 Toχrï 語 B 方言的本名是“Ārśi”。

最後，應予說明的是：既然少昊氏之號“窮桑”與“允姓”爲同名異譯，月氏前身有虞氏之祖顓頊之號“高陽”（即少昊之故號“窮桑”）與“虞氏”或“月氏”亦爲同名異譯，則“月氏”一名與“允姓”也是同名異譯。因此，河西乃至西域各地與“月氏”、“允姓”等類似的族名、國名、地名究竟得自月氏還是允姓頗難區分。不僅如此，西方史籍所載 Sakās 諸部中的 Gasiani 與 Asii（Asiani）固然可以使之分别對應於月氏與允姓，但也不妨倒過來指 Gasiani 爲允姓，指 Asii（Asiani）爲月氏。有關問題的徹底解決，衹能以俟來日了。

六

以下是若干補充：

1. Toχrï 語除了上述 A 和 B 兩種方言外，一說樓蘭—鄯善的土著語言即“犍陀羅語”（Gāndhārī）有很多 Toχrï 語因素，如缺少濁塞音（voiced stops）、送氣輔音（aspirated consonants）和擦音

(spirants)，這與 Toχrï 語是一致的。換言之，樓蘭—鄯善國的居民操一種與 A 和 B 兩種方言有些不同的 Toχrï 語，亦即可以認爲 Toχrï 語存在第三種方言。[36]

果然，Toχrï 語文獻在塔里木盆地出現的時間便大大提前了。問題在於：樓蘭—鄯善國的居民與上述操 A、B 兩種方言之族群又是什麼關係？

如所周知，"樓蘭"乃佉盧文書所見 Kroraimna（Krorayina）一名之漢譯。樓蘭國後來被漢人更名爲"鄯善"，其用意顯然在於使樓蘭國從此背匈奴向漢，改惡從善。但是，"鄯善"顯然衹能是一個音義兼顧的譯稱。換言之，"鄯善"一名本質上是一個樓蘭人能夠接受的名稱的漢語音譯，漢人不過是利用漢字字義賦予"向善"之意而已。"鄯善"之原名應爲 Kroraimna 人顯貴氏族或王族之名號。

據《漢書·西域傳》，鄯善國之西有精絕國，精絕國之南有戎盧國。"精絕"[dzieng-dziuat] 得視爲"鄯善"之異譯，"戎盧"[njiuəm-la] 得視爲"樓蘭"之異譯。這說明 Kroraimna 人曾進入精絕、戎盧兩地。

又，《後漢書·西域傳》載疏勒國有楨中城，應即《魏略·西戎傳》所見位於西域南道之楨中國。"楨中"[tieng-tiuəm]，與"鄯善"、"精絕"等亦得視爲同名異譯，似乎可以說明該處亦有 Kroraimna 人活動之蹤蹟。

又《大唐西域記》卷一二載有曷勞落迦城，位於瞿薩旦那"國北"、媲摩城之西。"曷勞落迦"[hat-lô-lak-keai]，與"樓蘭"

(Kroraimna)顯然也是同名異譯。

Kroraimna 人不僅進入南道，而且進入北道。證據如下：

《漢書·西域傳下》載王莽始建國二年，西域都護但欽駐守“埒婁城”。埒婁城地望不詳，但無疑在龜兹國中。“埒婁”[liat-lo] 得視爲“樓蘭”之異譯。同傳所載龜兹國附近小國之名“輪臺”[liuən-də]（《史記·大宛列傳下》作“侖頭”[liuən-do]）亦得視爲“樓蘭”之異譯。

而《隋書·音樂志下》(卷一五）載龜兹樂部“歌曲有善善摩尼”。《悟空入竺記》(《遊方記抄》二）稱：“安西境内有前踐山、前踐寺。”[37] 所謂“安西”即安西都護府，治龜兹國都城，“前踐寺”即今庫車附近森姆塞姆（Simsim）千佛洞。“善善”[zjian-zjian] 或“前踐”[dzian-dzian] 與“鄯善”[zjian-zjian] 均得視爲同名異譯。

“埒婁”、“輪臺”與“前踐”或“善善”等名稱同見於龜兹及其附近，表明曾有一支 Kroraimna 人來到龜兹地區。

Kroraimna 人與斯特拉波《地理志》(XI，8）所載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 Sacae 四部之一 Sacarauli 同源。Sacarauli 無妨視作 Sakā [K]rauli 之訛。Krauli 又無妨視作 Krorai[m]na 之略。質言之 Kroraimna 便是 Sakā Krorai[m]na 之訛略。[38]

樓蘭—鄯善人果真是 Sacarauli 人，則不難解釋何以犍陀羅語有很多 Toχrï 語因素。

樓蘭—鄯善的 Sacarauli 人很可能是和塞種其他三部 Tochari、Gasiani 和 Asii 一起進入西域南道的，時間應在公元前 177 / 前 176

年塞種被大月氏逐出塞地、南下葱嶺之後。此前，Sacarauli 和塞種其他三部曾長期共處於伊犁河、楚河流域，彼此有密切接觸可知。不管 Sacarauli 人的原始語言是什麼（很可能是一種東伊朗語），受到 Toχrï 語的影響不可避免。而獨處樓蘭—鄯善一地的 Sacarauli 人的語言終於在貴霜王國的影響下，發展成獨具特色的、以婆羅謎文爲載體的、有 Toχrï 語因素的犍陀羅語不是不可想像的。

2. 一說回鶻文題識中的 twγry 與粟特語《國名表》（nāfnāmak）中指稱吐火羅人的名稱 'tγw'r'k 對音不盡相符，此 *twγry* 大約相當於粟特文《九姓回鶻可汗碑》（Karabalgasun Inscription）[39]、《突厥文摩尼教文書》題識[40]和中古波斯語摩尼教頌歌[41]中的“四 Twγry”（ctβ'r twγr'k），包括別失八里（Bišbalïq）、高昌（Qočo）等地。[42]

今案：此說未免執著。“四 Twγry”果然指別失八里等地，則很可能是因爲在《九姓回鶻可汗碑》等描述的時代，上述諸地均爲吐火羅人所據有。至於 twγry 與粟特語《國名表》中指稱吐火羅的名稱 'tγw'r'k 對音不盡相符，則既可能是由於迻譯者不明究竟造成的，更可能是迻譯者有意爲之，以區別同名的不同政治或地理實體。這兩種情況屢見於中國古代典籍所載西域國名、族名，粟特文書也許並不例外。

何況“四 Twγry”僅僅是焉耆一地的名稱，並不是用來指稱上述諸地的。[43]

3. 1980 年蘇聯 Л. Ю. Тугушева 刊佈《回鶻文譯本〈玄奘傳〉第五卷殘卷》，共 16 葉，對應於漢文《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

末至卷終，計 270 言。[44] 這是玄奘回國路程中從塔什庫爾幹到長安的一段歷程，所述及的三十多個地名大部份在今新疆地區。最值得注意的是，回鶻語譯文以 Toχrï 對譯玄奘所記之“覩貨羅故國”。一說此“覩貨羅故國”究竟何指未有定論。應是月氏自敦煌向西南發展，過婼羌以西時所建，故回鶻語之 Toχrï 實指月氏族云。[45]

今案：《大唐西域記》卷十二載：自尼壤城東“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國”。“覩貨邏”一名亦見同書卷一：

> 出鐵門至覩貨邏國（舊曰“吐火羅國”，訛也）故地，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阨葱嶺（Pamir），西接波剌斯（Persia），南大雪山（Hindukush），北據鐵門（Shahr-i Sabz 南 90 公里），縛芻大河（Amu Daria），中境西流。

所謂“覩貨邏國故地”，無疑卽西史所謂 Tokharestan，故《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的“覩貨羅”應指 Tukhāra。

《新唐書·西域傳》載于闐之東大砂磧名“圖倫磧”，“圖倫”[da-liuən] 亦得視爲 Tochari 之對譯。由此可知 Tochari 人亦曾居於于闐和且末之間。如前所述，Tochari 進入西域南北道，很可能在塞種被大月氏逐出伊犁河、楚河流域之後。

回鶻人將玄奘的“覩貨邏故國”譯作 Toχrï，說明 Toχrï 正是 Tukhāra（Tochari）的回鶻語譯，別無其他。當然，這並不表明在《玄奘傳》迻譯成回鶻語時，尼壤城之東的覩貨邏故國流行 Toχrï 語。

4.《西天路竟》(敦煌文書 S. 383) 有曰："又西行一日至高昌國，又西行一千里至月氏國，又西行一千里至龜兹國。"[46] 此處"月氏"當指"焉耆"無疑。[47]

何以宋初之人稱焉耆爲"月氏"？過去多以爲誤抄所致。其實，至少還有以下幾種可能性：

一、"月氏"和"焉耆"，音近，易誤。

二、"焉耆"得名於塞種四部之一的 Asii，但其餘各部（包括 Tochari 和 Gasiani 在内）也可能同時或先後入據該綠洲。蓋如前述，焉耆周遭山水均以"敦薨"爲名，知其地有 Tochari 人。竟稱"焉耆"爲"月氏"，則可能在《西天路竟》描述的時代，"月氏"則 Gasiani 人一度顯示了他們的存在。

三、焉耆與月氏之前身有密切的親緣關係，焉耆一地的 Asii 人中可能含有 Gasiani 人，衹要其地實際上被後者控制，焉耆一地也就被稱爲"月氏"了。

《路竟》撰寫於宋初，去焉耆立國已遠，什麽情況都可能發生，難以揣度。

5. 鳩摩羅什（344—413 年）所譯《大智度論》卷二五有"兜呿羅（小月氏）"一語。[48] 按之鳩摩羅什的年代，此處所謂"小月氏"很可能指領有吐火羅斯坦的寄多羅貴霜人。

"兜呿羅"無疑指吐火羅斯坦，主要位於今阿姆河南岸。公元五世紀，或者説鳩摩羅什在世的年代，據有該地的是寄多羅貴霜人。由於種種原因，貴霜一直被稱爲"大月氏"，寄多羅人既以貴霜自居，則被鳩摩羅什稱爲"月氏"毫不奇怪，著一"小"字，

可能是爲了區別於此前的“大月氏”，亦即一統興都庫什山南北的大貴霜國。

應該指出的是，寄多羅貴霜在《魏書·西域傳》中是被稱爲“大月氏國”的：

> 大月氏國，都盧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

《魏書·西域傳》所描述的寄多羅貴霜之勢力範圍包括興都庫什山南北，和公元二世紀極盛時期的大貴霜國差可比擬。寄多羅貴霜既爲大貴霜國之繼承者，故《魏書》稱之爲“大月氏國”。但寄多羅王“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云云，鳩摩羅什已不及見。他僅知寄多羅貴霜人“都盧監氏城”而已，故以“小月氏”稱之。

《魏書·西域傳》另有“小月氏國”：

>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

這裏的"小月氏"應指寄多羅王爲"匈奴"卽嚈噠人逐出吐火羅斯坦西徙後、盤踞富樓沙（Puruṣapura，卽今白沙瓦）的寄多羅貴霜殘餘勢力，這情形在《魏書》編者看來頗類似《漢書·西域傳》所載大月氏爲匈奴所逐遠去，"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因而稱之爲"小月氏國"。[49]嚈噠勢力進入吐火羅斯坦，當在437年之後，故鳩摩羅什所謂"小月氏"與《魏書·西域傳》的小月氏無涉。

■ 注釋

[1]E. Leumann, "Über eine von den unbekannten Literaturspachen Mittelasiens." *Mémoire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t.-Pétersbourg* VIIIe série, IV~8 (1900): pp. 1-28. 參看耿世民"古代維吾爾語佛教原始劇本'彌勒會見記'（哈密寫本）研究",《新疆文史論集》,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1年, pp. 170-194, esp. 174-175。

[2] F. W. K. Müller, "Beitrag zur genaueren Bestimmung der unbekannten Sprachen Mittelasiens."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asse*. Berlin, 1907, pp. 958-960.

[3] E. Sieg, "Ein einheimischer Name für Toχrï."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asse*. Berlin, 1918, pp. 560-565.

[4] 王靜如"重論ārśi，ārgi與焉夷、焉耆"，《王靜如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8年，pp. 153-162，論述這一問題以此文最中肯綮。另請參看黃

盛璋“試論所謂‘吐火羅語’及其有關的歷史地理和民族問題”，《西域史論叢》第2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pp. 228-268。

[5] F. W. K. Müller, “Toχrï und Kuišan (Küšä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asse*. Berlin, 1918, pp. 566-586. F. W. K. Müller und A. von Gabain, “Uigurica IV.”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asse*. Berlin, 1931, pp. 675-727. 羽田亨“吐魯番出土回鶻文摩尼教徒祈願文の斷簡”，《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言語宗教篇》，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8年，pp. 325-347。

[6] E. Sieg und W. Siegling, “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Indoskythe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asse*. Berlin, 1908, pp. 915-932.

[7] 有關Toχrï語在語言學上地位的論著很多，例如：Douglas Q. Adams, “The Position of Tocharian among the Other Indo-European Languag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3 (1984): pp. 395-402，等等。

[8] 關於原始印歐語系部落以及吐火羅人的起源有許多討論，參見徐文堪“揭開吐火羅人起源之謎”，《吐火羅起源研究》，昆侖出版社，2005年，pp. 49-103。

[9] 《大唐西域記》卷一：“阿耆尼國（Angi）……文字取則印度，微有增損。”“屈支國（Kucha）……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又記：“覩貨邏國（Tokhāra）……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逾廣窣利。”

[10] W. B. Henning, “The Bactrian Inscrip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23 (1960): pp. 47-55.

[11] 注 5 所引 F. W. K. Müller und A.von Gabain 文。1958 年，W. Winter 和 A. V. Gabain 發表了一件 Toχrï 語 B 與回鶻語合璧的摩尼教頌文（編號：U 103 T III D 260, 19; 260, 30）。在這件文書裏，明確用 Küsän 一詞指稱 Toχrï 語 B。見 A. von Gabain with W. Winter,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X. Ab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Klasse für Sprachen, Literatur und Kunst*. 1956, Nr. 2. Berlin, 1958, Nr. 2。有關研究見 Вяч. Вс. Иванов, "К Определению Названия «Тохарского В» Языка."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1959, 5: pp. 188-190。另請參看耿世民"哈密本回鶻文'十業道譬喻鬘'初探",《維吾爾古代文獻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 年，pp. 300-311。

[12] 關於大夏及其前身陶唐氏的詳細考證，見本書上卷第一篇："大夏溯源"。

[13] E. L. Stevensen, tr. & ed. *Geography of Claudius Ptolemy*. New York, 1932.

[14] 參看余太山"托勒密《地理志》所見絲綢之路的記載",《早期丝绸之路文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pp. 145-164。

[15] 例如：A. V. Gutschmid, *Geschichte Irans und seiner Nachbarländer: von Alexander dem Grossen bis zum Untergang des Arsaiden*. Tübingen, 1888, p. 61; W. W. Tarn, *The Greek in Bactria and India*. London: Cambridge, 1951, pp. 283-287。

[16] 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Oxford, 1957, p. 181.

[17] H. L. Jones, tr.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8 vols. London, 1916-1936.

[18] 持此說者，最早似乎爲 F. F. von R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vol. 1. Berlin, 1877, p. 439；注 15 所

引 W. W. Tarn 書，pp. 283-287，也有類似觀點。

[19] 王靜如“吐火羅及吐火羅語”，《王靜如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8 年，pp. 89-152。原載《中德學志》第 5 卷第 1、2 期合刊（1942 年）。

[20] 有證據表明，大宛人亦操 Toχrï 語。見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6, pp. 9-39。

[21] 關於大月氏及其前身有虞氏的詳細考證，見本書上卷第二篇：“有虞氏的遷徙”。

[22] D. Grene. tr. Herodotus, *The History*.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23] 關於允姓的詳細考證，見本書上卷第三篇：“允姓之戎考”。

[24]《廣弘明集》卷七，《大正新脩大藏經》T52，No. 2103, p. 129。

[25] W. B. Henning,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 In G. Ulmen, ed. *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The Hague, Paris, New York, 1978: pp. 215-230.

[26] T. B. Гамкрелидзе & Вяч. Вс. Иванов, “Первые индоевропейцы в истории: предки тохар в древней Азии.” *Вестник древрней истории* (1989/1): pp. 14-39. 漢譯文爲“歷史上最初的印歐人：吐火羅人在古代中東的祖先”，注 8 所引徐文堪書，pp. 397-437。此文繼承和發展了 Henning 說。

[27] 段渝“古代巴蜀與南亞和近東的經濟文化交流”，《社會科學研究》1993 年第 3 期，pp. 48-55, 73。

[28] 徐朝龍“中國古代‘神樹傳說’的源流”，西江清高編《扶桑與若木——日本學者對三星堆文明的新認識》，巴蜀書社，2002 年，pp. 205-228。

[29] 參看李學勤“三星堆與蜀古史傳說”，《走出疑古時代》，遼寧大學出版社，

1994年，pp. 204-214。又，《玉海》卷一百三引“若水”作“弱水”，錄以備考。

[30] 林梅村“祁連與昆侖”，《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pp. 64-69。

[31] 注20所引E. G. Pulleyblank文；E. G. Pu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II.” *Asia Major* 9 (1962), pp. 206-265, esp. 246-248. W. Samolin, “Ethnographic Aspects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Tarim Bas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 (1958): pp. 45-67; 以及Henning注25所引文。

[32] 伯希和“吐火羅語與庫車語”，馮承鈞譯，伯希和、烈維《吐火羅語考》，中華書局，1957年，pp. 111-133; P. Boodberg, “Two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rdies* 1 (1936): pp. 283-307, esp. 290-291; E. G. Pulleyblank,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Vowel Systems of Old Chinese and Written Burmese.” *Asia Major* 10 (1963): pp. 200-221, esp. 206-207.

[33] 周及徐《漢語印歐語詞彙比較》，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pp. 190, 364-365。Cf. E. G. Pulleyblank, “Why Tocharians?” *The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23 (1995): pp. 415-430.

[34] 引自注15所引W.W. Tarn書，p. 286; 注16所引A. K. Narain書，p. 162.

[35] 黃文弼“重論古代大夏之位置與移徙”，《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pp. 81-84。

[36] T. Burrow, “Tokharian Elements in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5, pp. 667-675; H. W. Bailey, “Ttaugar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8 (1937): pp.

883-921.

[37]《大正新脩大藏經》T51, No. 2089, p. 980。

[38] 以上關於鄯善國名義、鄯善人來源的考證詳見余太山“樓蘭、鄯善、精絕等的名義——兼說玄奘自于闐東歸路線”,《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 中華書局, 2003 年, pp. 477-485。

[39]O. Hansen, “Zur soghdischen Inschrift auf dem dreisprachigen Denkmal von Karabalgasun.”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44 (1930): pp. 3-39, esp. 20.

[40] A. von Le Coq, “Türkische Maniehaica aus Chotscho I.” *Phil.-hist. Khasse. 1911. Anhang. Abh.* VI. Vorgelegt von Hrn. Müller in der Sitzung der phil.-hist. Klasse am 19. Oktober 1911, Zum Druck verordnet am gleichen Tage, ausgegeben am 25, April 1912: pp. 393-451, esp. 417.

[41] F. W. K. Müller, “Handschriften-Reste in Estrangelo-Schrift aus Turfan, Chinesisch-Turkestan I.”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asse*. Berlin, 1904, pp. 348-352, esp. 351.

[42] W. B. 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9 (1938): pp. 545-571.

[43] 黃盛璋注 4 所引文, esp. 209-216。

[44] Л. Ю. Тугушева, *Фрагменты Уйгурской версии Биографии Сюань-изана.* Москва, 1980.

[45] 黃盛璋“回鶻譯本《玄奘傳》殘卷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與對音研究”,《西北史地》1984 年第 3 期, pp. 9-32。

[46]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

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pp. 170。

[47] 黃盛璋“敦煌寫本《西天路竟》歷史地理研究”，《歷史地理》創刊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pp. 10-20。王仲犖《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p. 310。

[48]《大正新脩大藏經》T25, No. 1509, p. 243。

[49] 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pp. 66-75。

上卷

一　大夏溯源

《史記·大宛列傳》所見“大夏”可溯源於《左傳》所見“大夏”亦即陶唐氏。茲爲方便起見，從《史記·大宛列傳》的大夏開始追溯。

一

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這是西漢使臣張騫於武帝元光六年（前 129 年）到達阿姆河流域瞭解到的情況。當時大夏已被大月氏征服，即所謂“臣畜大夏”。大月氏的前身月氏原居今祁連山和天山之間，約公元前 177 / 前 176 年被北亞新興的遊牧部落匈奴擊敗，大部份放棄

故地西遷伊犂河、楚河流域，史稱這部份西遷的月氏人爲“大月氏”。約公元前130年，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受到烏孫的攻擊，被迫再次西遷，抵達阿姆河流域，擊敗主要位於河南的大夏國，設王庭於河北，統治跨有阿姆河兩岸的大夏地。[1]

被大月氏征服的大夏國，一說應卽希臘巴克特里亞（Graeco-Bactria）王國，[2] 一說乃來自巴克特里亞以外的 Tochari（吐火羅）人所建。[3] 今案：前說未安。

一則，“大夏”不可能是 Bactria 或其他與巴克特里亞王國有關的名稱之對譯。

二則，《史記·大宛列傳》明載，大夏“無大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這與已知希臘巴克特里亞的情況不合，後者是在一個國王的統治之下。[4]

三則，《史記·大宛列傳》記大夏被大月氏“攻敗”，乃因“兵弱，畏戰”，這與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情況也不相符。

與此相對，大夏國係吐火羅人所建則有如下證據：

1.“大夏”[dat-hea] 可以視爲 Tochari 的確切對譯。

2. 根據比較可信的說法，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亡於公元前140年左右，也就是說當大月氏自伊犂河、楚河流域遷往阿姆河流域時，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已滅亡了十年左右。因此，大月氏征服的大夏國不可能是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而據斯特拉波《地理志》[5] 記載，“從希臘人手中奪取了巴克特里亞的”是來自錫爾河彼岸的遊牧的塞種（Sacae）諸部“Asii、G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XI，8）《史記·大宛列傳》“無大君長”云云，

也許正反映了進入巴克特里亞的塞種各部互不統屬的局面。至於張騫稱塞種諸部治下的巴克特里亞爲“大夏”，則可能是因爲當時吐火羅人是諸部名義上的宗主；否則，便是吐火羅人佔壓倒多數的緣故。[6]

3. 可能是由於大夏已經亡於大月氏，《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並沒有詳細記載大夏國的四至，僅僅說該國位於大宛國（今費爾幹納）的西南，其東南爲身毒國（今印度河流域）。但是，大夏國的四至可以從大月氏國的四至推知。蓋據《漢書·張騫傳》，烏孫“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可知西徙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所據有者主要爲原大夏國領土。而據《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的有關記載，不難得知大月氏北與康居（當時領有索格底亞那），東北與大宛、西與安息（卽帕提亞朝波斯，東界爲木鹿城）、南與罽賓（喀布爾河中下游，北界爲興都庫什山）、東與無雷（小帕米爾）和難兜（Gilgit 河下游）。[7] 其地望與《大唐西域記》卷一所載“覩貨邏國（Tukhāra）故地”相符：

> 出鐵門至覩貨邏國（舊曰“吐火羅國”，訛也）故地，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阨葱嶺（Pamir），西接波剌斯（Persia），南大雪山（Hindukush），北據鐵門（Shahr-i Sabz 南 90 公里），縛芻大河（Amu Daria），中境西流。

既然大月氏立國的“大夏地”卽“覩貨邏國故地”，“大夏”則應

係 Tochari（Tukhāra）之對譯，大夏國應係吐火羅（覩貨邏）人所建；此所以《新唐書·西域傳下》逕稱“大夏卽吐火羅也”。

證明大夏國係吐火羅人所建，還有一個問題有待澄清。公元前 130 年西遷的大月氏征服大夏這一事件在古代中亞史上曾產生深遠影響，但大月氏卻不見載於西方史籍。因此，有的學者在指大夏國爲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同時，指斯特拉波所載參與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 Tochari 人爲大月氏，試圖使斯特拉波關於 Asii、Tochari 等四部從希臘人手中奪取巴克特里亞的記載與《史記·大宛列傳》關於大月氏滅亡大夏的記載相一致。[8] 今案：此說未安。“月氏”與“吐火羅”（Tochari）對音不符，兩者不可能是同一名稱的異譯。斯特拉波所載 Asii、Tochari 等四部是塞種，而據前引《漢書·西域傳》，塞種和大月氏是有明確區分的，亦可見大月氏不可能是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的 Tochari 或其他三部中的任何一部。滅亡大夏國的大月氏不見載於西史，猶如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不見載於漢文史籍，是很正常的，毫不足怪，中西史料有時不能互相印證，卻能互相補充。

二

大夏國的吐火羅人來自伊犂河、楚河流域。

1. 據斯特拉波《地理志》記載，上述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的 Asii、Tochari 等四部“來自 Iaxartes（藥殺水卽錫爾河）彼岸、與

Sacae 和 Sogdiana 相毗連、被 Sacae 佔領的地方”。（XI，8）今案：Sogdiana 指錫爾河以南、阿姆河以北、以澤拉夫善河流域爲中心的地區。Sacae 指 Sacae 卽塞種的原居地，亦卽伊犂河、楚河流域（《漢書·西域傳》所謂“塞地”）。[9] 由此可見，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包括 Asii、Tochari 在內的四部塞種來自“塞地”與索格底亞那之間的地區。塞種佔領這一地區的時間不能確知，但最早可能在公元前六世紀二十年代，亦卽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卽位（前 521 年）之前。

2. 大月氏被匈奴擊敗，西遷至伊犂河、楚河流域時，將該處的塞種逐走。於是一部份塞種南下帕米爾，另一部份則退縮至塞地和索格底亞那之間的地區。很可能由於繼續受到來自東方强鄰的壓力，包括若干 Tochari 人在內的部份塞種終於在公元前 140 年左右南渡錫爾河，經索格底亞那，侵入希臘人統治下的巴克特里亞，佔領了主要位於阿姆河南岸的後來被稱爲吐火羅斯坦的地區，《史記·大宛列傳》所見大夏國於是成立。

3. 可能在部份塞種南下巴克特里亞的同時，另有一支以 Tochari 人爲主的塞種進入費爾幹納盆地，建立了《史記·大宛列傳》所見大宛國。“大宛”[dat-iuan] 亦得視爲 Tochari 之異譯。[10]

順便説一下，南下帕米爾的塞種中，有一部份進入西北次大陸，另有一部份則可能東向進入塔里木盆地諸綠洲，後者之中亦有吐火羅人，證據如下：

1.《漢書·西域傳》所見西域南北道若干國名和地名，例如：“渠勒”[gia-lek]、“桃槐”[do-huəi]、“渠犂”[gia-lyei]、“單

桓”[duat-huan]、“兑虚”[duat-khia]、“丹渠”[tan-gia]，均得視爲Tochari之異譯。[11]

2.《水經注·河水二》載焉耆國周遭山水皆以“敦薨”爲名。“敦薨”[tuən-xuəng]亦得視爲Tochari之異譯，知焉耆之地亦有Tochari人。[12]

3.《大唐西域記》卷一二載：自于闐東境，“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卽沮末地也”。知Tochari人亦曾居於于闐和且末之間。[13]《新唐書·西域傳》載于闐之東大砂磧名“圖倫磧”。“圖倫”[da-liuən]亦得視爲Tochari之對譯。

4.《歷代名畫記》卷九稱：“尉遲乙僧，于闐國人。”《唐朝名畫錄·神品下》則稱之爲“吐火羅國人”（《太平廣記》卷二一一引《唐畫斷》作：“土火羅國胡人也。”）知于闐國内亦有吐火羅人。尉遲乙僧國籍爲于闐，族屬則爲吐火羅；此所以乙僧作爲吐火羅人而被冠以于闐國姓“尉遲”。《唐朝名畫錄》稱“吐火羅國人”，不確。

三

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大夏卽吐火羅人來自河西乃至河套地區。

1.《管子·小匡篇》載齊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遂至於石沈，縣車束馬，踰太行與卑

耳之谿，[14] 拘泰夏，[15] 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從”。同書“封禪篇”亦稱：“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國語·齊語》所載與“小匡篇”略同，唯“卑耳”作“辟耳”，“西虞”作“西吳”。[16]

這幾則記載中的“大夏”（或“泰夏”）無疑同在一地，但究竟在何處，歷來有不同見解。一説此大夏在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左傳·僖九年傳》稱：“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杜注：高梁“在平陽縣西南”。説者以爲齊桓公伐晉之師僅及高梁，而《史記·封禪書》述桓公之言稱“西伐大夏”，大夏之在平陽，明矣。[17] 另説此大夏在河西。蓋卑（辟）耳山應即《漢書·地理志下》所載北地郡之卑移山（今賀蘭山），“流沙”應即賀蘭山西北的騰格里沙漠。桓公乃由今山西北境西行，經陝西北部，至寧夏渡河，過“卑耳山”，復西行，經“流沙”之南，抵達大夏。[18]

今案：後説較勝，此大夏應在甘肅境内。若按《史記·封禪書》“索隱”，“卑耳山”在“河東大陽”，則“流沙”無法落實。“西伐大夏”並不是指“伐晉”。

2.《山海經·北山經》：“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椶、枏，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山、水指今祁連山、黨河；澤指今黨河、疏勒河所注哈拉湖（Kara nor）。漢代“敦煌”[tuən-huang] 郡應得名於“敦薨”[tuən-xuəng]。“敦薨”與“大夏”得視爲同名異譯，上述山水皆因大夏人而得名。[19] 知直至河西走廊西端均曾有大夏人活動。

3.《穆天子傳》卷四載：“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

陽紆之山，三千又四百里；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澤、昆侖之丘，七百里。”其中，“西夏”一般認爲指大夏。蓋據《呂氏春秋·古樂篇》，“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阮隃卽昆侖；《說苑·修文篇》、《風俗通義·聲音篇》引此皆作“崑崙”。[20] 西夏與大夏均在昆侖之東，係赴昆侖所必由，故可以認爲西夏卽大夏。或以爲此處昆侖不妨指爲今阿爾泰山。[21] 果然，伶倫所自“大夏”，亦卽西去昆侖之丘二千又二百里的“西夏”，當在河西地區。之所以稱河西之大夏爲“西夏”，很可能是因爲大夏之故地更在其東。《穆天子傳》西晉時出土於汲郡戰國魏襄王（前 318—前 296 年）墓，成書年代當早於公元前三世紀，所描述的時代至遲爲春秋，故所載“西夏”或卽齊桓公所征討的大夏。

4. 托勒密《地理志》[22] 所載 Thaguri 人、Thaguri 山和 Thogara 城（VI，6）均應位於河西地區，業已由對藏語、和闐語有關文書的研究得到了證實。[23] Thaguri、Thogara 均得視爲“大夏”的對譯，可見河西地區的大夏人亦卽吐火羅人。今日疏勒河三角洲之南榆泉盆地尚有地名“吐火洛泉”，亦可爲證。

5. 不僅河西曾見大夏卽吐火羅人活動，更東南的臨夏地區亦有其遺蹟。《漢書·地理志下》載隴西郡有縣名“大夏”。《水經注·河水二》則載：洮水“左會大夏川水……又東北逕大夏縣古城南”，可以爲證。[24] 這說明大夏更可溯源於河西以東。

四

河西及臨夏的大夏卽吐火羅人遷自晉南。

1.《左傳·昭元年傳》:“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杜注:“大夏，今晉陽縣。”然《史記·鄭世家》“集解”引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參星。”

又，《左傳·定四年傳》:“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杜注:“夏虛，大夏，今大原晉陽也。”然《史記·鄭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

今案：唐叔虞所封夏虛當在翼城。據《史記·晉世家》,“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晉陽則在汾水之西，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汾澮之間，知翼城有大夏之虛。[25]

2.《呂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者：……大夏之鹽。”鹽指解池之鹽，故此大夏當在安邑。[26]《戰國策·秦策四》:“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朝爲天子，天下皆從。”“乘夏車，稱夏王”者，蓋以其國都安邑（今夏縣）所在本爲夏

虛卽大夏之虛。[27]《史記·鄭世家》“正義”引《地記》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屬河東安縣。今在絳城西北一百里有唐城者，以爲唐舊國。”《地記》以爲唐叔虞所封在安縣卽安邑，蓋安邑亦有夏虛。

3.《史記·秦始皇本紀》及同書“李斯列傳”均有“禹鑿龍門，通大夏”之語，此大夏在鄂，蓋去龍門最近。《史記·晉世家》“集解”引《世本》稱唐叔虞“居鄂”。又引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正義”則說：“《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按：與絳州夏縣相近。”[28]今案：鄂地（今臨汾西鄉寧縣）雖未必爲唐叔虞所居，但無妨亦有大夏之虛。

4.《左傳·定四年傳》杜注稱夏虛卽大夏，在太原晉陽。其根據一般認爲是《漢書·地理志上》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龍山在西北。有鹽官。晉水所出，東入汾。”[29]唐叔虞所封當在翼城，杜注未必正確，已如前述，班固指晉陽爲唐叔虞所封很可能是相傳其地有夏虛的緣故。其實，唐叔虞所封在夏虛，夏虛所在未必唐叔虞所封。由此可見，晉陽也應當有夏虛卽大夏之虛。

一說有大夏之虛的晉陽不在太原，而在虞鄉。《史記·六國年表》魏哀王十六年：“秦拔我蒲阪、晉陽、封陵。”同書“魏世家”所記略同，唯“晉陽”誤倒作“陽晉”。“正義”：“陽晉當作晉陽也，史文誤。《括地志》云：晉陽都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封陵亦在蒲州。”可證虞鄉確有晉陽。[30]

另說有大夏之虛的晉陽不在太原，而在臨汾西，卽平陽。《魏

書·地形志上》載晉州平陽郡平陽縣“有晉水。”《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亦云：“平陽河水，一名晉水。”又，《水經注·汾水》：“汾水南與平水合，水出平陽縣西壺口山……其水東逕狐谷亭北……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俗以爲晉水，非也。”實際上也承認平水一名晉水。平水既可稱爲晉水，則平陽也可稱爲晉陽。[31]

又，杜注之所以指太原爲唐叔虞所封，無非是因爲其地南臨晉水，改唐爲晉，有根有據。然而，霍山以北，至悼公以後始開邑縣，前此未見所傳。[32] 因此，太原晉陽亦有大夏之虛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指爲唐叔虞所封卻未必可靠。與此相對，平陽又名晉陽，其地南有平水卽晉水，若爲唐叔虞所封，則不難說明後來的改唐爲晉。這就是說，平陽既可能是大夏之虛，又可能是唐叔虞所封。果然，“河、汾之東”、“汾、澮之間”的翼城祇是大夏之虛，並非唐叔虞所封也未可知。

5.《史記·吳太伯世家》：“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集解”引徐廣曰：“在河東大陽縣。”“索隱”則稱：“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虛。”今案：安邑有大夏之虛，虞仲所都因在安邑南而曰夏虛，則大陽（今平陸縣）之夏虛亦得爲大夏之虛。[33]

綜上所述，晉南曾有大夏人活動殆無疑義。晉南的大夏人，與河西乃至西域的大夏人一樣，同爲吐火羅人的可能性自然也不能排除。

五

證實卜辭所見土方便是大夏，可以加深以上認識。

1. 土方與大夏地望相同。卜辭既稱：

> 癸巳卜，㱿，貞旬亡囚。王固曰：㞢［希］，其㞢來嬉。气至五日丁酉，允㞢來［嬉自］西。沚馘告曰：土方征于我東啚，𢦏二邑，𢀛方亦帰我西啚田。（《合集》6057正）

知土方在殷之西；卜辭又稱：

> 王固曰：㞢希，其㞢來嬉。气至九日辛卯，允㞢來嬉自北，奻妻笅告曰：土方帰我田十人。（《合集》6057反）

知土方在殷之北，故可以認爲土方在殷之西北。[34]

又，土方常與𢀛方、下危同貞，且常被戉人征伐；𢀛方、下危和戉皆在殷之西北，則土方亦應在殷之西北。[35] 土方既在殷之西北，也就無妨認爲土方在晉南之地。

一說奻在沁陽之北，土方既在沚之東，當在奻之西，疑卽唐杜之杜。[36] 今案：此說未安。就地望而言，土方在沁陽之西北，無妨指爲晉南、甚或翼城之地。然就名稱而言，“唐杜”猶如“陶唐”，“唐”卽是“杜”；唐杜既爲陶唐氏後人於周代徙居之地（詳下），指土方爲唐杜，不如指爲唐卽實沈所遷大夏。

2. 禹之所治土方原爲大夏之墟。

《詩·商頌·長發》:"禹敷下土方。"[37] 又,《楚辭·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38] 而據《史記·封禪書》"正義"引《世本》:"夏禹都陽城……又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如前所述,平陽、安邑、晉陽均可能有大夏之虛。

3. 殷征土方多在武丁時期,武丁以後十分罕見。其答案可求諸卜辭本身:

貞乍大邑于唐土。(《英藏》1105)

己卯卜,爭,貞王乍邑,帝若,我从之唐。(《乙》570,《合集》14200 正)

唐土卽大夏地,武丁封築大邑於大夏地而土方之侵叛大爲減少,也說明土方便是大夏。[39]

4. "土方"之"土"不妨視爲"大夏"之"大","土[方]"是"大夏"的省稱。晉南的大夏便是土方,"土[方]"又可視爲"吐火羅"最貼切的省稱,更見晉南的大夏人就是吐火羅人。

5. 唐卽翼城西北(今石樓一帶)亦有土方活動之遺蹟,可以佐證。《水經注·淇水》:"魏徙九原、西河、土軍諸胡,置土軍于[頓]丘側"。又,《元和郡縣圖志·河中府·隰州》(卷一二):

石樓縣,本漢土軍縣也,屬西河郡,晉省。後魏孝文帝於此城置吐京郡,卽漢土軍縣,蓋胡俗音訛,以軍爲京也。

隋開皇五年又以吐京屬隰州，十八年改吐京爲石樓縣，因縣東石樓山爲名也。……縣理城，漢土軍城也。

又同書卷一三“汾州條”：

魏黄初二年，乃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即今州理是也。……後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復於茲氏舊城置西河郡，屬吐京鎮。按吐京鎮，今隰州西北九十里石樓縣是也，十二年改吐京鎮爲汾州，西河郡仍屬焉。

傳世銅器既有戰國時“土匀（軍）量器”，知石樓之得名“土軍”早於漢代，最遲也可上溯至東周。[40]“土軍”[tha-kiwən] 或“吐京”[tha-kyang] 均得視爲 Tochari 之略譯。

晉南的大夏人何時遷往河西不得而知，但至遲在前七世紀五十年代末河西已有大夏人。除了遷往河西外，似乎還有一支大夏人自晉南遷往晉北或河套以北。《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帝二十八年（前 219 年）所作“琅邪臺銘”稱：“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其中的地名“大夏”或者便是這支北遷大夏人的遺蹟。

六

晉南的大夏可溯源於陶唐氏，亦即以堯部落爲宗主的部落聯

合體。

《尚書·五子之歌》“正義”引《世本》稱“帝堯爲陶唐氏”，《漢書·律曆志下》引《世經》亦載：

> 《帝繫》曰：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封於唐。蓋高辛氏衰，天下歸之。……天下號曰陶唐氏。

或以爲“陶唐”或“唐”始見《國語》、《左傳》，爲一古國，地在夏虛，至周初始最終滅亡，其實與堯無關。蓋《呂氏春秋·古樂篇》歷敍朱襄氏、葛天氏、陶唐氏、黃帝、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等樂，並列陶唐氏與帝堯，且置陶唐氏於黃帝之上，可見陶唐氏並非帝堯。《鶡冠子·世兵》云：“堯伐有唐”，亦可證堯與唐是二非一。[41] 今案：其說有所未安。

一則，《左傳》有關陶唐氏的記載應該是關於堯的記載，而不是堯所伐有唐氏的記載。

1.《左傳·襄二十四年傳》：“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杜注：“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國語·晉語八》亦載陶唐氏之裔“在周爲唐杜氏”。韋注：“唐、杜，二國名。豕韋自商之末，改國於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今案：視唐、杜爲二國者非是。“唐”、“杜”[da] 猶如“陶”、“唐”皆得視爲同名異譯。彝器有杜伯鬲，銘云：“杜白（伯）乍（作）叔嫞障鬲。”

“媿”即祁，《左傳·文六年傳》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云云；知杜國祁姓。[42]既然“唐杜氏”姓祁，其先祖陶唐氏亦應姓祁，知此處“陶唐氏”指堯無疑。蓋《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帝王紀》云：“帝堯陶唐氏，祁姓也。”[43]

2.《左傳·襄九年傳》所謂“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說的是堯繼高辛氏卽位後，以居商丘之閼伯爲火正。堯卽陶唐氏興起於高辛氏之後；既然“天下歸之”，高辛氏之子閼伯爲陶唐氏之火正不足爲怪。

《左傳·昭元年傳》所謂“高辛氏”卽帝嚳；“后帝”，杜注：“堯也”。或以爲“后帝”指高辛氏，且據上引“襄九年傳”的記載以爲陶唐氏卽高辛氏。[44]今案：後說未安。“后帝”卽使如說者所言指高辛氏，也不可能由此得出高辛氏卽陶唐氏的結論。高辛氏果卽陶唐氏，其子實沈便是唐人，“唐人是因”便無從談起。

3.《左傳·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令德之後”云云，非堯莫屬。

4.《左傳·昭二十九年傳》：“有陶唐氏旣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旣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御龍氏旣爲陶唐氏之胤，則此處陶唐氏亦指堯，與“襄二十四年傳”所見同。

5.前引《左傳·定四年傳》所謂“唐誥”無疑是指堯之誥命。

6.《左傳·哀六年傳》:"《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45] 今案:"乃滅而亡"應即前引"昭二十九年傳"所謂"有陶唐氏既衰",故此處"陶唐氏"所指與"昭二十九年傳"相同。

二則,《鶡冠子·世兵》提到"堯伐有唐,禹服有苗",結合《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帝王紀》關於帝摯即位後封"放勛爲唐侯"的記載,不妨認爲"伐有唐"在嚳或摯在位時。堯伐唐後,被封於唐土,故稱"唐侯"。嗣後,據《史記·五帝本紀》,因摯"不善",堯始得繼位,卽《論衡·吉驗篇》所謂:"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繼位之初,堯可能以帝嚳、帝摯之號爲號;更號"陶唐氏",很可能是從嚳或摯所都之地遷往唐土的緣故。[46]

《逸周書·史記解》:"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此處"唐氏"指堯,[47] 亦可證堯卽"陶唐氏"。

三則,《呂氏春秋·古樂篇》列於堯之前的"陶唐氏"不妨認爲就是堯所伐有唐氏,或可稱爲"前有唐氏"。前有唐氏所在應卽《左傳·昭元年傳》載實沈所遷"大夏"。

1. 一般認爲,《左傳·昭元年傳》所謂"遷實沈于大夏"的"后帝"指堯。果然,實沈所遷爲堯所征服的前有唐氏之居地;其時大概在堯"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後不久。蓋"唐"[dang] 無妨視爲"大[夏]"或"吐[火羅]"的省譯。

2. 據前引《左傳·昭元年傳》可知,"大夏"之於唐人,猶如"商丘"之於商人;或者說唐人之得名於大夏,正如商人之得名於

商丘；可見就名稱而言，“大夏”即“唐”。傳文所謂“唐人”乃指堯即陶唐氏之胤，堯既在即位後遷都唐土，更號陶唐氏，其後裔自然被稱爲唐人。

3.《逸周書·史記解》：“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既然前引同篇伐共工之“唐氏”指堯，此處“唐氏”亦指堯無疑，故“西夏”應該就是遭伐後西徙的大夏即前有唐氏之一支。“唐氏伐之”乃指前有唐氏的這一支再次遭到陶唐氏之討伐。[48]

至於堯遷都於唐，何故不稱“有唐氏”，而稱“陶唐氏”，其說有四：一、《漢書·高帝紀下》師古注引臣瓚：“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二、《漢書·高帝紀下》師古注引許慎《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49]三、《尚書·五子之歌》“正義”引韋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四、《左傳·襄二十四年傳》疏以爲陶唐與唐爲名之單複，據稱：“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地以二字爲名，所稱或單或複也。”

今案：一種可能性是堯或其後裔據唐土後，曾有遷徙之舉，所遷居之地因而亦得名爲“唐”；否則，便是前有唐氏在晉南時曾有遷徙之舉，居地皆因此得名“唐”；不明真相者或譯稱爲“陶”[du]，或譯稱爲“唐”，其實均係“大夏”之略譯；“陶唐氏”一號或由此而生。陶唐氏之胤有“唐杜氏”，“唐”與“杜”亦同名異

譯，皆“大夏”之省稱，似可佐證；臣瓚與許慎所傳先後之異正可以說明這一點。

另一種可能性是“陶唐氏”之“陶”指陶丘。[50] 也就是說堯在伐有唐氏，封唐侯之前據有濟陰定陶之地。果然，則堯號陶唐氏乃自陶遷唐之故，如許氏所言。

要之，《左傳》、《國語》所載“陶唐氏”均與堯有關。堯伐有唐氏後，改號陶唐氏，不僅說明堯從此領有唐土，而且表明以堯部落爲核心與前有唐氏形成了一個新的地緣政治集團。故《左傳》、《國語》等所謂“陶唐氏”，實際上是指以堯部落爲宗主、包括前有唐氏卽大夏在内的部落聯合體。

七

以下略述堯蹟與夏虚之關係。

1.《左傳·襄二十四年傳》“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句杜注：“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結合“昭元年傳”、“定四年傳”杜注，知所謂“陶唐”乃堯所治地名、夏虚卽大夏之虚，亦卽實沈所遷、後來唐叔虞所封之地。陶唐氏伐有唐氏後一度據有該處。當然，如前所說，唐叔虞所封其實很可能在翼城，杜注以爲在太原者不確。[51]

如果指翼城爲堯所伐有唐氏之居地，則虞鄉、平陸、夏縣、平陽諸地有夏虚卽大夏之虚當爲陶唐氏之胤繁衍遷徙所致。當然，

也不排除其中若干爲前有唐氏遺蹟之可能性。

至於鄂地的大夏，很可能便是《逸周書·史記解》所見“西夏”。[52] 這就是說，很可能是因被堯所伐，前有唐氏有一支西遷至今鄉寧縣一帶，後又因“文武不行”被其東鄰所并；稱之爲“西夏”，是因爲在翼城大夏之西。[53]

另外，《逸周書·王會解》有所謂“北唐戎”，似應在翼城大夏之北，[54] 也許就在太原晉陽。如前所述，該地相傳亦有夏虚即大夏之虚。陶唐氏有一支北上到達這一帶也不是不可能的。[55] 然而，既著一“戎”字，所謂“北唐戎”或者竟是前有唐氏之一支也未可知。

2.《漢書·地理志下》中山國有唐縣，並稱：“堯山在南”。顔注引應劭曰：“故堯國也。唐水在西”；又引張晏曰：“堯爲唐侯，國於此。堯山在唐東北望都界。”[56] 今案：如果以上所述堯封唐侯乃“伐有唐”的結果，而所伐有唐氏卽大夏的說法可以接受的話，則堯最初之封地唐應求諸晉，具體而言卽唐叔虞所封大夏之虚；《漢書·地理志下》所謂：“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地則當在翼城。[57] 既然相傳大夏之虚均在晉南，且中山之唐並無類似的傳說；“堯山”、“堯國”之類若非後人附會，便是堯之後裔有一支曾遷居該處，以致該處亦有堯蹟。

3.《漢書·地理志上》河東郡平陽縣顔注引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堯或者曾遷都該地。[58] 前述平陽可能也有大夏之虚

者爲此。

4. 前引《左傳·昭元年傳》“唐人是因”，《史記·鄭世家》“集解”引賈逵曰：“唐人謂陶唐氏之胤劉累事夏孔甲，封於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服事夏、商也。”陶唐氏衰亡後，夏后氏命彭姓之豕韋氏鎮守其地。降至夏后孔甲時，據前引《左傳·昭二十九年傳》，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者因擾龍得寵，孔甲封劉累以代豕韋氏，並賜號“御龍氏”。

據《左傳·襄二十四年傳》杜注，“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孔甲以劉累代豕韋，似乎並非封劉累於豕韋氏之故地韋城，而是代豕韋氏守唐土。孔甲之封劉累，乃歸其故土。然劉累尋卽遷離唐土。[59]

《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括地志》：“劉累古城在洛州緱氏縣南五十五里，乃劉累之故地也。”緱氏南果有劉累故城，當爲劉累代豕韋氏前所居。[60]

又，據《史記·夏本紀》：“陶唐既衰，其后有劉累……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索隱”引《系本》：“豕韋，防姓”；是爲夏之豕韋氏。而《姓觿·四紙》（卷五）引《世本》則云：豕韋，“出自顓頊裔大彭之後，夏封于豕韋，因氏”。其實，防 [piuang]、彭 [beang] 音近，彭姓卽防姓。[61]《國語·鄭語》載祝融之後八姓，其中，“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韋注：“彭祖，大彭也。豕韋、諸稽，其後別封也。”知夏之豕韋氏延續至商代，一度爲商伯。《左傳·昭二十九年傳》杜注：“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

豖韋氏”；是爲商之豖韋氏。

又，《漢書·高帝紀下》師古注：“殷末豖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此處“豖韋”指劉累之後，亦卽所謂“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豖韋氏”。結合《史記·夏本紀》“集解”引賈逵曰“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以代豖韋之後。祝融之後封於豖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以及《國語·晉語八》“在商爲豖韋氏”句韋注：“商，謂武丁之後爲豖韋氏”；知商之劉姓豖韋氏始於武丁。[62]

又，劉累遷後，據《史記·鄭世家》“正義”引《括地志》，“夏后蓋別封劉累之後于［大］夏之墟，爲唐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太叔，遷唐人子孫于杜，謂之杜伯，卽范匄所云在周爲唐杜氏也”。然據《漢書·高帝紀下》師古注，“殷末豖韋遷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則成王所滅之唐並非夏后所封劉累之孫的後裔，而是殷末來自祝融之後封地的劉氏後裔。夏后所封劉累之孫及其後裔也許就是卜辭所見“土方”。土方多次侵掠商人，因而屢遭武丁征討。武丁築大邑於唐土以鎮守之，土方之叛亂始告收斂。商人遷劉累之後於唐土，恐怕也是鎮撫土方的需要。

劉累及其後裔應卽前引《左傳·襄二十四年傳》所謂御龍氏、豖韋氏、唐杜氏，也就是《左傳·昭元年傳》所謂“服事夏商”的唐人。除服事夏商周者外，晉地其他陶唐氏也有一部份先後踏上了北遷、西徙之路。其時間無法確指，很可能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如果相信《韓非子·說疑》關於“舜偪堯”之類記載，[63]則不妨

認爲早在舜繼位之初，這種遷徙的序幕已經揭開。

西遷者已如前述，北遷的陶唐氏可能就是《逸周書·王會解》所載貢“兹白牛”的大夏，亦卽同篇所附“伊尹朝獻篇”與“月氏”同列於“正北”的“大夏”，更可能就是始皇帝二十八年作“琅邪臺銘”所見“大夏”；但在銘文所描述的時代，其地當在太原之北。

八

以下是西域大夏遷自晉南的一些情況證明。

1. 西域大夏卽吐火羅的信息是張騫首次西使獲得的。張騫這次西使的目的地原是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國，由於大月氏西遷，跟蹤而至阿姆河流域，纔得知有大夏國。張騫在大夏地逗留了一年多，對當地的風土人情可以說有了較充分的瞭解。因此，他採用“大夏”這一古稱命名一個由吐火羅人建立的、當時業已臣服大月氏的國家，顯然不會僅僅出於爲 Tochari 找一確切音譯的考慮。他稱呼大夏國所臨阿姆河（該河時名 Vakhshu 卽 Wakshu[64]）爲“嬀水”，考慮到晉南有一條嬀水顯然是一個重要因素。《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皇甫謐曰：“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虞鄉，如前所述，相傳有夏虛卽大夏之虛。張騫採用“大夏”這一名稱時，也許想到了晉南乃至虞鄉的大夏。

2. 張騫首次西使旨在聯合月氏共同抵抗匈奴，雖因形勢變化，

這一具體目的未能實現，然張騫此行往返一十三年，備歷艱辛，終於使西域諸國與西漢開始了雙向的交往，即史遷所謂“鑿空”，可以說厥功甚偉。但是，《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在敍及張騫出使西域的功績時，提到的僅僅是“使絕域大夏”，隻字未及使大月氏、大宛、康居之事（《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在論說張騫首次西使時，同樣突出大夏，不及其餘）。足見時人評價張騫西使是如何偏重大夏的發現！《漢書·敍傳下》竟用“博望杖節，收功大夏”八字總結張騫的一生，也就不足爲怪了。

又據《史記·西南夷列傳》，張騫歸國，“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從此，西漢開始大規模經營西南夷，並自元鼎六年（前111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先後設置了牂牁、越嶲、沈黎、汶山、武都、益州等郡；據同書“大宛列傳”，置郡的目的主要在於“欲地接以前通大夏”，而武帝確曾遣使十餘輩，企圖“出此初郡抵大夏”，終因昆明阻撓而未果。武帝不顧當時客觀條件，大事西南夷，正是張騫“盛言”的結果，可見張騫有關大夏的報告必有能深深打動武帝的地方。

嗣後，據《史記·大宛列傳》，“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乃說武帝通使烏孫，其辭曰：“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果以爲然，命騫使烏孫。據同傳，“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諸旁國”。張騫卒“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

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由此可知，張騫使烏孫雖有聯結烏孫抵抗匈奴的目的在，但歸根結蒂還是爲了招徠大夏，而大夏使者隨騫副使俱來，簡直被視作西北國通於漢的標識。

太初年間，李廣利征大宛，初戰不利，敗歸敦煌，公卿、議者皆願罷擊宛軍，獨武帝不以爲然。其原因，據《史記·大宛列傳》，乃在於武帝擔心，“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不惜“天下騷動”，再起大兵伐宛。在此，武帝首先考慮的仍然是大夏。

西漢君臣如此念茲在茲的大夏國，如前所說，不過是一個早已臣服於大月氏的、兵弱畏戰的遠國。當時該國的中心地區完全處在大月氏王的控制之下，僅東部山區有五個互不統屬的翖侯。[65]雖據《漢書·西域傳上》，這五個翖侯有一定的自主權，能“共稟漢使者”，但以此爲外臣，意義畢竟不大。到底大夏的吸引力從何而來？目前看來祇有一個答案：張騫和武帝相信西域的大夏遷自晉南，乃陶唐氏之裔胄。蓋張騫身臨其境，沐浴陶唐氏之遺風，歸報於國，使好大喜功的武帝不勝嚮往之情。[66]僅僅由於史遷謹慎，視張騫之見聞爲類似《山海經》之奇談，不敢言之，纔湮沒無聞至今。[67]

3.《史記·大宛列傳》稱：“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頿，善市賈，爭分銖。”所謂“自大宛以西至安息”，當然包括大夏國在內，蓋同傳又稱：“大夏在大宛西南。”張騫首次西使已取道大宛，親臨大夏地。嗣

後，據同傳，“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漢書·西域傳上》且載大夏五翖侯曾“共稟漢使者”。可知漢人對西域大夏的情況是比較熟悉的，對西域大夏人體貌特徵的概括亦即“深眼、多鬚頿”沒有理由懷疑。

另一方面，據《史記·高祖本紀》載：“高祖爲人，隆凖而龍顏、美須髯。”而《漢書·高帝紀下》贊曰：

> 《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68] 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

明指高祖爲劉累之後。[69] 果然，“隆凖而龍顏、美須髯”與“深眼、多鬚頿”如出一轍，恐非巧合。質言之，劉邦與西域大夏人體貌特徵的一致，正說明西域之大夏即吐火羅人的前身主要是以堯部落爲宗主、可能包括前陶唐氏在內的部落聯合體。這似乎也有助於理解武帝對西域大夏國的特殊興趣。

4.《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

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僞孔傳”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羲和是陶唐氏的重要職官。而據《漢書·西域傳》，西域的大夏國有職官曰“翖侯”[xiəp-ho]，與“羲和”[xia-huai]讀音近似；翖侯源自羲和也未可知。

■ 注釋

[1] 關於大月氏兩次遷徙的年代、經過，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pp. 56-61。

[2] 例如：A. V. Gutschmid, *Geschichte Irans und seiner Nachbarlander von Alexander dem Grossen bis zum Untergang des Arsaiden*, Tübingen, 1888, p. 61; W. W. Tarn, *The Greek in Bactria and India*. London: Cambridge, 1951, pp. 283-287。

[3] 例如：T. W. Kingsmill, “The Intercourse of China with Eastern Turkestan and the Adjacent Countries in the Second Century B. C.”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82, pp. 74-104; J. Marquart, *Ērānšahr nach der Geographie des Ps. Moses Xorenaci*. Berlin, 1901, p. 206。

[4] 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Oxford, 1957, p. 181.

[5] H. L. Jones, tr.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8 vols.

London, 1916-1936.

[6] 参看 K. Enoki, "The Yüeh-shih-Scythians Identity, A Hypothesi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istor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acts, Collection of Papers Presented*, compiled by the Japanes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 1957. Tokyo, 1959: pp. 227-232。

[7] 關於大月氏國的疆域，參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59-61。

[8] 持此說者，最早爲 F. F. von R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vol. 1. Berlin, 1877, p. 439；注 2 所引 W. W. Tarn 書，pp. 283-287，也有類似觀點。

[9] 關於“塞地”的範圍，參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136-137。

[10] 參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71-72。今案：塞種，特別是其中的 Tochari 人何時進入費爾幹納盆地其實不能確知。最早可能在公元前六世紀二十年代，即塞種自伊犁河、楚河流域西向擴張至錫爾河北岸之時，最遲則在公元前 140 年左右侵入巴克特里亞的同時或稍前。

[11]《漢書・西域傳》的小宛國也可能是吐火羅人所建，說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70-71。

[12] 參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 38。

[13] 注 3 所引 J. Marquart 書，pp. 206-207，以爲大夏故地在于闐、且末間，其人自該處遷入巴克特里亞。王國維“西胡考”，《觀堂集林》（卷一三），中華書局，1959 年，pp. 606-616，說略同。今案：此說未安，蓋斯特拉波明載 Tochari 人是從錫爾河北入侵巴克特里亞的。

[14]“卑耳之谿”，原作“卑耳之貉”，依王念孫《讀書雜誌》卷五說改。小川琢治“北支那の先秦蕃族”，《支那歷史地理研究續集》，東京：弘文堂，

1939年，pp. 25-163，esp. 104-106，以爲“貉”字不誤，原文意指“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今案：小川氏說不可從。

[15]“泰夏”原作“秦夏”，形似致訛；“泰夏”即“大夏”。

[16]“西虞”或“西吳”，當指禺氏部落之在河西者。說見本書上卷第二篇。

[17] 見顧炎武《日知錄》卷三一。

[18] 參見注14所引小川氏文，esp. 101-117；黃文弼“中國古代大夏位置考”，《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pp. 76-80。

[19] 參看注1所引余太山書，p. 25。

[20] 見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卷五，學林出版社，1984年，pp. 291-292。

[21] 參看馬雍、王炳華“公元前七至前二世紀的中國新疆地區”，《中亞學刊》第3輯，中華書局，1990年，pp. 1-16。

[22] E. L. Stevenson, tr. & ed. *Geography of Claudius Ptolemy*. New York, 1932.

[23] F. W. Thomas, “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1, pp. 807-836; H. W. Bailey, “Ttaugar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8 (1937): pp. 883-921.

[24] 注18所引黃文弼文。

[25] 參看顧炎武說（出處見注17），以及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河南省考古學會、河南省博物館編《夏文化論文選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pp. 133-150；劉起釪“由夏族原居地縱論夏文化始於晉南”，《古史續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pp. 132-166。

[26] 見注25所引劉起釪文。

[27] 參看書業“晉公盦銘‘□宅京𠂤’解——春秋晉都辨疑”，《中國古代地

理考證論文集》，中華書局，1962年，pp. 77-83。

[28] 見注25所引劉起釪文。

[29] 鄭玄《詩譜·唐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這可能也是杜注所本。

[30] 見注25所引劉起釪文。

[31] 參看顧炎武說（出處見注17），以及丁山“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1（1935年），pp. 87-129。。

[32] 顧炎武說（出處見注17）。

[33] 見注25所引劉起釪文。

[34] 見郭沫若“夏禹的問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pp. 302-309；胡厚宣“甲骨文土方爲夏民族考”，日知主編《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pp. 340-353。案：郭、胡二文旨在證明土方卽夏民族。

[35] 見注34所引胡厚宣文。

[36]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p. 272。

[37] 《詩·周頌·賚》“鄭箋”：“敷猶徧也。”此處意爲“敷治”，《孟子·滕文公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38] 有關文字的詮釋見注34所引胡厚宣文。

[39] 參見注34所引胡厚宣文。

[40] 參看鄒衡“關於夏商周時期北方地區諸鄰境文化的初步探討”，《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pp. 253-293，esp. 280-281。鄒氏認爲卜辭所見土方位於石樓。今案：石樓當爲卜辭所見土方活動地點之一。

[41] 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p. 9。

[42] 楊樹達“杜伯鬲跋”，《積微居金文說》，科學出版社，1959 年，pp. 142-143；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 年，p. 1088。

[43]《國語·鄭語》：“當成周者……南有……隨、唐。”韋昭注：“隨、唐，皆姬姓也。”《左傳·宣十二年傳》：“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杜注：“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左傳·定三年傳》：“唐成公如楚。”杜注：“成公,唐惠侯之後。”《史記·楚世家》：“楚昭王滅唐”。“正義”引《括地志》：“上唐鄉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百五十里，古之唐國也。《世本》云：唐，姬姓之國。”知除祁姓之唐外，另有姬姓之唐，乃屬楚之小國。《史記·晉世家》“索隱”：“晉初封於唐，故稱晉唐叔虞也。且唐本堯後，封在夏墟，而都於鄂。鄂，今在大夏是也。及成王滅唐之後，乃分徙之於許、郢之間，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即今之唐州也。”將祁姓之唐與姬姓之唐混爲一談，似未安。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四下》雖稱“唐氏出自祁姓”，卻又以爲“成王滅唐，以封弟叔虞。其後更封劉累裔孫在魯縣者爲唐侯，以奉堯嗣。其地，唐州方城是也。魯定公五年，楚滅唐，子孫以國爲氏，分仕晉、楚”。今案：近楚姬姓之唐，毋寧爲堯所滅有唐氏南遷之一支。

[44] 見楊寬“說虞”，《禹貢半月刊》第 7 卷第 6-7 合期（1937 年），pp. 39-49。

[45]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五下（七三）以爲指太康。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第九篇，《古史辨》第 7 冊（上），開明書店，1941 年，pp. 269-277，以爲指陶唐氏亡於夏後氏。注 25 所引劉起釪文以爲指周成王滅唐。今案：楊氏說或是。

[46]《史記·韓世家》：韓哀侯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韓既徙都，

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這是遷都更號之例。參看龔維英“上古時代戰勝者襲用戰敗者稱號的初步考察”，《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5年第3期，pp. 122-124。

[47]《淮南子·原道訓》：“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又，《史記·楚世家》有云：“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名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結合文中所引《逸周書·史記解》的記載，可知共工氏被誅在帝嚳即高辛氏在位時，帝嚳使重黎誅之不盡始命堯伐之，時堯已封唐侯，故稱“唐氏”。說本陳漢章，見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p. 1025。

[48]參看注47所引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書，pp. 1034-1035。

[49]今本《說文解字》十四篇下“𨸏部”作：“陶，再成丘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于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所凥，故堯號陶唐氏。”

[50]《爾雅·釋丘》：“再成爲陶丘。”郭注：“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漢書·地理志上》濟陰郡定陶縣：“《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

[51]《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帝王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史記·晉世家》“正義”引《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

[52]《逸周書》的“西夏”與《穆天子傳》的“西夏”究竟是什麽關係不得而知，但兩者地望可能並不相同，後者當在河西。

[53]可能有人認爲《逸周書》的“西夏”便是實沈所遷大夏，因在當時中土之西部，故稱之爲“西夏”；唐人滅亡西夏其實是取代實沈佔有大夏。但是，

沒有證據表明實沈所建之國爲大夏國，實沈及其部落“日尋干戈”，似乎也談不上“性仁非兵”。

[54] 除“北唐”外，《逸周書·王會解》還提到“唐叔”、“唐公”和“大夏”。“唐叔”指成王之弟（一說武王之弟，參看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52，臺北，1988 年再版，pp. 71-75）封於翼城大夏地者。“唐公”指陶唐氏之裔受封者。成王滅唐，遷其人於杜，爲杜伯；故唐公必另有封邑，或在平陽，或在虞鄉；王應麟則以爲乃帝堯之後由武王封於祝者，見注 47 所引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書，p. 858。“大夏”，孔氏曰：“西北戎”；可能指唐滅國後西遷河西的部衆。

[55] 據《水經注·汾水》，西漢彘縣亦卽東漢永安縣（今霍縣）附近有唐城，也可能便是北唐所在。《漢書·地理志上》“太原郡條”稱：“晉陽，故《詩》唐國。”師古注引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

[56]《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四下》：“帝堯初封唐侯，其地中山唐縣是也”；說亦同。

[57]《漢書·地理志上》太原郡晉陽縣：“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今案：此說不確，唐叔虞所封當在翼城。說見注 25 所引劉起釪文。

[58] 法琳“對傅奕廢省佛僧箴”引《汲塚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廣弘明集》卷一一，《大正新脩大藏經》T52，No. 2103，p. 164），亦可證堯都平陽。

[59] 據《今本竹書紀年》，時在孔甲七年。

[60]《史記·鄭世家》“正義”曰：“夏后蓋別封劉累之後于夏之墟，爲唐侯。”今案：此說有誤，夏後所封爲劉累而非其後。

[61]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二二），中華書局，1992 年，pp. 1181-1182。又，

雷學淇校輯《世本·氏姓篇》稱:“防、房 [biuang] 古字通,《國語》、《廣韻》、《紀年》沈約注、《唐書·世系表》皆謂舜封丹朱於房,地卽《春秋》之防渚,《十三州志》所謂防卽房陵也。夏孔甲時,廢彭姓之豖韋,以丹朱裔子劉累代之。累必生於房,故因生賜姓而氏曰御龍。此非祝融彭姓之豖韋矣。”今案:“累必生於房”,猜測之辭。卽便累生於房,也不可能因此稱豖韋氏。

[62] 賈逵稱劉累之後代祝融之後封於豖韋,似與《左傳·昭元年傳》:“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不合。服事夏者爲劉累卽御龍氏,服事商者爲劉累之後卽豖韋氏,兩者均封於唐土。

[63]《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括地志》:“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

[64] 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London: E. J. W. Gibb Memorial Trust, Porcupine Press Inc., 1977, p. 65.

[65] 參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29-32。

[66]《左傳》襄二十九年(前 544 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張騫在大夏,諒必也有聞歌見舞、觀風問俗之事。又,大宛亦爲吐火羅人所建,然據《史記·大宛列傳》,張騫衹是途經該國,未能深入採訪,印像深淺自與“留歲餘”之大夏國不同。

[67] 雖然,《史記·大宛列傳》還是破例爲業已亡國的大夏設立專條,透露出史遷對於大夏也是頗爲重視的。與此相對,《漢書·西域傳》便不再爲大夏設專條,附有關事情於“大月氏國條”下。

[68] 師古注："文十三年，晉人使魏壽餘僞以魏畔，誘士會而納之。秦人歸其帑，其別族留在秦者既無官邑，而乃復劉累之姓也。"

[69]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第一二節）"，《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3冊，中華書局，1996年，pp. 346-355，以爲凡《左傳》中可以引證漢爲堯後的記載均經劉歆改頭換面，不可信據。今案：劉氏篡改《左傳》，查無實據。漢爲堯後說，不見載《史記》，不無可疑。但此說最遲在昭帝時已經流傳，並非劉歆作僞（說見顧文所附錢穆"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載上引書，pp. 465-478，以及注42所引楊伯峻書，pp. 596-597）。張騫乃至武帝對大夏異乎尋常的關心似乎還能說明這一傳說最早在武帝時已經流行。史遷不錄，蓋以爲此說不可盡信。不管怎樣，劉邦既然姓"劉"，爲劉累之後的客觀可能性是存在的。

二　有虞氏的遷徙

一

有虞氏乃顓頊部落自蜀遷魯之一支。

1.《國語·魯語上》："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這似乎表明有虞氏之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顓頊。

2.《大戴禮記·帝繫》："黃帝居軒轅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這是說顓頊之故地在若水（今四川雅礱江）流域。[1]

3.《國語·楚語下》："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這是說顓頊乃少皞之繼承人。"少皞"

亦作“少昊”；而如果相信《帝王世紀》(《太平御覽》卷七九引）所載：

帝顓頊高陽氏，黄帝之孫，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僕，蜀山氏女，爲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女樞生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有聖德。父昌意雖黄帝之嫡，以劣降居若水爲諸侯。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年而冠，二十而登帝位，平九黎之亂，以火事紀官，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神民不雜，萬物有序，始都窮桑，後徙商丘。……

不妨認爲顓頊族（更可能是其中之一支）因佐少昊始自若水遷至窮桑。[2]“窮桑”，原係少皞氏所居。蓋據《左傳·昭二十九年傳》：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

杜注：“窮桑，少皞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爲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3]

《山海經·大荒東經》：“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于此，棄其琴瑟”。或以爲“此言少皞孺養帝顓頊於此，以琴瑟爲戲弄之具而留遺於此也。”[4] 由此可見，《帝王世紀》所言並非

空穴來風。

4.《史記·五帝本紀》:“帝顓頊高陽。”[5]《索隱》引宋衷曰:“顓頊，名;高陽，有天下號也。”又引張晏云:“高陽者，所興地名也。”今案:既然顓頊以“高陽”爲“有天下號”,“高陽”爲其“所興地名”，而《呂氏春秋·古樂》又稱:“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可見“高陽”[ko-jiang]應卽“空桑”[khong-sang]之異譯。既然“空桑”，山名，在魯北，[6]“窮桑”[giuəm -sang]與“空桑”得視爲同名異譯，又均在魯北。知“空桑”應卽“窮桑”。故所謂顓頊號“高陽”，其實是在繼承少昊之後。“高陽”既然是“窮桑”之異譯。“高陽氏”應卽“窮桑氏”，顓頊乃本少昊之故號。

5.《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爲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今案:其說甚是。蓋有虞氏之“虞”[ngiua]，不妨視作“高陽”或“空桑”之略譯（見疑、溪疑旁紐），有虞氏正是顓頊族東遷空桑的一支卽高陽氏之後。當然，亦可以視“虞氏”[ngiua-tjie]爲“高陽”或“空桑”之對譯，“氏”字在此一身二任，既與“虞”字結合爲國名之音譯，又表示姓氏之“氏”。《墨子·非攻下》:“昔者三

苗大亂……高陽乃命［禹於］玄宮"；此處"高陽"指舜，可以爲證。[7]換言之，"有虞"與"高陽"實係同名異譯，乃東遷顓頊族之專稱。

6.《尚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僞孔傳"曰："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由此可見，"嵎夷"即"暘谷"，前者乃音譯，後者乃義譯。

又，"嵎夷"，《玉篇·土部》（卷二）作"堣夷"，注："日所出。"而《太平御覽》卷三引《尸子》稱："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窮桑。"由此可見，"空桑"或"窮桑"乃至"高陽"或"虞氏"等的原意均與日出有關，[8]"空桑"、"窮桑"、"高陽"或"虞氏"與"嵎夷"[ngio-jiei]得視爲同名異譯。

7.《國語·鄭語》："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火，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其中，與夏禹、商契、周棄並舉的虞幕很可能是東遷顓頊部族事實上的始祖，故《國語·魯語上》稱："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而結合《左傳·昭八年傳》："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以及《大戴禮記·帝繫》所傳："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似可知"顓頊"所產"窮蟬"即"幕"或"虞幕"。[9]蓋"窮蟬"[giuəm-zjian]，得視爲"窮桑"

之異譯。顓頊國號“高陽”、其子幕一名“窮蟬”，均因顓頊部落繼少昊之後居於窮桑之故。

要之，顓頊之一支自若水東遷窮桑，始佐少昊，後取而代之，遂得號“高陽氏”即“有虞氏”。

二

有虞氏之一支復自魯遷晉。

1.《墨子·尚賢中》：“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而同書“尚賢下”“漁於雷澤”後有“灰於常陽”四字。所涉諸地之地望如下：

“歷山”，《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玄曰：“在河東。”“正義”引《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歷山……凡十一名，隨州縣分之。歷山南有舜井。”果如所指，歷山在晉。但是，《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歷山在濟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果如所指，則歷山在魯或齊。

“河瀕”即“河濱”，《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義”從之，亦稱：“案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果然，則舜陶於魯。然而據《水經注·河水四》，“河水又南逕陶城西。舜陶河濱，皇甫士安以爲定陶，不在此也。然陶城在蒲阪城北，城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爲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孟津有

陶河之稱，蓋從此始之”。果然，則舜陶於晉。[10]

“雷澤”，一說當依《太平御覽》卷一六三等所引作“濩澤”；而《漢書·地理志上》載河東郡有“濩澤”。《水經注·沁水》：“[濩澤] 水出濩澤城西白澗嶺下，東徑濩澤，《墨子》曰：舜漁濩澤。……又東徑濩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11]雷澤果卽濩澤，則舜漁於晉。然《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正義”引《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山海經》云：雷澤有雷神，龍身人頭，鼓其腹則雷也。”雷澤果卽雷夏澤，則舜漁於魯。

“常陽”，或“疑卽恒山之陽”。所謂“灰於常陽”意指“販於恒山之陽”；蓋一說“灰”當是“反”字之誤，“反”者“販”之叚字，販從反聲，古文以聲爲主，故止作“反”也。[12]

“服澤”，一說“服”與“蒲”，音之緩急；“服澤”或卽“蒲澤”，在蒲州。[13]

由此可見，關於歷山、河濱、雷澤地望，歷來注家雖有分歧，但主要的說法可大別爲兩類：一類置諸魯，另一類置諸晉。這可能是因爲“歷山”等地名旣見於魯或齊、又見於晉。[14]對此，合理的解釋也許是：“歷山”等原係有虞氏在齊魯時居地之名稱，隨著有虞氏自齊魯西遷，晉地也就出現了相同的名稱。

至於“服澤之陽”和“常陽”，後者作爲有虞氏行商之地可以不論。前者則不妨視作西遷有虞氏與堯爲宗主的部落聯合體陶唐氏接觸的最初地點（詳下）。

2. 類似《墨子》的傳說在《史記·五帝本紀》記作：“舜，冀

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

“壽丘”，《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甫謐曰：“在魯東門之北”。“索隱”以爲“黃帝生處”。按《太平御覽》卷七九引皇甫謐《帝王世紀》稱少典取附寶，“生黃帝於壽丘”；知“索隱”與“集解”說同。

“負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玄曰：“衛地。”“索隱”：“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尚書大傳》曰販於頓丘，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夏是也。”知負夏、常陽、乃至頓丘，均爲有虞氏乘時射利之處。

應該指出的是：“冀州”，一說其原始地境在晉南。[15]《史記》既然稱舜爲“冀州之人”，可見在太史公心目中，似乎認爲歷山、雷澤、河濱，乃至壽丘均位於晉地。[16]當然，這並不排除這樣一種客觀可能性：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諸事發生在舜率所部有虞氏西遷晉南之前，也就是說均發生在魯地；太史公敘舜之功德，沒有考慮時間差。不管怎樣，《史記》的記述與以上推測並無矛盾之處。

3.《孟子·離婁下》稱：“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一般認爲在菏澤縣南五十里。[17]

“負夏”，如前所述，在衛地。

至於舜的卒地“鳴條”，一說卽《尚書·湯誓》所見“鳴條之野”：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後漢書·郡國三》載濟陰郡定陶縣“有三鬷亭”。“三鬷”即“三朡”，由鳴條遂伐三朡，則鳴條當去三鬷亭不遠。[18]《太平御覽》卷八二引《淮南子·主術訓》許注：“鳴條，今陳［留］（州）平丘地。”果然，則鳴條亦衛地。

又，鄭玄注“鳴條”曰：“南夷地名。”蓋《呂氏春秋·簡選篇》稱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同書“論威篇”亦有夏桀“死於南巢”之説；“巢門”即“南巢”，在今江南巢縣。[19]今案：《呂氏春秋·簡選篇》稱湯登鳴條、入巢門，“遂有夏”；“有夏”，高注：“殷湯遂有夏之天下。”果然，則鳴條、巢門即使不在夏都附近，也必定在當時夏桀統治的中心地區。而既然“巢門”可能是“南巢之門”，則南巢乃至鳴條均不可能在江南。[20]

又，《史記·夏本紀》：“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集解”引孔安國稱鳴條“地在安邑之西”，所引顯然是桀都安邑説者的意見，桀都安邑説雖不可信，[21]但由於舜都於晉南，晉南亦有鳴條似乎也是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稱舜爲“東夷之人”，極可能在他心目中，諸馮、鳴條（即使負夏除外）皆在魯、衛。儘管“凡言人地，以所生爲斷，遷卒皆在後”，孟子可以僅“據舜生而言東也”。[22]但由於衛甚至魯地亦有鳴條，舜雖可能卒於晉之鳴條，其卒地被

孟子誤以爲在衛或魯地亦未可知。既然生、卒皆在東，故曰“東夷之人也”。

要之，將《史記·五帝本紀》與《孟子·離婁下》的記載結合起來，亦可見舜率所部有虞氏自魯經衛遷晉，因而終於從“東夷之人”變成了“冀州之人”。

4.《尚書·堯典》:“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按之“孔疏”:

> 虞與嬀汭爲一地。……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阪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爲舜居嬀水故也。

知舜自魯西遷後居嬀水之汭亦卽虞地。然據所引皇甫謐:

> 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

則似乎舜號稱虞氏卽有虞氏，乃因其居地在嬀水之汭卽虞地。但是，正如前面的考證所表明，事實應該是嬀水之汭因成爲舜所部有虞氏居地而得名虞地。至於虞地卽嬀水之汭在晉南，則有以下記載可供佐證：

1.“［河水］又南過蒲阪縣西”，《水經注·河水四》:“皇甫謐

曰：舜所都也。或言蒲阪，或言平陽及潘者也。今城中有舜廟。魏秦州刺史治。太和遷都罷州，置河東郡。……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南曰嬀水，北曰汭水，西徑歷山下，上有舜廟。周處《風土記》曰：舊說舜葬上虞。又《記》云：耕于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櫪，故曰歷山。余按：周處此志爲不近情，傳疑則可，證實非矣。安可假木異名，附山殊稱，彊引大舜，即比寗壤，更爲失誌記之本體，差實錄之常經矣。……《尚書》所謂釐降二女于嬀汭也，孔安國曰：居嬀水之內。王肅曰：嬀汭，虞地名。皇甫謐曰：納二女于嬀水之汭。馬季長曰：水所出曰汭。然則，汭似非水名，而今見有二水異源同歸，渾流西注入于河。"

2.《史記·秦本紀》：秦昭襄王五十三年，伐魏，"取吳城"。"集解"引徐廣曰："在大陽"。"正義"引《括地志》："虞城故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亦名吳山，周武王封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吳城，即此城也。"《後漢書·郡國一·河東郡·大陽縣》："大陽有吳山，上有虞城。"劉昭注："杜預曰：虞國也。《帝王世記》曰：舜嬪于虞，虞城是也。亦謂吳城，《史記》秦昭王伐魏取吳城，即此城也。"

3.《史記·吳太伯世家》："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居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夏虛。""索隱"："虞仲

都大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虛。”河東大陽縣即山西平陸。

《漢書·地理志上》河東郡大陽縣：“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爲晉所滅。”

《水經注·河水四》：“河水又東逕大陽縣南故城南……沙澗水注之，水北出虞山，東南徑傳巖。……［軨］橋之東北有虞原，原上道東有虞城，堯妻舜以嬪于虞者也。周武王以封太伯後虞仲于此，是爲虞公。《晉太康地記》所謂北虞也。城東有山，世謂之五家冢，冢上有虞公廟。”

由此可知，太伯、虞仲在南方之“吳”本即“虞”，故虞仲所封實爲故地，其地得名於舜蹟。蓋金文“虞”字每作“吳”，而“吳越”之“吳”則作“攻敔”、“攻吳”。[23]

4.《左傳·僖二年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杜注：“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然《春秋公羊傳·僖二年傳》何注：“屈產，出名馬之地。”徐疏：“謂屈產爲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爲產生也。”

今案：“屈產”乃與“垂棘”對言，指爲地名於義較長。“屈產”[khiuət-shean]或亦“虞氏”之異譯。《太平寰宇記·隰州·石樓縣》（卷四八）載：“屈產泉在縣東南四里，土人相傳，昔有白馬母飲此泉生得龍駒。《春秋》曰：晉獻公以屈產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蓋此地生良馬也。”似可爲證。

5.或以爲太伯、虞仲其實國於河東；《吳越春秋·吳太伯傳》所載太伯、仲虞採藥之衡山非南獄，乃指河東大陽之虞山、虞阪，周初之會稽在河東大陽，《括地志》稱會稽一名衡山，可以

爲證。[24]今案：此說或是，且有以下佐證：

據《左傳·襄三年傳》："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兹，至于衡山。"杜注："鳩兹，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十六年，楚恭王"乃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由此可見太伯、虞仲立國之地最初在河東，後來因爲其人遷往江南，"有虞氏"這一名稱也就隨之南遷了。"鳩兹"[kiəu-tziə]，與"虞氏"亦得視爲同名異譯，似非偶然。

要之，"有虞氏"應即"高陽氏"，最初可能得名於魯北之空桑山，但"空桑"一旦成了一個地緣政治集團的稱號，一般情況下會隨著這集團之人的遷徙而遷往各地。舜率所部有虞氏自魯西遷至晉南嬀水之汭，將"空桑"一名也搬到了晉地；嬀水之汭於是得名"虞地"。後來封於"虞地"的太伯之後亦因而得名爲"虞公"。

三

舜亡後，有虞氏逐步遷離晉地。

據《左傳·哀元年傳》，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杜注："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孔疏"引皇甫謐云："虞，今河東大陽縣西山上虞城是也。……但舜既禪禹，禹封舜後爲諸侯，雖取虞爲國名，

未必封於河東虞地。而梁國有虞縣，其地以虞爲名，疑是夏時虞國。”又據《史記·陳杞世家》，“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索隱”：“商均所封虞，即今之梁國虞城是也。”知舜後始封於梁國虞城，即今河南商丘虞城縣。少康封地綸邑，正在虞城縣附近。[25]

《逸周書·史記解》：“君娱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孔注：“有虞，商均之後。”“有虞氏以亡”，一般認爲時在夏季。[26]

嗣後，《史記·陳杞世家》“索隱”引《系本》：“陳，舜後。”宋忠云：“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殷湯封遂於陳以祀舜”；知虞思之後被商湯封於陳。而據《史記·陳杞世家》：“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27]似乎舜後至周代始封於陳。又據《史記·陳杞世家》“正義”引譙周之言：“商均封爲虞公，其子虞思事少康爲相。……下至遂公淮，事成湯爲司徒。湯滅夏，封爲遂公，號曰虞遂”；[28]則宋忠所述不確。蓋據《左傳·昭三年傳》，“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杜注：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又，“昭八年傳”：“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杜注：“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知所謂虞遂，因封地得名；舜後封陳之前，曾封遂，時在商代。

至於據《大戴禮記·少閒篇》：孔子語哀公曰，“舜［崩］，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似乎禹封舜後於陳而非虞。不妨視爲傳聞異辭，不必深究。[29]

由此可見，舜亡後，部份有虞氏已經開始離開晉地。其中一支遷往河南，其後裔後來又被封於陳。

最早可能在商均受封的同時，另有一支（或許是不願稱臣夏禹者）北遷雁門。至遲在公元前三世紀後半葉，這一支有虞氏已經西向伸張其勢力達到阿爾泰山東端。而如果相信《韓非子·說疑》關於“禹偪舜”的傳說，則有虞氏開始遷離晉地的時間可能更早。

1.《穆天子傳》卷一：“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隃之關隥。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郭注：“隃，阪也；疑此爲北陵西隃。西隃，鴈門山也。”果然，則五日後所抵“焉居、禺知之平”（《爾雅·釋地》：“大野曰平”）或在今河套東北。“禺知”[ngio-tie]得視爲“嵎夷”、“空桑”、“高陽”或“虞氏”等之異譯。《山海經·大荒北經》：“逮之于禺谷”；郭注：“禺淵……今作虞。”亦“禺”與“虞”互通之例。今案：這表明有虞氏有一支北遷至今雁門一帶。

2.《逸周書·王會解》載：“禺氏騊駼”；所附“伊尹朝獻篇”則載：“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犂、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後者沒有提到“禺氏”，衹提到“月氏”，卻提到了禺氏貢獻的“騊駼”，既然“禺”、“月”一聲之轉，則不妨認爲“月氏”[njiuk-tjie]便是“禺氏”[ngio-tjie]，與“禺知”均爲同名異譯。[30]質言之，“伊尹朝獻篇”列於“正北”的“月氏”便是《穆天子傳》所見雁門附近的“禺知”，亦即北遷之有虞氏。

或以爲“伊尹朝獻篇”係戰國時所作，故所說“月氏”當在

河套之東、雁門西北。[31] 今案："伊尹朝獻篇"所指果爲戰國時的禺知即有虞氏，則毋寧說居地在黃河以西；蓋當時黃河之東、雁門西北已屬匈奴，這從《史記》等所載月氏與匈奴的關係可以明瞭這一點。而"伊尹朝獻篇"列於當時中國"正北"的遊牧部落包括月氏、匈奴在內凡一十三種，不可能均位置於黃河之東、雁門西北；也就是說不能僅僅根據"正北"二字判定其位置。"正北"云云不過是說在中國北方而已。再者，"伊尹朝獻篇"卽使成於戰國，也不排除所據資料屬於春秋或春秋以前的可能性；換言之，所指"月氏"完全可能是春秋或春秋以前的月氏。果然，則其位置或與《穆天子傳》所載相同。

3.《管子·輕重乙篇》稱："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阸。"同書"國畜"、"地數"、"揆度"諸篇所載略同（"地數篇""禺氏"作"牛氏"、"旁山"作"邊山"）。同書"輕重甲篇"且說："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崐崘之虛可得而朝也。""禺氏"或"牛氏"[ngiu-tjie] 應卽"禺知"、"月氏"或"虞氏"。由此可見，"禺氏"（月氏）之"旁山"（或"邊山"）產玉，此山卽"崐崘之虛"；是虛和禺氏去周都距離大致相等，所產璆琳、琅玕皆美玉。或因禺氏一度壟斷玉石貿易，故所產之玉稱"禺氏之玉"（《管子·揆度篇》）。此處"崐崘"可以認爲是阿爾泰山，[32] 故在《管子·輕重篇》等所描述的時代，北遷的有虞氏卽禺氏已西向伸張其勢力至阿爾泰山東麓。《管子·輕重篇》等所據資料的年代雖難以確定，但據《史記·匈

奴列傳》，可知“秦滅六國”之際，“東胡彊而月氏盛”；直至冒頓單于命右賢王擊破月氏後，匈奴始得稱霸西域，故月氏伸張其勢力至阿爾泰山東麓至遲在公元前三世紀二十年代。

4. 伸張其勢力至阿爾泰山東麓的有虞氏即月氏人一度稱霸天山南北，壟斷了當時的東西貿易。直至公元前 177 / 前 176 年被北亞新興的遊牧部落匈奴擊敗，其大部纔被迫西徙伊犁河、楚河流域，逐走了原居該處的塞種。史稱這部份有虞氏即月氏人爲“大月氏”，而將留在原地的小部份人稱爲“小月氏”。約公元前 130 年，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又被得到匈奴支持的烏孫擊敗，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西徙至阿姆河流域，滅亡了當地的大夏國，定居下來。《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所見大月氏國於是成立。[33]

5. 據《史記·大宛列傳》，張騫於公元前 129 年訪問大月氏歸國後向武帝報告說：大月氏“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爲王庭”。今案：“宛”即同傳所謂“大宛國”，在今費爾幹納盆地，而“嬀水”即今阿姆河。張騫稱阿姆河爲“嬀水”，顯然是實錄。蓋如前述，舜所部有虞氏的發祥地正是晉地嬀水之汭。而如果相信《史記·五帝本紀》“正義”的說法：舜父“瞽叟姓嬀”，則舜自魯西遷後，所居“嬀汭”即“嬀水之汭”其實得名於父姓。[34] 由此可見，遠赴中亞的有虞氏即大月氏人之王庭所臨河水被張騫稱爲“嬀水”決非偶然。看來張騫命名時考慮的不僅僅是大夏與嬀水的關係，更重要的因素是有虞氏與嬀水的淵源。

可能在一支有虞氏北遷的同時，另一支有虞氏則經北地、安定等地西向進入河西。

1. 隴縣東北有芮水，古芮國地；《詩·大雅·緜》："虞芮質厥成"；知周初有虞氏有一支立國今隴縣，與芮國爲鄰；而據《漢書·地理志上》右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尚書·禹貢》、《周禮·職方》和《史記·封禪書》分別作汧山、岳山和吳岳，此吳山應爲自河東吳山西徙有虞氏之居地。東西兩吳山的關係十分明顯。

2.《管子·小匡篇》稱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拘泰（大）夏，西服流沙西虞"。《國語·齊語》稱桓公"懸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大］夏，西服流沙、西吳"。韋注："流沙、西吳，雍州之地。"[35] 今案：桓公所涉"流沙"卽今騰格里沙漠，所至"卑耳山"卽今賀蘭山；故桓公所服西虞應在黃河以西，今甘肅境內。[36] 桓公伐山戎既在二十三年（前663年），服西虞事則應在公元前七世紀六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

3.《史記·匈奴列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貘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漢書·地理志下》安定郡有"月氏道"，北地郡有"昫衍縣"。"昫衍"[xio-jian]應卽"朐衍"[gio-jian]，與"月氏"[njiuk-tjie]均得視爲"虞氏"之異譯。[37] 今案：這似乎表明這一支有虞氏是經由北地、安定等地進入河西的。

4. 河西的有虞氏卽《管子·小匡》所謂"西虞"，大約在公元

前七世紀二十年代末，復西遷至伊犁河、楚河流域，同時或先後遷去的還有一部份大夏人和允姓之戎。蓋據《史記·秦本紀》載，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有虞氏等放棄河西，西遷伊犁河、楚河流域或在此時。[38] 今案：《管子·小匡篇》所謂“西虞”，與前引同書“輕重篇”等所見“禺氏”、“牛氏”等雖皆爲有虞氏部落，但前者似乎先自晉南到達河西，復自河西抵達伊犁河、楚河流域。後者則是從河套以北西向發展的。

5. 上述西遷伊犁河、楚河流域的有虞氏等部在該處組成的部落聯合體被希羅多德《歷史》[39]（I，201；IV，13，16）稱爲Issedones；其中，有虞氏可能就是斯特拉波（Strabo）《地理志》[40]（XI，8）所載Gasiani人，允姓之戎和大夏分别爲Asii和Tochari。至遲在公元前六世紀二十年代末，Issedones西向擴張至錫爾河北岸，逐走了原居該處的Massagetae人。這個部落聯合體從此與波斯人發生關係，被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Darius I，前521—前486年）的貝希斯登（Behistun）銘文稱爲Sakā，[41] Sakā亦即《漢書·西域傳》所見“塞種”。

6. 嗣後，由於大月氏人的西徙，塞種即包括有虞氏在内的四部組成的部落聯合體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除一部份退縮至錫爾河北岸外，餘衆南下葱嶺，散處帕米爾各地。約公元前140年，塞種諸部紛紛離開錫爾河北岸，其中一支渡過阿姆河，侵入並滅亡了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成立了《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所謂“大夏國”。約十年之後，這個主要由塞種四部

建立的“大夏國”復被來自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征服。

7. 此外，上述散處帕米爾地區的一些禺氏卽有虞氏後來還東向進入塔里木盆地諸綠洲，建立了一些城郭小國。細考《漢書·西域傳》所載西域國名和地名，不難發現這一點。蓋所傳國名有高昌 [ko-thjiang]、姑師 [ka(kia)-shei]、車師 [kia-shei]、危（觟）須 [khiai-sio]、龜茲 [khiuə-tziə]、休循 [xiu-ziuən] 等，地名有車延 [kia-jian]、居延 [kia-jian]、貴山 [giuət-shean] 等，均得與“空桑”、“窮桑”、“高陽”、“虞氏”、“鳩茲”等視爲同名異譯。[42]“高昌”、“龜茲”更與“高陽”、“鳩茲”前後、東西相映成趣。當然，以上國名或地名中有一些也可能是有虞氏在公元前七世紀末西向遷徙時留下的遺蹟。

8. 另外，大月氏領有大夏地後，直接統治 Bactra 及其周圍地區，而通過所謂“五翖侯”控制東部山區。“五翖侯”均係原大夏國人，是大月氏人扶植的傀儡。後來推翻大月氏，開創貴霜王朝的原貴霜翖侯丘就卻，一說應爲公元前 140 年左右入侵巴克特里亞的塞種諸部之一 Gasiani 之後裔，如前所述，Gasiani 卽公元前七世紀末以前西遷之有虞氏。“貴霜”[giuət-shiang]，亦得視爲“空桑”等的異譯。因此，中亞史上盛極一時的貴霜帝國，可以說也是西徙有虞氏建立的。[43]

以下是兩點補充說明：

1. 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月氏或大月氏是遊牧部落。可是，沒有明確的資料表明有虞氏是遊牧部落，因而似乎不能將有虞氏與月氏或大月氏勘同。其實不然。祇要條件具備，生活和生

產方式是可以改變的，有虞氏在故地時即使是土著，一旦踏上西遷之路，特別是到達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草原後，轉變爲遊牧人不是不可想像的；而到達媯水即阿姆河流域，特別在進入巴克特里亞的農耕區後，相對安定的生活環境，又使他們逐步放棄遊牧、趨向定居。再說，史載舜率有虞氏耕、漁、陶，乃至成聚、邑、都，豈不說明在舜之前沒有聚、邑、都的有虞氏，正是一個遊牧部落，至少存在過遊牧的生活方式。[44] 更何況，沒有理由認爲舜以後便完全不存在遊牧的有虞氏部落，也就是說北遷、西徙者正是有虞氏中一直以遊牧爲生者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2. 以上對有虞氏遷徙過程的描述，不過是一種可能性。此外尚有其他多種可能性。例如，很可能所指北遷、西遷者其實祇是一股，其中往赴伊犁河、楚河流域者爲塞種之組份，餘衆則發展成月氏。

四

有虞氏的遷徙與陶唐氏密切相關。

《國語·魯語上》：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左傳·文十八年傳》則稱：

> 舜臣堯……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舜有大功而二十爲天子。

知有虞氏舜繼堯卽位，兩者一脈相承。

一說堯亦虞帝。其說略曰：至《墨子》始有稱“虞夏商周”者，然言堯舜仍以屬之“三代”之中，或堯、舜之代號古亦稱之爲“夏”，而其國號爲“虞”。[45] 今案：《國語·周語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鮌，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既云“其在有虞”，又稱“堯用殛之于羽山”，可證堯確爲虞帝。雖然，上說仍有所未安。

一則，《墨子·尚賢中》：“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類似提法亦見諸同書“節葬下”、“天志中”、“天志下”、“明鬼下”和“貴義”各篇。說者據以爲《墨子》合堯、舜、禹爲一代。但是，同書“明鬼下”和“非命下”已有“虞、夏、商、周”之稱，可見不能排除“三代”其實是“四代”之訛的可能性。特別是“明鬼下”“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句中，“三”字應作“四”字無疑。“四”，籀篆作“亖”，壞而爲“三”之例並不罕見。更何況，“非命下”在提及“商、周、虞、夏之記”的同時，又有“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之稱，知《墨子》確實僅將“夏、商、周”視作“三代”，也就是說加上“虞”應是四代。

二則，《國語》（“魯語上”、“魯語下”、“晉語八”、“鄭語”），《左傳》（“莊三十二年傳”、“成十三年傳”、“襄二十四年傳”、“昭元年傳”），《韓非子·顯學》，《呂氏春秋·審應》，《商君書·開塞》，以及《禮記》（“檀弓上”、“王制”、“内則”、“明堂位”、“祭法”、“祭義”、“表記”）、《大戴禮記·少閑》等均並稱虞、夏、商（殷）、

周四代，而以堯、舜屬虞，有堯、舜、禹、湯、文“四代五王”之說。

堯、舜、禹、湯、文、武既得稱爲四代聖王，禹、湯、文、武又無疑屬於夏、商、周三代，則堯、舜祇應同屬虞代。

問題在於堯何故亦屬虞代？似乎還沒有人提出合理的解釋。蓋據《大戴禮記·帝繫》：

> 黃帝產玄囂，玄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

玄囂卽青陽，按之前引《帝繫》，其故地在泜水，泜水卽今沙河，源出河南魯山西，經葉縣，入汝河。[46] 這就是說，堯所出青陽一系與顓頊所出昌意一系一度是各自獨立發展的。可是，這兩者後來有了聯繫，蓋據《史記·五帝本紀》：

> 帝顓頊生子曰窮蟬。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

這裏所說由帝嚳繼承的“顓頊”祇能是前述東遷窮桑的一支。玄囂之孫雖取代昌意之後，但“有天下號”，亦卽以某一血緣關係集團爲核心發展起來的地緣政治集團的符號未變。[47] 蓋“高辛”[ko-sien] 與“高陽”一樣，亦得視爲“空桑”、“窮桑”或“嵎夷”之異譯。[48]

既然“窮桑”、“高陽”、“高辛”其實是同名異譯，不無理由認爲帝嚳的繼承人堯也繼承了相同的國號。蓋“堯”[ngyə]與“虞”[ngiua]音近，與“高陽”、“高辛”等也不妨視作同名異譯，很可能一度也是“有天下之號”。[49] 堯繼承的既是少昊、顓頊的“天下”，與其說堯爲虞帝，不如說舜號“有虞氏”乃本堯之故號。[50]

又，據《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帝王紀》稱：“帝摯之母於四人中班最在下，而摯於兄弟最長，得登帝位。封異母弟放勛爲唐侯。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羣臣造唐而致禪。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禪。乃封摯於高辛。堯作爲少昊窮桑氏、顓頊高陽氏和帝嚳高辛氏的繼承人自然也是虞帝。而結合前引《尚書·堯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云云，可知舜率所部有虞氏自魯遷晋在堯部落西遷之後，舜應即所謂“造唐”的羣臣之一。

■ 注釋

[1] 參看李學勤“三星堆與蜀古史傳説”，《走出疑古時代》，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pp. 204-214。又，《玉海》卷一〇三引“若水”作“弱水”，錄以備考。

[2]《周禮·春官·大司樂》：“空桑之琴瑟。”空桑，鄭注：“山名。”《山海經·東山經》：“《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北臨食水，東望沮吳，南望沙陵，西望湣澤。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其名曰軨軨，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水。”郭注：“此山出琴瑟材，見《周禮》也。”又，《山海經·北

山經》："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東流注于虖沱。"羅泌《路史·前紀》卷之三以爲此空桑應在"莘、陜之間"。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卷三注"北山經"曰："兖地亦有空桑，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上古有空桑氏。"今案：吳氏所謂"兖地亦有空桑"卽指"東山經"所載。又，《淮南子·本經訓》："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高注："空桑，地名，在魯也。"沈祖緜以爲高注有誤。共工振滔洪水所薄空桑，蓋亦《山海經·北山經》之空桑。見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卷一四，學林出版社，1984年，p. 743。

[3]《太平御覽》卷七九引《帝王世紀》曰："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姬姓也。母曰女節。黃帝時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意感生少昊，是爲玄囂，降居江水，有聖德，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今案："江水"應爲"泜水"之誤。古有二泜水，一爲今沙河，一爲今槐河。李學勤"《帝繫》傳說與蜀文化"，注1所引書，pp. 214-223，esp. 217，以爲玄囂降居者乃前者。又，少昊乃己姓，與玄囂亦非一人，此處《帝王世紀》不可從。說見本書下卷第一篇。

[4]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一四，巴蜀書社，1985年。

[5]《大戴禮記·五帝德》稱："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所本或與《史記·五帝本紀》同。又，《左傳·文十八年傳》旣稱"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又稱"顓頊有不才子"，劉起釪"我國古史傳說時期綜考"，《古史續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pp. 1-73，eap. 16，舉以證顓頊與高陽氏本非一人。今案：此說似未安，高陽氏卽顓頊氏"有才子"，無妨亦"有不才子"。

[6]《左傳·昭十七年傳》："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史記·五帝本紀》

"集解"引皇甫謐曰：顓頊"都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是也"。果然，則高陽氏興於空桑，後都帝丘。

[7] 畢沅注："舜，高陽第六世孫，故云。"孫詒讓則疑文有脫誤，以爲《藝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云云，知非高陽所命也。見《墨子閒詁》卷二，中華書局點校本，1986年，pp. 134-135。今案：《隨巢子》稱"高陽"爲天，乃神化之結果，文字未必有脫誤。又，《莊子·大宗師》："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知顓頊高陽氏及其傳人均有處玄宮之傳說。

[8] 《經典釋文》卷三引馬融曰："嵎，海嵎也；夷，萊夷也。"又曰："暘谷，海嵎夷之地名。"今案：此說未安。"嵎夷"，乃指東表日出之地，並非單指海嵎，更不是指海嵎萊夷。《後漢書·東夷傳》："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可謂得其真諦。《尚書·禹貢》："嵎夷既略"，乃指東土業已經略。蓋《說文》十三篇下"田部"："略，經略土地也。"又，"嵎夷"，《史記·五帝本紀》作"郁夷"；"正義"："郁音隅"。今案：隅、嵎音同；"郁夷"、"嵎夷"亦同名異譯。

[9] 漢劉耽"呂梁碑"稱："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叟產舜。"（見《路史·餘論七》）今案：此調和之說也。

[10] 《周禮·考工記》："有虞氏上陶"。《禮記·檀弓上》："有虞氏瓦棺。"鄭注："有虞氏上陶。"《太平御覽》卷五五一引譙周《古史考》："舜作瓦棺。"又，《韓非子·難一》："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皆可證有虞氏或舜能陶。

[11] 王念孫說，見注7所引孫詒讓書，pp. 52-53。

[12] 俞樾說，見注7所引孫詒讓書，p. 61。

[13] 畢沅說，見注 7 所引孫詒讓書，p. 42。

[14] 歷山等的地望尚有其他異說。例如：《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括地志》又稱："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舜生處也。及嬀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凡此，或可視爲後起諸說。

[15] 說見劉起釪"由夏族原居地縱論夏文化始於晉南"，載注 5 所引書，pp. 132-166。

[16]《史記·五帝本紀》所載亦可佐證："舜居嬀汭，內行彌謹。……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

[17] 趙佑疑卽青州諸城縣，蓋其地有馮山、馮村，見焦循《孟子正義》卷十六，沈文倬點校本，中華書局，1991 年，p. 538。

[18] 翟灝說，見注 17 所引焦循書，pp. 537-538。

[19] 參看翟灝說，見注 17 所引焦循書，p. 538。

[20] 參看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卷八，學林出版社，1984 年，p. 439。

[21] 關於桀都地望，請參看雷學淇《介庵經說二·夏都考》、金鶚《求古錄禮說八·桀都安邑辨》、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商書序疏》。

[22] 趙佑說，出處同注 17。又，《韓非子·難一》："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亦以爲舜耕、漁、陶均在東夷居地。

[23] 說本注 15 所引劉起釪文。

[24] 錢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學報》第 10 期（1931 年），pp. 1955-2008；

以及“古三苗疆域考”，《古史地理論叢》，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2年，pp. 72-95。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pp. 32，356，亦有類似說法，可參看。

[25] 參看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卷九，北京修綆堂書店，1937年，p. 48。

[26] 黄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pp. 1013-1014。

[27]《史記·周本紀》載武王封“帝舜之後於陳”。“正義”引《括地志》曰：“陳州宛丘縣在陳城中，卽古陳國也。帝舜後遏父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器用，封其子嬀滿於陳，都宛丘之側。”

[28] 此條《史記正義》乃佚文，見瀧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p. 927。

[29] 以上可參看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52，臺北，1988年再版，pp. 1364-1367。

[30] 說本何秋濤，見《王會篇箋釋》卷下，江蘇書局校刊本，1891年。

[31] 參看王國維“月氏未西徙大夏時故地考”，《觀堂集林》（別集一），中華書局，1959年，pp. 1156-1158。王氏此文還以爲月氏因受匈奴攻擊放棄祁連、敦煌間的故地後經由西域南道西遷，在征服大夏之前乃居於于闐、且末間，未嘗赴伊犂河流域。今案：此說未安。

[32] 參見馬雍、王炳華“公元前七至前二世紀的中國新疆地區”，《中亞學刊》第3輯，中華書局，1990年，pp. 1-16。

[33] 說詳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pp. 26-28。

[34]《左傳·昭八年傳》：“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杜注：“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諸陳，紹舜後”；可以參證。

[35]《左傳·僖五年傳》："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杜注："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注 29 所引陳槃書，pp.459-460，據以爲"西吳"不在雍州，應指虞仲後裔之封地。今案：其說未安。

[36] 參見小川琢治"北支那の先秦蕃族"，《支那歷史地理研究續集》，東京：弘文堂，1939 年，pp. 25-163，esp. 102-107；黃文弼"中國古代大夏位置考"，《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pp. 76-80。

[37] 月氏之前身卽有虞氏之說由徐中舒首創，見徐氏"再論小屯與仰韶"，河南省考古學會、河南省博物館編《夏文化論文選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pp. 1-34；以及徐中舒中舒、鄭德坤、馮家昇"月氏爲虞後及氏和氏的問題"，《燕京學報》第 13 期（1933 年），pp. 209-238；徐中舒"夏史初曙"，《中國史研究》1979 年第 3 期，pp. 12-15。

[38] 參見注 33 所引余太山書，pp. 52-61。

[39] D. Grene, tr. Herodotus, *The History*.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40] H. L. Jones, tr.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8 vols. London, 1916-1936.

[41] R. G. Kent, *Old Persian, Grammar, Text, Lexicon*. New Haven, 1953, p. 117.

[42] 說詳注 33 所引余太山書，pp. 24-61，210-215。

[43] 參看余太山"貴霜的族名、族源和族屬"，《文史》第 38 輯（1994 年），pp. 18-28。

[44]《孟子·萬章上》載舜弟象之言曰："……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楊向奎"應當給有虞氏一個應有的歷史地位"，《文史哲》1956 年第 7 期，pp. 47-49，以爲有牛羊、倉廩，這在生產上是畜牧業與農業生產

的結合；並指出：《尚書·舜典》稱堯將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大麓”是山林川澤，這正是進行畜牧事業的好地方。

[45] 童書業“帝堯陶唐氏名號溯源”,《古史辨》第 7 冊(下),開明書店,1941 年, pp. 1-30；《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pp. 7-8；以及楊寬“說虞”，《禹貢半月刊》第 7 卷第 6—7 合期（1937 年），pp. 39-49。

[46] 參看注 3 所引李學勤文。

[47]《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張晏曰：“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索隱”引宋衷亦曰：“高辛，地名；因以爲號。”

[48]《淮南子·原道訓》：“昔共工……與高辛爭爲帝”，《淮南子·天文訓》則稱“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此似可視爲“高辛”與“高陽”爲同名異譯之證。《華陽國志·蜀志》：“昌意……生子高陽，是爲帝嚳”。另外，《國語·鄭語》稱：“黎爲高辛氏火正”，《國語·楚語下》則稱：“及少皞之衰也……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華陽國志·蜀志》亦云：“昌意……生子高陽，是爲帝嚳”；似乎亦“高陽”與“高辛”爲同名異譯之佐證。

[49]《史記·五帝本紀》“索隱”釋“堯”曰：“謚也”；似乎未得真諦。

[50]《史記·五帝本紀》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爲有熊，帝顓頊爲高陽，帝嚳爲高辛，帝堯爲陶唐，帝舜爲有虞。”今案：太史公此說未必是，“章明德”並無必要“異其國號”。

三　允姓之戎考

一

允姓之戎始見於《左傳》。該戎與同書所見陰戎、陸渾之戎、姜戎氏乃至九州戎的關係究竟如何，學界至今沒有一致的結論，故略陳己見如次。

1.《左傳·昭九年傳》（前533年）稱：“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恒伯辭於晉，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杜注：“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今案：據傳文，允姓原居瓜州，晉惠公時內徙，被安置於周之郊甸。據杜注，內徙允姓之裔便是陰戎；此所以晉將率陰戎伐潁，而周臣言及允姓。

一般認爲，允姓之裔被稱爲“陰戎”，是因爲這些內徙者居於“陰地”。而所謂“陰地”，據《左傳·宣二年傳》杜注，包括“晉

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河指黃河，山指秦嶺，水南、山北皆曰“陰”，其人居黃河之南、秦嶺之北兩陰之地，遂有“陰戎”之稱。[1]

應該指出的是，允姓既被稱爲“陰戎之祖”，所謂“陰戎”便祇能指陰地允姓之裔，不包括其他陰地之戎。事實上，允姓入徙之前，陰地已有他戎（如“僖十一年傳”所見“伊洛之戎”），允姓不可能是陰地諸戎之祖；允姓入徙之後，陰地亦無他戎被稱爲“陰戎”。可見“陰戎”祇是內徙允姓之裔的專稱，並非陰地之戎的泛稱。而陰地諸戎中唯獨允姓被稱爲“陰戎”，很可能除了他們居於兩陰之地外，還由於“允”、“陰”音近的緣故。

2.“昭九年傳”杜注在稱“允姓，陰戎之祖”的同時，又稱：“陰戎，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始見於“僖二十二年（前638年）傳”：“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注：“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據此，陸渾之戎係允姓之一支，魯僖公二十二年（秦穆公二十二年，晉惠公十三年）自秦、晉西北陸渾之地遷至伊川即伊水流域，伊川因而亦有地得名陸渾。至於所謂“至今爲陸渾縣”則未必然；蓋內徙允姓所到之處，皆有可能得名陸渾，杜預時代的陸渾縣不過其中之一而已。由此可見，其人原居陸渾，故稱“陸渾之戎”，新居伊川屬陰地，又名“陰戎”。

“昭九年傳”稱允姓居瓜州，晉惠公時自瓜州遷至周之郊甸，“僖二十二年傳”稱陸渾之戎於晉惠公十三年秋遷至伊川；而杜注

既稱陸渾之戎爲允姓之異稱，遷自秦、晉西北之陸渾，伊川又可視爲周之郊甸；則“昭九年傳”與“僖二十二年傳”所傳爲同一事件，而陸渾若非瓜州之異稱，便是瓜州之一地。

3.“襄十四年（前559年）傳”：“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之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地，狐貍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由此可見，姜戎氏原居地亦在瓜州，且與允姓同在晉惠公時内徙。或據以爲姜戎氏應卽允姓。[2]今案：其說未安。

一則，兩者名稱不同，一曰姜戎氏，一曰允姓，後者又被稱爲陰戎和陸渾之戎，未聞前者亦有類似稱呼。

二則，兩者雖均在晉惠公時内徙，但内徙後安置的地點不同，姜戎氏被安置於晉之南鄙，允姓則在周之郊甸卽伊川。

三則，姜氏戎自稱“四嶽之裔胄”，而據杜注，“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爲允姓”。四嶽之後旣爲姜姓，則允姓與姜戎氏並不同源；蓋允姓爲少昊之後，而少昊爲己姓。[3]至於所謂“別爲允姓”，祇能理解爲允姓一度係姜姓之別部，未必兩者族屬相同。[4]

4.“昭二十二年（前520年）傳”：“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杜注：“九州戎，

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據此，則陸渾戎又稱“九州之戎”。或以爲晉以九州之戎納悼王，爲子朝之黨所敗，其所破之戎曰“陸渾”，可證杜注不誤。[5]至於何故又得稱“九州之戎”，則有說如次：

“昭四年傳”：“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其中，“四嶽”在今陝西隴縣。“襄十四年傳”既謂姜戎氏爲四嶽裔胄而居瓜州，卽四嶽所在當卽瓜州所在，部落容有遷徙，要之必仍在關中、秦嶺一帶，允姓居地亦當於此求之。“四嶽”既在瓜州，又是九州之險，“瓜”、“九”古音復同，可見“九州”應卽“瓜州”，允姓卽陸渾戎可稱爲“瓜州之戎”，亦可稱爲“九州之戎”。[6]今案：其說未安。

一則，說者以爲“三塗”在河南嵩縣，“陽城”、“大室”在登封縣，皆當陰地卽内徙允姓（陸渾戎）之新居。這就是說，“陰地”與允姓原居地陸渾同屬九州卽瓜州。果如所言，則晉惠公時允姓内徙不過是從瓜州之一處徙往瓜州之另一處。然而這和前引《左傳》和杜注明顯不符。前引《左傳》和杜注分明說，允姓是遷離瓜州後，纔抵達陰地（伊川）的。如果陰地屬九州，則瓜州決非九州。

二則，四嶽地望卽使如說者所言，姜戎氏、允姓内徙前居地也未必在陝西隴縣附近。部落既能遷徙，便沒有理由認爲四嶽之裔胄始終在四嶽，也沒有理由認爲姜戎氏所居瓜州之地應爲四嶽之所在。何況杜注明言允姓卽陸渾戎原居地在秦、晉西北。

三則，杜注所謂“十七年滅，屬晉”，見“昭十七年（前525年）傳”：“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

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又據“哀四年（前 491 年）傳”，“士蔑乃致九州之戎”；杜注：“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可知“昭二十二年傳”杜注“九州戎，陸渾戎”，其實是指内徙允姓之居陰地陸渾者、甚至昭十七年敗亡後之餘衆爲九州戎。可見據杜注不能得出九州之戎便是瓜州之戎（即使僅指允姓或陸渾戎，不包括姜氏戎）的結論。[7]

最後，應該指出，杜注指内徙允姓居陰地陸渾者爲九州之戎也是不確切的；九州之地有諸戎雜居，決非一種，所謂“不一姓”，凡居九州之地者皆得稱爲九州之戎，唯獨賦予允姓這一稱呼是不合理的。由此可見，荀躒所帥及士蔑所致九州之戎其實不止一種，而前城人所敗陸渾僅其中之一部。[8] 杜氏未予詳察，誤以爲九州之戎僅陸渾戎一種，纔曲爲之解，引起後人許多困惑。[9]

5.《後漢書·西羌傳》：“……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後十九年（魯僖公十九年，前 649 年），遂入王城，於是秦、晉伐戎以救周。後二年，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戍周。後九年（晉惠公十三年，前 638 年），陸渾戎自瓜州遷于伊川，允姓戎遷于渭汭，東及轘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衆遂以滋廣。”對此，應予說明的有以下兩點：

其一，傳文稱：“陸渾戎自瓜州遷于伊川，允姓戎遷于渭汭。”這是將“陸渾戎”和“允姓戎”截然分開，和杜注顯然不合。究其原因，衹能是傳文編者誤會了杜注的意思，將“允姓”和“姜戎氏”混爲一談的緣故。其實遷於渭汭者應爲姜戎氏，其地乃晉

之南鄙，遷於伊川者爲陸渾戎即允姓戎，其地係周之郊甸。[10] 至於東及轘轅者，似應指陸渾戎即允姓戎。

其二，傳文“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如果僅指陸渾戎便是對的；否則，如前所述，這種提法不夠確切。“陰戎”乃指居於“河南山北”的内徙允姓（陸渾戎）之後裔。

要之，允姓之戎原居瓜州，其内徙陰地者，被稱爲陰戎。瓜州一名陸渾，抑或允姓在瓜州之居地名陸渾，内徙允姓又被稱爲陸渾戎，而陰地亦有地得名陸渾。陰地陸渾又屬九州，故陸渾戎亦九州戎之一支。

二

本節討論瓜州之地望。

允姓之姦可以追溯的最早居地是瓜州。據《左傳·昭九年傳》杜注，瓜州即敦煌。“敦煌”是漢武帝所置河西四郡之一的名稱，此前未見著錄。因此，杜注衹能理解爲瓜州位於漢代敦煌郡或敦煌郡治所在地。

或以爲《左傳》所見瓜州決不可能是敦煌。這主要是因爲考慮到穆公時秦都於雍（今陝西鳳翔），去敦煌三千餘里，實無必要勞師遠征，且雍與敦煌間戎族雜居甚多，未能越國以鄙遠，秦師果然遠征敦煌，允姓等也必遠遁伊吾，不可能反而東逃進入戰勝者之腹地。《漢書·地理志下》“敦煌郡敦煌縣條”下有云：“杜林

以爲古瓜州地，生美瓜。”此應爲《左傳》杜注所本；然而生美瓜者何止敦煌一處，杜林無疑是望文生義。[11] 今案：說者以爲内徙允姓之原居地瓜州不在敦煌不能說沒有理據，但如前所述，說者進一步指“瓜州”爲“九州”，以爲允姓等原居關中、秦嶺一帶，去鳳翔不遠，則不能令人首肯。

然則瓜州究竟在何處，我認爲很可能在涇水上游，今平涼至固原一帶。

一則，《水經注·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三危山條”引杜林曰：“燉煌，古瓜州也。州之貢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杜林因“地出好瓜”而指瓜州爲敦煌雖然不確，但不等於其說一無是處。此處“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句便不應視作無根之談。在匈奴興起之前，月氏十分強大，其勢力範圍一度達到河套内外，[12] 也完全有可能伸展至涇水上游平涼到固原一帶。《漢書·地理志下》載安定郡有“月氏道”似可證明這一點。月氏人的勢力抵達涇水上游的時間雖不可考，但無妨認爲在允姓、姜戎氏内徙之前。既然“瓜州之戎”卽允姓、姜戎氏均曾“并于月氏”，則瓜州應一度處在月氏的勢力範圍之内，質言之，很可能位於涇水上游。事實上，“瓜州”[koa-tjie] 可以視作“月氏”[njuik-tjie] 或“禺知”[ngio-tie] 之異譯。換言之，允姓、姜戎氏原居地得名“瓜州”可能是該地被月氏征服的結果。而在瓜州之戎卽允姓、姜氏戎服屬月氏之前，該地的名稱很可能便是“陸渾”；而“昭九年傳”“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云云，不過是在敍述往事時用了一個後來流行的地名，猶如今人稱匈奴遊牧於蒙古高原之類，

並不表明允姓所居一開始就稱爲“瓜州”。

二則，據《漢書·地理志下》，安定郡所屬縣有名“烏氏”[a-tjie]（《呂氏春秋·當賞篇》作“焉氏”[ian-tjie]、《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閼氏”[at-tjie]，《後漢書·郡國五》作“烏枝”[a-tjie]）者。[13] 烏氏地近月氏道，其名又可視爲“允姓”之異譯（詳下），也許正是古瓜州所在地。

三則，據杜注，陸渾戎即允姓原居地陸渾“在秦、晉西北”；既然陸渾地望與瓜州相同，瓜州亦應在“秦、晉西北”，指爲涇水上游，並無不合。[14] 也許有人認爲，杜注稱陸渾戎原居地陸渾“在秦、晉西北”是受杜林瓜州即敦煌說之影響。這當然是可能的。但是，另一種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杜預祇知陸渾“在秦、晉西北”，無從確指，這纔採納了杜林的瓜州即敦煌說。

以下是幾點補充說明：

1. 居於秦、晉西北即涇水上游的允姓、姜戎氏等一旦受秦之迫逐，當然可能向西遷徙，但必然有一部份留在原地歸附於秦，被晉惠公誘徙內地者可以認爲便是這些留在原地的人。

2. 月氏人所到之處，往往留下類似“瓜州”的遺蹟。春秋時，今山西孝義北有地名“瓜衍”[koa-jian]（見《左傳·宣十五年傳》），而西漢北地郡有縣名“眗衍”[gio-jian]（見《漢書·地理志下》），二名均可視作“月氏”或“瓜州”之異譯。[15] 但“眗衍”去當時秦、晉政治中心太遠，兩國勢力尚不能及，故允姓、姜戎氏內徙前所居瓜州不應求諸該處。至於“瓜衍”，位於秦之東北，與杜注陸渾“在秦、晉西北”不合。雖然《史記·匈奴列傳》“索隱”引

《左傳》杜注作“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之閒”；似乎司馬貞所見杜注如此，可據以求陸渾或瓜州於瓜衍地。但是，衹要考慮到杜注以瓜州爲敦煌，便可知注文卽使作“在秦、晉之閒”，在注者心目中，與“在秦、晉西北”無異，故仍不應求瓜州於瓜衍地。

3.《左傳·莊二十八年（前666年）傳》：晉獻公“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杜注：“小戎，允姓之戎。”如果相信此注，則姻方在涇水上游，豈非太遠？其實遠交近攻，獻公娶女於遠戎的可能並不是完全沒有。何況瓜州的允姓不過是允姓的一部份，所謂“允姓之姦”；夷吾之母並非來自瓜州亦未可知。而惠公之誘允姓，與其母或者不無關係。[16]

4.“陸渾戎”，《春秋公羊傳·昭十七年傳》作“賁渾戎”（“賁”，《經典釋文·春秋公羊音義》：“音六”）。或據以爲“陸渾”應卽見諸《山海經》之“賁渾”。[17]今案：《春秋公羊傳》“賁”字乃“睦”字轉寫之訛，“睦”、“陸”音同，“賁渾”應卽“陸渾”無疑。[18]今本《山海經》不見“賁渾”，僅“北山經”有“賁聞之山”，卽使“渾”、“聞”音近，又安知“賁聞”之“賁”亦轉寫之訛？事實上，據“北山經”，賁聞之山“北百里曰王屋之山”，知賁聞之山不可能是晉惠公時內徙允姓之原居地。

三

不少學者認爲，允姓之戎應卽獫狁。茲就兩者之名稱和居地

作一檢討，蓋囿於資料，捨此別無可供考校者。

查說者所舉允姓即玁狁說的證據無非是“允姓”不妨視作“玁狁”之省稱。[19] 今案：這似乎難以成立。

一則，“允姓”二字很可能全係音譯。“月氏”又作“禺知”或“月支”，知“月氏”一名中的“氏”，其實並非姓氏之“氏”；同理，“允姓”一名中的“姓”也未必是姓氏之“姓”。當然，譯稱選用“氏”或“姓”字，並非偶然，可能是爲了兼顧當時“中國”的習慣。[20]

二則，如前所述，允姓所居瓜州在涇水上游，該處有地名“烏氏”，而“允姓”可視作“烏氏”之異譯。

三則，《路史·後紀七·小昊紀》：“允格封鄀（注：《寰宇記》、《世本》：允姓國），有子鄀姓，虞帝投之幽州，是爲陰戎之祖（注：《姓纂》（卷六）云：允格後，金天氏之裔。詹恒伯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戎居於瓜州）。”既然《世本》載：允格，“允姓國”，又有“金天氏，帝少皞”之文（《左傳·昭元年傳》疏引），則羅氏書儘管駁雜不純，不能認爲全係杜撰。允姓爲允格之裔客觀上不無可能。[21]“幽州”或即“瓜州”，蓋“幽”、“瓜”可轉。果然，“允姓”與“允格”[jiuən-keak] 得視爲同名異譯（[k] 齶化爲 [s]）。

四則，如前所述，瓜州允姓受秦人迫逐，除一部份附秦並在後來被晉惠公徙往伊川外，可能有一部份遷往瓜州之西。《漢書·地理志下》載金城郡有縣名“允吾”[jiuən-nga] 和“允街”[jiuən-ke]，二名均得視作“允格”之異譯，亦可證允姓乃允格之

後並非無稽之談。

“允姓”既得視作“允格”之異譯，便不可能是“玁狁”的省稱。

關於“玁狁”的原居地，史無明文，僅僅因爲它不斷侵犯宗周，其出入之地尚有蹟可循。

1.《詩·小雅·出車》：“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方”應卽金文屢見之“葊京”，位於鎬京附近；[22]“朔方”卽北方。此言城於葊京，以禦玁狁。

2.《詩·小雅·六月》：“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薄伐玁狁，至于大原。”“焦穫”在今陝西淳化附近；“鎬”卽鎬京；“方”卽“出車”所見之“方”；“涇陽”卽今陝西涇陽；“大原”，指甘肅平涼至寧夏固原一帶。[23]此言玁狁不自量力，盤踞焦穫，欲犯鎬、方，進抵涇陽；周師反擊，逐北而至大原。

3.《不嬰（期）簋銘》：“馭方厰（玁）妥（狁），廣伐西俞，王令我羞追于西。余來歸獻禽（擒），余命女（汝）御追于𠳋，女（汝）以我車宕伐𢧢（玁）妥（狁）于高陶（陶），女（汝）多折首執（執）嘅（訊）。”“西俞”意謂西隅；“西”，今甘肅天水西南，秦漢隴西郡西縣所在。“𠳋”與“高陶”無考。[24]

4.《多友鼎銘》：“唯十月，用嚴（玁）㺇（狁）放（方）興（興），㢊（廣）伐京𠂤（師），告追于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京𠂤（師）。武公命多友衒（率）公車追于京𠂤（師）。癸未，戎伐筍，衣孚（俘），多友西追。甲申之脣（晨），博（搏）于䣙。多友有折首執（執）嘅（訊）。……或博（搏）于龔，折首卅

又六人，䱷（執）嚇（訊）二人，孚（俘）車十乘，從至。追博（搏）于世，多友或有折首䱷（執）嚇（訊），乃轞（軼）追，至于楊冢……”“京師”，據《詩·大雅·公劉》，公劉居豳（今彬縣東北，渭水之北），所在之野曰“京師”；“筍”即旬邑，在京師附近，今陝西旬邑縣附近；“郗”即“漆”，指漆水，亦近豳；“龔”即“共”，今甘肅涇川北。“世”與“楊冢”無考。[25]

5.《虢季子白盤銘》：“博（搏）伐厭（玁）䖏（狁），于洛之陽。”“洛”指北洛水。[26]

6.《兮甲盤銘》：“王初各（格）伐厭（玁）䖏（狁）于䍐（䍐）盧。”“䍐盧”在今陝西白水東北，即春秋時期的彭衙。[27]

今案：《詩·小雅》兩則以及不期簋、多友鼎二銘所見玁狁出入地大致相同，主要爲涇水流域；而據虢季子白盤、兮甲盤二銘，則玁狁出入地尚應包括部份洛水流域。玁狁入侵宗周以厲、宣間爲最甚，以上詩、銘所反映的便是當時玁狁入侵和周人防禦、反擊的情況。

如前所説，允姓居地陸渾（瓜州）應在涇水上游，這無疑包括在厲宣時期玁狁出入地之內。不僅如此，從《詩·小雅·六月》有關周師逐北，“至於大原”的描述來看，其地還是玁狁犯周的重要據點。這似乎有利於允姓即玁狁説的成立。[28]然而，即使僅就兩者的地望而言，允姓和玁狁的關係也不止一種可能：允姓未必是玁狁留在涇水上游的餘衆，也可能衹是一度服屬玁狁的諸部落之一。玁狁出入地果在涇水上游，允姓作爲允格之後，在服屬於月氏之前，服屬於玁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四

《廣弘明集·辨惑篇》載梁荀濟“論佛教表”，是表引《漢書·西域傳》之文有曰：“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爲月氏迫逐，遂往葱嶺南奔。”[29]這則記載由於不見於今本《漢書·西域傳》，有人對其真實性表示懷疑。[30]但荀氏上表旨在排佛，所論若無確鑿依據，不僅不能服人，反而會授人以柄，且《漢書》不難到手，捏造毫無意義。這就是說荀氏所引二十二字可能爲《漢書·西域傳》的佚文。[31]

《漢書·西域傳》現存有關塞種的主要記載有以下兩則：其一曰：

>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

其二曰：

> 烏孫國……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

結合有關西方史料可以考知，所謂“塞種”應即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前521—前486年）貝希斯登銘文所見Sakā人，其前身便是希羅多德《歷史》[32]（I，201；IV，13，16）所載Issedones。遲至公元前七世紀末，Issedones已經出現在伊犂河、楚河流域亦即《漢書·西域傳》所謂“塞地”。約公元前六世紀二十年代末，Issedones西向擴張至錫爾河北岸，從此被波斯人稱爲Sakā亦即“塞種”。Sakā原是波斯人對錫爾河北岸遊牧部落的泛稱。[33]

塞種主要由Asii、Gasiani、Tochari、Sacarauli四部組成。Isse[dones]實即四部中的Asii（“don”似爲表示場所的後綴，亦見於後世Osset語中）。在希羅多德描述的時代，伊犂河、楚河流域很可能已是四部的居地，故Issedones實際上成了一個部落聯合體的名稱。這個聯合體被稱爲Issedones，也許是Asii人佔有統治地位的緣故。[34]

荀氏所引《漢書·西域傳》既稱“塞種本允姓之戎”，則允姓無疑爲Isse[dones]或Asii的對譯。[35]

據《漢書·西域傳》，伊犂河、楚河流域有地名“惡師”[a-shei]，則不妨視作希羅多德所載Issedones之異譯，亦允姓據有塞地之證。

《史記·秦本紀》載：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同書“匈奴列傳”則稱：“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貆之戎，歧、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36]一作“益國十二”，一作“八國服”，未知孰是。[37]

但這番開疆拓土的舉動，卻很可能引起諸戎的西遷。而其中烏氏即允姓便在這時離開瓜州及其以西，西走塞地。這與希羅多德所載 Issedones 在伊犂河、楚河流域出現的時間正相符合。[38]

荀氏所引《漢書·西域傳》稱：允姓之戎"世居敦煌"。這似乎與前文關於允姓居瓜州，而瓜州位於涇水上游的結論並不一致。今案：這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西遷"塞地"的允姓（Asii）並非來自瓜州，確係"世居"河西走廊西部敦煌地區者。由於秦穆公開疆拓土、迫逐諸戎而引起的連鎖反應波及敦煌地區，逼使居住在那裏的允姓西走。沒有證據表明瓜州是當時允姓的唯一居地。

第二種可能：西遷"塞地"的允姓（Asii）確係原居瓜州者，但在進入"塞地"之前，曾在敦煌一帶有過短期停留，從而被誤以爲"世居"敦煌者。

第三種可能：《漢書·西域傳》編者和杜林一樣，也相信古瓜州位於當時的敦煌，故稱允姓（Asii）"世居敦煌"；其實遷入"塞地"的允姓來自涇水上游。

上列三種可能中以第三種可能性最大，《漢書·地理志下》明明採用了杜林的瓜州即敦煌說，故荀氏所引同書"西域傳""世居敦煌"等於說"世居瓜州"。

允姓（Asii）自瓜州逐步西遷至"塞地"的軌蹟尚可尋溯者如下：

1. 如前所述，在晉惠公十三年（前 638 年）即允姓、姜戎氏内徙的前後，已可能有一部份允姓遷至後來的金城郡境内，"允

吾”、“允街”等地名卽其遺蹟。此外，《後漢書·西羌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大允谷”亦在金城郡境内，或以爲因允姓所居而得名。[39]

2. 據《漢書·霍去病傳》，張掖郡境内有“焉支山”（同書“匈奴傳上”作“焉耆山”）。“焉支（耆）”[ian-tjie(tjiei)]得視作“允姓”或Asii的異譯。這說明允姓西遷經過此山時曾留下部衆。

3. 杜林的古瓜州卽敦煌說固然非是，但杜氏似乎不至於僅僅因爲敦煌産好瓜便遽斷古瓜州在敦煌。杜林曾親至河西，很可能發現敦煌一帶有允姓活動的蛛絲馬蹟，因而認定該處是古瓜州所在。他既不知“瓜州”係“月氏”之異譯，便推測“瓜州”因地産好瓜而得名。至於他說“瓜州之戎，幷于月氏者也”，可能既有文獻的、也有實地調查的依據。事實上，允姓“幷于月氏”，可能不僅發生在瓜州，也發生在敦煌一帶。不管怎樣，杜林指敦煌爲古瓜州，說明允姓西遷時曾經過該地並一度逗留。

4.《漢書·張騫傳》稱：烏孫“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焞煌間”。今案：此處“祁連”指今天山，而“焞煌”卽“敦煌”指今祁連山。在《漢書·張騫傳》描述的年代，具體而言爲公元前177 / 前176年以前，烏孫的居地在今祁連山與天山之間。[40]“烏孫”[a-siuən]既得視爲“允姓”或Asii的異譯，則不妨認爲烏孫是公元前七世紀末遷往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允姓留在祁連山和天山之間的部衆。

烏孫與允姓卽少昊金天氏之後有關尚有以下證據：

1. 據《漢書·西域傳》烏孫國王治“赤谷城”。《釋名·釋采帛》（卷四）：“赤，赫也，太陽之色也。”《淮南子·天文訓》：“赤

奮若之歲。”高注：“赤，陽色。”又，《東觀漢記·顯宗孝明皇帝》（卷二）：“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陽生，豐下鋭上，顔赤色，有似於堯，上以赤色，名之曰陽。”由此可知，赤谷者，陽谷也。而《太平御覽》卷三引《尸子》：“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窮桑。”少昊金天氏所邑窮桑卽暘谷，[41]亦卽陽谷。

2.《史記·大宛列傳》載烏孫始祖傳說曰：“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弃於野。烏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域]。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知烏孫的始祖傳說與烏有關。或以爲“烏孫”一名由來於這一始祖傳說：“烏孫”者，“烏之子孫”也；[42]似乎不無理由。而“烏嗛肉蜚其上”云云，說明此烏乃取食之鳥。

而《左傳·昭十七年傳》載：“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

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由此可見，金天氏之始祖傳說與鳥類有關。

其中司啓之“青鳥”，杜注：“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孔疏云：“立春、立夏謂之啓。”《文選》卷二張衡“西京賦”李善注引杜注則稱：“青鳥，鶬鶊也。”“鴳”或即“鶊”之訛。鶬鶊今作倉庚。[43] 而據《山海經·西山經》：“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員百里。”郭注：“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棲息於此山也。”又，同書“海内北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昆侖虛北。”郭注：“又有三足烏主給使。”“三足烏”，另本作“三足鳥”。又同書“大荒西經”：“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大鵹，一名少鵹，一名青鳥”。郭注：“皆西王母所使也。”今案：《爾雅·釋鳥》：“鵹黃，楚雀”。郭注：“卽倉庚也。”知青鳥卽倉庚又稱三足烏，爲西王母取食之神鳥。[44]

王充《論衡·說日篇》：“儒者曰：日中有三足烏。”《淮南子·精神訓》：“日中有踆烏。”高注：“踆，猶蹲也。謂三足烏。”《太平御覽》卷三引《春秋元命包》曰：“陽數起於一，成於二，故日中有三足烏。”烏孫王治名“赤谷”，表明烏孫人崇拜太陽。[45] 知三足烏與太陽崇拜有關。

由此可見，烏孫與金天氏兩者的始祖傳說存在某種内在聯繫。“烏孫”者，青鳥卽三足烏之子孫也。

3.《山海經·大荒南經》：“有羲和之國。”郭注引《啓筮》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暘谷。”羲和之子所出

“暘谷”既爲赤谷，知烏孫官號“翎侯”，得視爲“羲和”之異譯。

最後，應該指出，荀氏引《漢書·西域傳》“[塞種]爲月氏迫逐，遂望葱嶺南奔”句中，“月氏”指公元前177 / 前176年被匈奴冒頓單于擊破、放棄故地西遷的大月氏。大月氏的進攻，使塞種（實卽Asii、Gasiani、Tochari等四族組成的部落聯合體）放棄了“塞地”，一部份塞種西向退縮至錫爾河北岸，其中一些Asii人更西走至鹹海、裏海以北，形成《史記·大宛列傳》所載“奄蔡”[iam-tsat]，亦卽西史所謂Aorsi；另一些Asii人與其他三部一起侵入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還有一部份塞種自“塞地”南下帕米爾，其中一些進入西北次大陸，另一些東向進入塔里木盆地，沿西域南北道建立了若干綠洲小國。《漢書·西域傳》所載城郭諸國名稱有“溫宿”[uen-siuet]、“烏壘”[a-liuei]、“焉耆”、“烏秅”[a-deai]、“伊循”[iei-ziuən]等均可視作“允姓”或Asii 的異譯，說明這些綠洲最早的開拓者可能是允姓卽Asii人。[46]值得注意的是：“焉耆”，在佉盧文書中作Argi，中古波斯語作Ark；[47] Argi、Ark以及其王治之名“員渠”[hiuən-gia]與“允格”的關係頗爲明顯；如果再考慮到焉耆王家姓“龍”[liong]無妨視爲“陸渾”[liuk-huən]的縮譯，[48]其淵源便更清楚了。

五

最後，說一說西遷允姓（Asii）與大夏（Tochari）的關係，以

結束前文。

1. 河西地區既有允姓的、也有大夏的遺蹟。但是沒有證據表明兩者在河西地區有過接觸。已知遲至公元前七世紀五十年代末，河西已有大夏人。而允姓離開它在瓜州的故地恐怕最早也要到公元前七世紀三十年代初，到達河西或在公元前二十年代末。

2. 大夏離開河西，可能是受允姓等西遷引起的連鎖反應的影響。因此，大夏應該比允姓早一步到達伊犂河、楚河流域。在伊犂河、楚河流域，大夏很可能被隨後到達的允姓征服，成爲後來被稱爲“塞種”的部落聯合體的組份之一。之所以認爲大夏在伊犂河、楚河流域曾被允姓征服，是因爲考慮到中國史籍認爲塞種便是允姓，不知尚有其他；希羅多德記載公元前七世紀末活躍在後來被稱爲“塞地”即伊犂河、楚河流域的部落時也衹提到 Issedones 即允姓，而大夏又無疑曾與允姓同時活動於伊犂河、楚河流域。

3. 約公元前 140 年，允姓與大夏一起南渡錫爾河，侵入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Trogus Prologues 稱佔領巴克特里亞的 Asiani（Asii）爲“Tochri 的王族”（XLII），[49] 則表明允姓佔支配地位的形勢至此並未變化。但是，公元前 129 年到達阿姆河流域的張騫卻衹知有大夏，不知有允姓，這很可能是因爲大月氏來犯時，作爲宗主，允姓首當其衝，受創深重，終於銷聲匿蹟，大夏由於人數衆多，其名反而顯彰。

4. 離開“塞地”南下帕米爾，後來又進入塔里木盆地周邊諸綠洲的 Asii 和 Tochari 人也有保持著聯繫的。一個最好的例子便是

焉耆國。該國國名“焉耆”、王治名“員渠”均係 Asii 人的遺蹟，而周遭山水名“敦薨”乃 Tochari 人的遺蹟。恐怕在焉耆國中允姓仍爲大夏人的宗主。

5. 以上所述，都是大夏役屬允姓，下面似乎是一個例外。《漢書·西域傳》載有婼羌，其種遍佈西域南道，其中一支，即傳文所說辟在陽關西南的“婼羌國”，“其國王號去胡來王”。“去胡來”早已有人指出，應爲“吐火羅”之異譯。[50] 而“婼羌”可以認爲是允姓與羌人的混血種，蓋允格封鄀，有子鄀姓，允姓可溯源於允格之子；“婼”、“鄀”可通，“婼羌”實即“鄀羌”。如前所述，臨夏既有允姓、又有大夏的遺址，該地復爲羌人出沒之處，由此沿祁連山南麓往西可達西域。陽關西南有以大夏人爲宗主的婼羌部落，或非偶然。

6. 據西史記載，Tochari 和 Asii 都是遊牧部落。可是，漢文史料卻傾向於表明大夏不是遊牧部落，不僅《史記·大宛列傳》明載“其俗土著”，《逸周書·史記解》也稱“西夏”人（可能是進入鄂地的大夏人）居有城郭，似乎不應將大夏和 Tochari 勘同；其實不然。首先，衹要條件具備，生活方式是可以改變的，大夏人作爲晉南的土著，一旦踏上西遷之路，特別是到達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大草原後，生活方式轉變爲遊牧不是不可想像的；而一度遊牧於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大夏人在進入巴克特里亞的農耕區後，逐漸放棄遊牧生活、走向定居更是完全可能的。再說，沒有理由認爲晉南不存在遊牧的大夏人，也就是說自河西遷往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可能正是大夏人中以遊牧爲生者。更何況《逸周書》的

記載不足以表明晉南的大夏人原係土著，因爲有這樣一種可能性不能排除：僅僅進入鄂地的一支大夏人開始走向定居。這些大夏人"不修"、"不守"城郭的行爲恰恰表明他們原來並非土著。至於允姓，可以說沒有直接的資料足以證明或否定它是一個遊牧部落；而如果相信烏孫、奄蔡與允姓同源，則不妨認爲允姓不僅可能是一個遊牧部落，而且（至遲在遷至伊犂河、楚河流域後）可能成爲一個騎馬遊牧部落。這也許便是大夏在許多場合役屬允姓的原因。

■ 注釋

[1] 參看顧頡剛《史林雜識》，中華書局，1963 年，pp. 46-53。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四引或說以爲陰地專指河南盧氏縣陰地城，而徐文靖《管城碩記》卷一〇引《地理風俗記》以爲故晉陰地專指河南平陰縣。今案：後說無確據，可以不論。前說之依據是《左傳·哀四年傳》"陰地之命大夫士蔑"一語。蓋士蔑所守必非河南、山北全部地區。但是，士蔑所守無疑因地處水南、山北而得名，而河南、山北決不止士蔑所守一處。這也就是說"陰地"可能有廣狹二義。後來陰地城所在，爲晉都之門戶，既有命大夫守之，似乎不可能爲陰戎即內徙允姓所盤踞。故陰戎之居地，當從杜注。參見江永《春秋地理考實》卷二（宣二年）、三（哀四年），以及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3 年，pp. 654-655，1627。

[2] 見趙鐵寒"春秋時期戎狄的地理分佈及其源流（上）"，《大陸雜誌》

11～2（1955年），pp. 38-45。又，饒宗頤“上古塞種史若干問題——《于闐史叢考》序”，《中國文化》第8期（1993年），pp. 165-170，以爲允姓“何以同時復稱之爲姜戎者，必其族久已和姜人混血成爲雜種，像殷時有馬方，又有多馬羌及小多馬羌（卜辭云：‘乎小多馬羌臣’，《合集》5717正），當即羌與馬方的混合”。今案：此說未安。一則，《左傳》既記載了允姓的事蹟，又記載了姜戎氏的事蹟，但從未將允姓“復稱爲姜戎”。允姓與姜戎一度同處一地，又差不多同時內徙，然不能因此認爲兩者原是一種。二則，允姓與姜戎氏同處一地，混血的可能是存在的，但沒有證據表明徙往晉之南鄙的姜戎氏已與允姓混血；否則，按饒氏的邏輯，應稱爲“允姜”。三則，即使內徙之姜戎氏已與允姓混血，畢竟與允姓不同，不應將它和允姓混爲一談。

[3] 說見本書下卷第一篇。

[4] 關於允姓和姜戎氏是二非一，參看注1所引顧頡剛書（出處同）。又顧頡剛“九州之戎與戎禹”，《古史辨》第7冊（下），開明書店，1941年，pp. 117-138，認爲杜注“以允姓爲姜姓之別枝，姜與允蓋同爲一族，此種想像之辭，未必符合事實”。今案：杜注：“別爲允姓”云云雖然可能是想像之辭，但未必理解爲姜、允同族。

[5] 參看注4所引顧頡剛文。

[6] 見注1所引顧頡剛書（出處同）。

[7] 全祖望《經史問答》卷四以爲陸渾戎已滅於昭十七年，而九州戎仍見於哀四年，知九州戎非陸渾戎。今案：哀四年之九州戎雖可能並非陸渾戎，但不能因此否定陸渾戎曾爲九州戎之一支這一事實。

[8] 參看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專刊》52，臺北，1988年再版，pp. 1055-1066。

[9] "昭二十二年傳"杜注："州，鄉屬也，五州爲鄉。"今案：其說非是，說見注1所引顧頡剛書（出處同）。

[10] 全祖望（出處見注7）區分姜戎氏與陸渾之戎，甚是；然又將姜戎氏與陰戎乃至九州之戎混爲一談，則非是。陳槃書（出處見注8）對全氏有批判，可參看。但陳氏以爲杜注之釋陰地，失諸空泛，陰地乃專指河南盧氏縣陰地城，在嵩縣陸渾故城西，去後者約二百里；陰戎與陸渾戎境地鄰接，各有君長，不相統屬，陰戎附晉，陸渾戎則親楚。二者之分，地勢使然，故名號亦異。今案：陳氏試圖區分陸渾戎與陰戎，有所未安。陰地未必指陰地城所在，陸渾故城既屬陰地，則陸渾戎亦卽陰戎，卽便如陳氏所言盧氏縣與嵩縣各有一支允姓。至於附晉親楚，形勢使然，亦未必二分而後然。"昭十九年傳"所載"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陳氏以爲乃事晉陰戎繼而親楚的結果；正可爲證。又，注2所引趙鐵寒文以爲傳文"允姓戎遷于渭汭"句中的"渭汭"應爲"洛汭"之誤，恐未必是。

[11] 說見注1所引顧頡剛書（出處同）、注4所引顧頡剛文。又，注2所引趙鐵寒文對杜注瓜州卽敦煌說亦有批判。據云：杜預先從《山海經》之說，認定三危在敦煌，再認定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三苗卽竄於三危者，故牽合三危與瓜州爲一地。今案：此說有所未安。今本《山海經》並無三危在敦煌之說。趙氏所舉《水經注·江水一》："《山海經》曰：三危在燉煌南"，實爲酈道元所引郭注，楊疏業已指出，可以無疑。杜注《左傳》且在郭注《山海經》之前，亦不存在杜注因郭注而牽合三危與瓜州之可能。又，《左傳·昭元年傳》："虞有三苗"，杜注僅言"三苗，饕餮，放三危者"，未嘗言三危在敦煌。然當時必有三危在敦煌之說，杜氏且深信之。"昭九

年傳”注既稱允姓乃“與三苗俱放三危者”,又說“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其意無非是允姓既在秦、晉西北，則不應與檮杌、而應與三苗俱放；允姓所放之地瓜州與三苗所放之地三危俱在敦煌,可以爲證。其實，據《左傳》，祇能認爲允姓因檮杌之故而放瓜州，至於允姓所放之處則與檮杌未必有聯繫,杜預見不及此,勉強牽合三苗與瓜州；非是。

[12]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pp. 53-56。

[13]《史記·匈奴列傳》“正義”引《括地志》:“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也。”參看王念孫《讀書雜誌》卷四之四，中華書局，1991 年，pp. 200-201。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學林出版社，1984 年，p. 1615，否定王說，以爲焉氏不在安定，在今陝西富平之關山附近。今案：陳說未安。

[14] 所謂“秦、晉西北”，乃就大致方向而言，理解不必執著，注以爲陸渾戎即允姓“在秦、晉西北”，又說允姓所居瓜州即敦煌，可見在杜預看來，敦煌便無妨稱爲“在秦、晉西北”。

[15]“眴衍”,與《史記·匈奴列傳》等所見“居延”應是同名異譯。《漢書·西域傳》載龜茲國“王治延城”。“延城”,當按《冊府元龜》卷九五八“外臣部·國邑二”作“居延城”；蓋西域南北道城郭諸國國名多與王治名相同；“居延”[kia-jian] 與“龜茲”[khiuə-tziə] 其實乃同名異譯；而“龜茲”又得視爲“禺知”或“月氏”之異譯；《高僧傳·鳩摩羅什傳》便稱龜茲北山爲“月氏北山”。由此可以推知“眴衍”、“居延”均爲“月氏”之異譯。

[16]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答問》以爲允姓始入中原，由晉惠公誘之。若惠公之母即是允姓,則伊川之徙,不待惠公時矣。注 1 所引徐文靖書卷一〇（莊

二十八年）說略同。今案：此說未安。又，《史記·晉世家》稱："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果然，則小戎與大戎同族，小戎不得爲允姓。今案：諸家多主小戎非允姓，詳見注 8 所引陳槃書，pp. 995-999。

[17] 見方以智《通雅》卷一六，以及陳槃書（出處見注 8）。

[18] 參看注 16 所引錢大昕書（出處同），宋翔鳳《過庭錄》卷四，以及汪之昌《青學齋集》卷九。

[19] 見注 2 所引饒宗頤文。

[20] "月氏"譯作"瓜州"，則是爲了照顧"中國"的地名習慣，猶如遼金世將"高昌"譯作"火州"、"和州"和"霍州"等。

[21] 允格封鄀，鄀當在今河南淅川縣西南，所謂下鄀。這或許是晉惠公能誘允姓內徙並置諸伊川的原因。伊川去下鄀不遠，所謂蠻夷戀故地也。鄀有允姓，則晉獻公所娶"小戎"之女未必來自瓜州。同理，姜水在渭北，故惠公遷姜戎氏於晉之南鄙，而《後漢書·西羌傳》"允姓戎遷于渭汭"句有誤，遷于渭汭者應爲姜戎氏。又，陳槃（出處見注 8）認爲，《左傳》以檮杌爲允姓之祖。今案：據《左傳》，允姓之姦不過是檮杌的幫兇，陳說無據。

[22] 劉雨"金文葊京考"，《考古與文物》1982 年第 3 期，pp. 69-75。

[23] 李仲操"也釋多友鼎銘文"，《人文雜誌》1982 年第 9 期，pp. 95-99。薛方昱"玁狁考辨"，《西北民族研究》1988 年第 2 期，pp. 136-145。

[24] 李學勤"秦國文物的新認識"，《文物》1980 年第 9 期，pp. 25-31。

[25] 李學勤"論多友鼎之時代及意義"，《人文雜誌》1986 年第 6 期，pp. 87-92。注 23 所引李仲操文以爲"楊冢"即楊陓，在今陝西隴縣西、甘肅

華亭南；所謂“郲”，應釋爲“邰”，邰在今陝西淳化附近，卽《詩·小雅·六月》所見焦穫。

[26] 王國維“鬼方昆夷玁狁考”，《觀堂集林》（卷一三），中華書局，1959年，pp. 583-606。

[27] 見注26所引王國維文。

[28] 關於玁狁的出入地理，衆說極其紛紜，在此不過兼採其中較可信者，加以協調而已，不可能一一辨析。應該指出的是，肯定玁狁的出入地主要是涇水流域，玁狁與允姓是否同族尚有討論之餘地；否則，譬如像某些學者（注8所引陳槃書，pp. 81-85，等）所認爲的那樣爲汾水流域，允姓、玁狁之關係自然就更難確定了。

[29]《廣弘明集》卷七，《大正新脩大藏經》T52, No. 2103, p. 129。

[30] 桑原隲藏“張騫の遠征”，《東西交通史論叢》，東京：弘文堂，1944年，pp. 1-117，以爲荀氏所引不足爲憑。案：卽使荀氏有意捏造，也不失爲歪打正著，或者說塞種卽允姓戎之客觀可能性是存在的。

[31] 參看注12所引余太山書，pp. 43-44。蒙文通《古族甄微》，巴蜀書社，1993年，p. 57，以爲荀濟所引《漢書》當是華嶠、薛瑩輩書。今案：此說疑非是。華嶠、薛瑩書皆《後漢書》，未必會載塞種西遷事。

[32] D. Grene, tr. Herodotus, *The History*.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33] 參看注12所引余太山書，pp. 1-10。

[34] 參看注12所引余太山書，pp. 16-17。

[35] 注2所引饒宗頤文主張允姓卽玁狁，故否認允姓卽Asii。據云：允姓卽玁狁亦卽《詩·大雅·緜》所見“混夷”，“混”乃“胡”之異譯，故上古

塞種語文書統稱爲“胡書”。今案：允姓卽玁狁說似難成立，已見前述；故玁狁卽混夷是否塞種已無討論之必要。

[36] 朐衍卽月氏，緄戎和烏氏則是當時在秦西北的玁狁和允姓的餘衆。緄戎卽玁狁說見注 26 所見王國維文。

[37]《史記·商君列傳》稱百里奚相秦，“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故同書“匈奴列傳”所謂“西戎八國服於秦”，很可能是將百里奚的事蹟錯誤地歸到了由余的名下。秦用由余謀伐戎，益國數也許應爲“十二”。

[38] 參看注 12 所引余太山書，pp. 6-10, 26-29。

[39] 見注 2 所引饒宗頤文。今案：燒當，西漢元帝時人，大允谷得名當在燒當入居之前。

[40] 參見注 12 所引余太山書，pp. 131-133。

[41] 參見本書上卷第二篇。

[42] E. G. Pulleyblank, “The Wu-sun and Sakas and the Yüeh-chih Migra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3 (1970): pp. 154-160.

[43] 注 1 所引楊伯峻書，p. 1387，以爲張衡“西京賦”並稱“青鳥與黃雀”，據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黃雀卽黃鶯，可見李善注所引杜注亦不足爲據。今案：“西京賦”旨在修飾文辭，不必深究。

[44]《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相如《大人賦》：“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正義”引張楫曰：“三足烏，青（烏）[鳥] 也，主爲西王母取食，在昆墟之北。”《太平御覽》卷九二〇引《括地圖》：“崑崙之弱水中，非乘龍不得至，有三足神烏，爲西王母取食。”

[45]《漢書·西域傳》稱烏孫“與匈奴同俗”，而同書“匈奴傳上”載匈奴“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烏孫可能亦有類似習俗。

[46] 參見注 12 所引余太山書，pp. 120-121, 146-151, 210-215。

[47] 參 見 W. B. 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9 (1938): pp. 545-571。

[48]“龍”姓焉耆王最早見於《晉書·西戎傳》，然其起源必古。

[49] 引自 W. W. Tarn, *The Greek in Bactria and India*. London: Cambridge, 1951, p. 286; 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Oxford, 1957, p. 162。

[50] 見黃文弼“重論古代大夏之位置與移徙”，《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pp. 81-84。

四　犬方、鬼方、𢀛方與獫狁、匈奴同源說

一

卜辭所見“犬方”（《合集》14299）可能與文獻所見犬夷或犬戎同源。[1]

1. 從有關卜辭可以略窺犬人與商的關係。首先，須知犬人曾臣服於商，故卜辭屢見“犬侯”的記載：

> 己卯卜，㱿，貞令多子族比犬矦寇周，𠂤王史。五月。（《合集》6812 正）
>
> 貞令多子族比犬眔𠂤𢀛，𠂤王史。（《合集》6813）
>
> 貞令多子族眔犬矦寇周，𠂤王史。（《合集》6813）
>
> 辛巳，貞犬矦以羌其用自。（《屯南》2293）

所謂“𠂤王史”，顯然是指犬侯遵照商王號令爲商王效力。從前引卜辭可知犬侯“𠂤王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寇周”，周與犬之關

係自然頗受關注：

周弗其圶犬。（《懷》303）

此外，是參與商人對亘方的戰爭：

貞犬追亘㞢及。
犬追亘亡其及。（《合集》6946 正）

犬方“寇周”或“追亘”，使用的可能是本邦部隊，故卜辭有“犬𠂤（師）”之稱：

庚戌卜，王其比犬𠂤，叀辛亡𢦏。（《合集》41529）
丁酉卜，翌日王叀犬𠂤比，弗每，亡𢦏。不冓雨。大吉。（《屯南》2618）

犬方既稱臣於商，故卜辭屢見商王“乎（呼）犬”之記錄：[2]

［貞］乎犬［豋］見……（《合集》4645）
貞乎犬𢀛于［京］。（《合集》5667）

犬地收成情況自然亦受到商人關懷，卜辭乃見以下貞問：

辛酉［酉］［卜］，□，貞犬受年。十一月。（《合集》9793）

此外，有名“犬征”者屢見卜辭（《合集》4630 等）；犬征大概是服事商王的犬人。犬方既稱臣於商，此亦題中應有之義。[3]

2.《山海經·海内北經》稱：“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東有犬封國。”《釋名·釋州國》（卷二）：“邦，封也。”犬封或即卜辭所見“犬方”，蓋“方”[piuang] 即“邦”[peong] 或“封”[piong]。由此可見，卜辭所見犬方應即文獻所見犬封。而按之“海内北經”所列諸國大致地望，似可推知犬封或犬方在殷都之西。

既然《山海經·海内北經》又稱：“犬封國曰犬戎國”，知卜辭所見犬方與文獻所見犬戎同源。

3. 犬方地望：一說即日後周懿王所都，在今咸陽西南。《世本》：“懿王居犬丘”（《太平御覽》卷一五五引），宋忠曰：“懿王自鎬徙都犬丘，一曰廢丘，今槐里是也。”（《史記·周本紀》索隱引）《漢書·地理志上》：右扶風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丘”；《括地志》：“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丘，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史記·秦本紀》“正義”引）犬侯之國地近周邑，故得令多子族，從以伐之。[4]

一說應即《左傳·隱八年傳》所見“犬丘”：

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杜預曰：“犬丘，垂也，地有兩名”。垂在今山東菏澤東北。[5]

一說卽《左傳·僖十六年傳》所見“昆都”，在今臨汾南。[6]蓋《詩·大雅·緜》：“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而《說文》十篇上“馬部”：“駾，馬行疾來皃也”，引此詩作“昆夷駾矣”。同書二篇上“口部”：“呬，東夷謂息爲呬”，而引此《詩》作：“犬夷呬矣”。由此可見，“犬[hoan]夷”亦卽“混[huən]夷”或“昆[kuən]夷”。[7]

今案：若就犬人可追溯之故地而言，第二說近是。

一則，《太平御覽》卷七八〇引《竹書紀年》“后芬卽位，三年，九夷來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九夷”之稱，典籍屢見，而據《後漢書·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知包括畎夷在內皆爲東夷。質言之，犬人的故地近魯，故有“犬夷”之稱，後來西遷者始被稱爲“犬戎”，卜辭所見犬方卽犬戎之一部。[8]

二則，《尚書·禹貢》：“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所見“岱畎”旣與“萊夷”對仗，應釋爲泰山之畎夷；同篇所見“羽畎”，旣與下文“淮夷”對仗，則應爲居於羽山（今山東郯城縣）之畎夷。[9]亦見夏代畎夷之居地。

三則，《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稱：“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李注：“高辛，帝嚳。”帝嚳，玄囂青陽之後，繼顓頊卽位。據《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甫謐曰：顓頊“都帝丘，今東郡濮陽”；嚳“都亳，今河南偃師”。今案：顓頊乃少昊之繼位人，少昊居魯。[10]少昊、顓頊、嚳三者一脈相承，屬於同一地緣政治

集團。其都城逐步西遷，或者與來自其東方的犬人的侵擾有關。

另外，據《左傳·襄元年傳》，“鄭子然侵宋，取犬丘”，知河南永城西北亦有犬丘。與之相對，菏澤東北之犬丘或者更古。[11]

至於卜辭所載犬人居地究竟在何處，由於資料不足，尚難確斷。雖然，似乎無妨指爲臨汾南，蓋殷人根據地在東土，降至武丁時期，殷人積極西進，後方應已鞏固，故武丁所伐多半位於其西者。犬與亘見諸同版卜辭，固如說者所言，犬地與亘地（今河南長垣）較爲接近，[12] 祇是昆都附近有垣（今垣曲西），且不妨認爲其人乃遷自長垣。

除昆都外，咸陽西南，似乎也可以認爲是西遷犬人居地之一，卜辭所載之犬人有一部份正在這一帶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要之，卜辭所見犬方，既可能指臨汾附近的犬人，也可能是咸陽附近的犬人。

4.《後漢書·西羌傳》：“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閒。”《今本竹書紀年》亦稱：帝癸（一名桀）三年，“畎夷入于岐以叛”。兩者或者依據相同。果然，則似乎遲至夏末，已有一部份犬人西遷。由此亦見武丁所伐位於殷都之西。

5.《逸周書·王會解》末附“伊尹朝獻篇”則稱“正西”有“狗國”；狗國或即《山海經·海内北經》所見犬封，其時當在“邠、岐之閒”，殷湯居亳（今河南商丘），故稱“正西”。

6.《史記·齊太公世家》：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密須”，《左傳·昭十五年傳》杜注：“在安定陰密縣”；知同時所伐犬夷在周都之西。《逸周書·王會解》記成周之會四夷位次，亦稱“其

西”有“犬戎”。[13]文王所伐“犬夷”或即“伊尹朝獻篇”所謂“狗國”。

7.《後漢書·西羌傳》：“[穆] 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于太原。”一般認爲此則採自《竹書紀年》。今案：太原，一說在涇水上游，今平涼附近。[14]果然，穆王所遷犬戎有可能就是後來厲、宣時期出入涇、洛水流域之玁狁。[15]

8.《穆天子傳》卷一：“飲天子蠲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庚辰，至於□。觴天子于磐石之上。天子乃奏廣樂。載立不舍，至於鈃山之下。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鈃山之西阿，于是得絕鈃山之隊，北循虖沱之陽。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鈃山，井陘山，在今河北井陘。“虖沱”，指虖沱水。當水，今山西沙河、唐河。[16]

《穆天子傳》卷四：“孟冬壬戌，天子至于雷首。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雷首山，一說在山西蒲州府，其對河爲陝西華陰，渭水入河處，與《左傳·閔二年傳》所載“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正相符合。[17]由此可見，在《穆天子傳》此卷乃至《左傳》描述的年代，已有一支犬戎活躍於渭水流域。

犬戎觴穆天子當水之陽及雷首之阿未必事實，但上述兩處有犬戎應該不假。這些犬人的來源不詳。前者可能是自魯地西遷過程中留下的。後者則可能是自豳、岐東向蔓延者。

9.《國語·周語上》：“犬戎樹惇帥舊德。”“樹惇”，《史記·周本紀》作“樹敦”。或以爲由此可知穆王所伐犬戎之居地當在今青

海西寧一帶。蓋“樹敦”，犬戎主名，其居地因之得名“樹敦”。該處後屬吐谷渾，故《周書·史寧傳》有載：“樹敦、賀真二城，是吐［谷］渾巢穴”；而《隋書·吐谷渾傳》“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云云，則可證其地在曼頭山一帶。[18]

今案：其說未安。較可信的說法似乎應該是：“樹”係犬戎主名，“犬戎樹惇帥舊德”者，“惇”字當屬下讀，《爾雅·釋詁》：“敦，勉也”，意爲勉循舊德。(《國語·晉語七》：“惇帥舊職。”) [19] 上引《周語》等的記載與犬戎地望無關。

二

一說犬戎或畎夷應即卜辭和文獻所見鬼方。[20] 今案：“犬”或“畎”與“鬼”雖不妨視作同名異譯，但這至多說明犬戎或畎夷與鬼方有可能同出一源，而顯然不應在犬戎（畎夷）與鬼方之間，甚至不能在卜辭與文獻所見鬼方之間，以及文獻所見鬼方之間簡單地劃上等號。以下略考鬼方，並申說上述諸方面之關係。

1. 鬼方最早見諸卜辭，有關的記錄雖爲數不多，然似乎已經足以表明“鬼方”曾是一個與商敵對的方國：

己酉卜，宊，貞鬼方易亡囚。五月。(《合集》8591)

己酉卜，内，鬼方易［亡］囚。五月。(《合集》8592)

□□卜，㱿，貞鬼方［易］……（《合集》8593）

結合同時有關危方的同類卜辭：

己酉卜，㱿，貞危方其㞢囚。(《合集》8492)

己酉卜，㱿，貞危方亡其囚。五月。

可知“鬼方”與“危方”均係方國之名，[21] 且可推知商人是希望鬼方易有禍的，也就是說商人視鬼方易爲敵人，蓋上引卜辭所見危方爲商之敵國是可以肯定的；[22] “鬼方易”則爲人名，多半是鬼方之首領。[23]

顯然是由於武丁的征討，鬼方纔成了臣服於商的方國。鬼方既致力王事，故卜辭有如下貞問：

乙巳卜，宾，貞叀隻羌。一月。

乙巳卜，宾，貞叀不其隻羌。(《合集》203 正)

壬辰卜，爭，貞隹鬼𢼄。

貞不隹之𢼄。(《合集》1114 正)

允隹鬼眔周𢼄。(《合集》1114 反)

且有“小臣鬼”(《合集》5577)之稱。考慮到《叔夷鎛銘》稱伊尹爲“小臣”，則不能排除此“鬼”亦有較高職位的可能性。[24] 另外，鬼方既已臣服於商，卜辭自然有商王“令鬼”的記載：

丁卯，貞王令鬼㝵剛于亯。(《懷》1650)

蓋“令”,《說文》九篇上“卩部”:“發號也”;《禮記·大學》:“其所令反其所好”,“正義”:“令，謂君所號令之事。”[25]

至帝辛時，鬼方首領入爲三公之一，《戰國策·趙策三》:

> 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26]

《史記·殷本紀》所載略同,唯“鬼侯”作“九侯”(《今本竹書紀年》同),“集解”引徐廣曰:“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正義”引《括地志》則說:“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蓋殷時九侯城也。”其地去殷都不遠，應是鬼侯在畿內的采邑。[27]卜辭已有商王“步”於鬼侯采邑之記錄:

> 庚子卜，阪，步不乑，步鬼。(《合集》20757)

似乎說明鬼侯之封由來已久。

2. 卜辭所見鬼方之地望，衆說紛紜。然可大別爲三類。

其一以爲鬼方主要分佈於今山西西南部和中條山南北兩側。蓋鬼方實爲隗姓方國,《國語·鄭語》:“當成周者……西有虞、虢、晉、隗、翟、楊、魏、芮”;《左傳·定四年傳》:“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卽鬼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均可爲證。[28]

其二以爲鬼方主要分佈於今陝西。此說又可再分爲兩種：

一說鬼方原在洛水流域。《竹書紀年》稱“西落鬼戎”(《後漢書·西羌傳》李注引)，“落”指洛水；“梁伯戈銘”提及“鬼方蠻”，亦說明了這一點；蓋《漢書·地理志上》左馮翊夏陽縣注曰“故少梁”，少梁在韓城，鄰近洛水；且據同志，左馮翊有“翟道”，《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所謂縣“有蠻夷曰道”。[29] 翟道在黃陵，位於洛水支流沮水北岸。

二說鬼方應在陝北榆林至延安一帶，並向北延伸至晉北石樓、保德等地，李家崖文化的發現以及石樓、保德等處出土的具有明顯草原特點的青銅器均可爲證。[30]

其三以爲鬼方應在山西中部，自太原以至陝西一帶。[31] 蓋據《山海經·海內北經》所載“貳負之尸在大行伯東”，而“鬼國在貳負之尸北”；以及《左傳·僖二十三年傳》所載“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和杜注：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女曰叔隗、季隗，知爲隗姓也”等可以推知。

今案：卜辭疏略，說者所據又多爲後世記載，故但具參考價值而已。蓋自殷商以降，鬼方居地未必一成不變。何況文獻所載究竟是殷商之鬼方抑或𢀛方之裔也難以分清，蓋有證據表明，卜辭所見𢀛方在文獻中多被稱爲鬼方。而由於鬼方與𢀛方很可能同源，文化相類，亦難僅憑出土文物作出判斷。

3.《詩·大雅·蕩》：“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毛傳”：“鬼方，遠方也。”“正義”：“中國是九州，覃及是及遠，故

知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憊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通過孔氏的思路，不難知道《毛傳》之所以訓鬼方爲遠方，乃由《詩·大雅·蕩》以中國、鬼方對舉推得。[32]

但是，對舉“中國”與“鬼方”完全不足以成爲訓“鬼方”爲“遠方”之依據。詩人無非以“鬼方”作爲夷狄之代表，未必強調遙遠，也不能說明當時“鬼方”已經成爲夷狄的泛稱。“正義”引《易》爲證，亦無濟於事，蓋“用師三年，憊而乃克”很可能是因爲鬼方強大，而未必是因爲遙遠。何況即使鬼方是一遠國，亦不等於 “鬼方”可訓爲“遠方”。[33]“覃及鬼方”云云，說明殷商與鬼方關係之密切，與卜辭有關記載正相符合。《詩·大雅·蕩》所見鬼方正是卜辭所見鬼方也未可知。

4.《周易·既濟·九三》爻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正義曰：“高宗者，殷王武丁之號也。”《周易·未濟·九四》爻辭亦稱：“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這與前引表明鬼方爲商之敵國的卜辭似可參證。[34]然而，由於武丁時期有關卜辭畢竟未見征鬼方之明確記錄，或以爲《周易》所謂“鬼方”實爲泛稱，乃指武丁所伐多方。[35]

今案：指《周易》所見“鬼方”爲多方，固不失爲一說。但更值得重視的似乎是《周易》所見鬼方便是卜辭所見舌方的可能性（詳下）。

5.《後漢書·西羌傳》：“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

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或據以爲鬼方卽羌人，[36]似有未安。蓋傳文所謂氐羌“來王”，顯然是武丁征服鬼方，餘威所及。傳文“西戎鬼方”一本作“西羌鬼方”，[37]結合下文“西落鬼戎”來看，作“西羌”非是。退一步說，傳文卽使作“西羌鬼方”，也不能證明鬼方卽羌，蓋傳文不妨理解爲武丁在伐鬼方的同時，還征服了西羌，故引詩爲證。卜辭既見羌方，又見鬼方，知鬼與羌並非一種。

又，“武乙暴虐”以下，據李注，典出《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西落鬼戎”應卽“西戎鬼方”，伐西落鬼戎而俘二十翟王，說明鬼方卽鬼戎與翟人有密切關係，而翟與羌顯非同源，亦見鬼方與羌是二非一。王季所伐，一說卽武丁時臣服之鬼方。[38]今案：其說或是，但王季所伐並非卜辭所見鬼方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蓋當時西遷的犬人決非衹有一支，或者說西遷者分爲若干部應該是客觀事實。僅王季所俘翟王已多達二十人便可見一斑。

又，《文選》卷四七載揚雄“趙充國頌”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先零”，據《漢書·趙充國傳》，爲諸羌之一部。《世本》注果有依據，衹能認爲鬼方之一支於漢世融入了羌人部落，猶如《漢書·西域傳》所載，大月氏爲匈奴所逐西遷後，“保南山羌”之小月氏，後來亦多被目爲羌人。質言之，亦不能引《世本》注指鬼方爲羌。[39]

又，《後漢書·西羌傳》所引《詩·商頌·殷武》原文如下：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或據以爲伐鬼方卽伐荊楚；[40] 非是。該詩所說是武丁伐荊楚之事，之所以提到氐羌，是因爲氐羌當時也是強大的蠻夷，[41] 這和《後漢書·西羌傳》在敍說武丁伐鬼方時，援引氐羌“來王”的用意是相同的。

6.《今本竹書紀年》：“[武丁] 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荊；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一般認爲，此則出諸僞書，不足爲憑；[42] 但也有人認爲，其中資料應有所本。一說“荊”應在今河北獲鹿古井陘一帶，[43] 一說應在陝西西部。[44]

7. 據《大戴禮記·帝繫》，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顓頊，顓頊產老童，老童產吳回，“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陸終六子之一爲昆吾。昆吾之後，在夏爲侯伯，爲湯所滅。[45] 可見陸終與鬼方聯姻爲時甚古，亦可知鬼方淵源之早。[46] 而《山海經·大荒北經》稱：

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肉食。[47]

其中“融吾”應卽“祝融、昆吾”二名之合；[48] 此處“祝融”或指陸終。蓋據《史記·楚世家》：

>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黄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

可見陸終很可能繼吳回之後，復居火正，亦爲祝融。甚至"陸終"一名 [liuk-tjiuəm] 本身就是"祝融" [tjiuk-jiuəm] 之音轉。[49] 而上引《山海經》之文一本正作"黄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牡，是爲犬戎"，[50] 似可爲證。

又，《史記·楚世家》"正義"引《括地志》："故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二里。"又引《毛詩譜》云："昔高辛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爲鄶國，爲鄭武公所滅也"。由此可知陸終卽祝融故地之所在。陸終氏既與鬼方氏聯姻，其居地有可能相去不遠；質言之，不妨據以爲鬼人可追溯之故地亦在魯地，與犬人相同。

8.《國語·周語中》載富辰之言曰："狄，隗姓也。"韋注："隗姓赤狄也。"《左傳·成三年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這是説廧咎如是赤狄。[51] 據同傳，廧咎如之女爲叔隗、季隗，知廧咎如亦"隗姓赤狄"。或據以指鬼方爲赤狄。[52] 今案：對此，有以下兩點需要澄清：

一、《國語·鄭語》："當成周者……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韋注："鮮虞，姬姓在狄者也。潞、洛、

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53]《潛夫論·志氏姓》也有“隗姓赤狄”之說。這是說有部份赤狄爲隗姓，但赤狄絕不等於鬼方，《春秋釋例·世族譜下》(卷九) 稱：“赤狄子姬姓”，知赤狄並非一姓，可以爲證。

赤狄之外，尚有所謂白狄。《左傳·僖三十三年傳》：“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潛夫論·志氏姓》有所謂“嫱姓白狄”。“嫱姓”，一本作“姮姓”；汪箋：“昭十二年《穀梁傳》范甯注：‘鮮虞，姬姓白狄也’。疏云：‘《世本》文’。此‘姮’字疑‘姬’之誤。”[54]而《潛夫論·志氏姓》接著稱“短卽犬戎氏，其先本出黃帝”，“短”字便是“姮”卽“姬”字之誤。故所謂“姮姓白狄”，實爲“姬姓白狄”。又，《國語·鄭語》韋注稱：“鮮虞，姬姓在狄者也。”“狄”相對於下文赤狄而言，顯然也是指白狄，知白狄確有姬姓。

《左傳·成十三年傳》：“白狄及君同州”，知秦地爲白狄故地，然秦漢以後之隗姓，皆出雍州，知白狄亦有隗姓。[55]《左傳·僖二十四年傳》有狄后“隗氏”，或以爲此后亦白狄。[56]

又，結合“隗姓赤狄”云云，《潛夫論·志氏姓》“姬卽犬戎氏”句似乎說明作者逕指白狄卽犬戎，其原因可能是由於《山海經》稱犬戎爲白犬引起的聯想。應該指出的是，不能因白犬而指犬戎爲白狄，蓋白犬與白狄之間未必能劃上等號，犬人被稱爲白犬可能是其人膚色白皙的緣故；而一般認爲，所謂白狄與赤狄，乃由於前者尚白，後者尚赤所致。[57]也就是說，赤狄與白狄之分與族屬無關。退一步說，卽使傳世文獻所見犬戎與鬼方分屬赤、

白狄，客觀上兩者仍有可能同源。

要之，赤狄或白狄均非一姓，至少均有隗姓和姬姓，不能將隗姓僅歸諸赤狄，更不能指赤狄爲隗姓。

二、狄，最初可能是某一部落之專稱，後來逐漸變爲北方遊牧部落之泛稱。《逸周書》有所謂“五狄”（“明堂解”）、“六狄”（“職方解”），均説明狄不是一種。部份鬼方可以被稱爲狄或赤、白狄。但無論狄或赤、白狄均不等於鬼方。因此，既不能由鬼方的族屬來推斷狄或赤、白狄之族屬，更不能根據某些狄或赤、白狄的族屬來反推鬼方之族屬。

9. 昆吾之裔有曰“犬戎”者，顯然是因爲其鬼方氏特徵十分明顯的緣故，蓋“犬”[hoan]與“鬼”[kiuəi]爲一音之轉；懿王所都犬邱又名槐里，“槐里”應即“鬼里”；《後漢書·西羌傳》稱“犬戎寇邊”，古公避於岐下，遂有季歷之伐鬼戎。凡此均説明在某些場合“犬”與“鬼”被作爲等值的名稱使用。但是，這僅僅表明犬人與鬼人可能同源，不能將兩者完全等同起來。正如卜辭既有犬方又有鬼方，《山海經·海内北經》既有犬戎，又有鬼國。卽使同爲“犬戎”，作爲昆吾之裔的犬戎，也顯然有別於高辛氏時代已經存在的犬戎。

要之，雖然現有資料表明卜辭所見“鬼方”並非卜辭所見“犬方”，但兩者同源異流、同名異譯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因此，文獻所見犬戎未必不是卜辭所見鬼方之裔，文獻所見鬼方也未必不是卜辭所見犬方之裔。

三

除鬼方外，同爲武丁時期重要方國者，卜辭尚有所謂𢀛方。茲先考𢀛方，[58] 後述𢀛方與鬼方等之關係。

1. 𢀛方爲商之敵國。以下所卜均爲𢀛方出動是否會構成威脅：

壬子卜，穷，貞𢀛方出，王萑。五月。（《合集》6096 正）

壬子卜，㱿，貞𢀛方出，不隹我㞢乍囚。五月。

壬子卜，㱿，貞𢀛方出，隹我㞢乍囚。（《合集》6087 正）[59]

從以下卜辭可略窺𢀛方對商的侵犯。

［癸未］卜，□，貞旬亡囚。王固曰：㞢希，㞢夢，其㞢來嬄。七日乙丑，允㞢來嬄自［北，敞］戈化乎［告］：［𢀛］方征于我示……（《合集》137 反）

癸未卜，㱿，貞旬亡［囚。王固曰：㞢］希，其㞢來嬄。气至□日□□，允㞢來嬄自西，㞷戈□告曰：𢀛方征于我奠……（《合集》584 正甲）

癸未卜，永，貞旬亡囚。七日己丑，㞶友化乎告曰：𢀛方征于我奠、豐。七月。（《合集》6068 正）

以下見商王對𢀛方的討伐。

乙酉卜，㱿，貞舌方衛，王其［正］，勿告于［祖］乙［匄又］。(《合集》6344)

乙酉卜，㱿，貞舌方衛，率伐不，王其正，勿告于祖乙［匄又］。(《合集》6345)

□□［卜］，㱿，貞舌方衛，率伐不，王告于祖乙，其正，匄又。七月。

□□□，㱿，貞舌方衛，率伐不，王其正，告于祖乙，匄又。(《合集》6347)

貞舌方衛，勿告于祖乙。(《合集》6349)

貞告舌方于祖乙。

以下則可知伐舌方動員之規模：

丙午卜，㱿，貞勿𠭁人三千乎伐舌方，弗其受㞢［又］。(《英藏》559)

戊寅卜，㱿，貞勿𠭁人三千乎伐舌方，弗［其受㞢又］。(《合集》6171)

庚子卜，宾，貞勿𠭁人三千乎伐舌方，弗［其］受㞢又。(《合集》6169)

癸巳卜，㱿，貞𠬹人乎伐舌方，受㞢又。(《合集》6172，6173，6174)

［丁卯卜］，㱿，貞翌辛未令伐舌［方，受㞢又］。(《合集》6173，6174)

以上卜辭均屬武丁時期，知𢀛方一度成爲殷商之大威脅。武丁以後卜辭不見𢀛方之記載，一般認爲是𢀛方已被征服的緣故。

2. 𢀛方之地望。𢀛方與土方在卜辭曾同見一版，說明兩者可能同在殷商之西北：

> 王固曰：㞢希，其㞢來嬄。气至七日己巳，允㞢來嬄自西。𡧊友角告曰：𢀛方出，𠬝我示𩁹田，七十人。五［月］。
>
> 癸巳卜，㱿，貞旬亡𡆥。王固曰：㞢［希］，其㞢來嬄，气至五日丁酉，允㞢來嬄自西。沚馘告曰：土方征于我東啚，［𢦏］二邑，𢀛方亦帚我西啚田。(《合集》6057正)

具體而言，主要有二說，一說在今陝西，二說在今山西。

前說又可再分爲若干種，有人以爲位於陝北，即見諸《詩·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之“共”，[60] 地在今陝西富縣西南及南部地區。[61] 有人則以爲陝北之外，還可能包括河套。[62]

同樣，後說亦非衆口一辭。或以爲在垣曲與安邑之間的中條山地區；[63] 或以爲在太原附近，蓋卜辭所見與𢀛方相關之地名集中在這一帶；[64] 或以爲在山西石樓一帶。[65]

此外亦有以爲當在陝西、山西交界之處者。蓋由卜辭可知與𢀛方有關之地名如戉（山西平陸)、甫（山西永濟)、長（山西絳縣)、唐（翼城、夏縣附近）等等均在晉西南。[66]

今案：與犬方、鬼方相似，𢀛方之地望尚未能確證，以上諸

說所指雖然有可能是卜辭所見𢀛方之居地，但也完全可能是𢀛方後裔之居地，故諸說目前祇能供參考而已。

3. 卜辭所見𢀛方可能便是若干文獻所見鬼方。

一、“𢀛”[kong]與“鬼”[kiuəi]可視作同名異譯。[67]

二、現存記載𢀛方之卜辭多達五百餘片，集中於武丁時代，標示來犯月份者凡三十餘見，所載遭受蹂躪之殷西邊鄙亦有數十處，足見殷商與𢀛方有著長期接觸，這與《周易·既濟》所謂“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正相符合。[68]

三、據殷曆，可推出卜辭所載𢀛方來犯及武丁討伐之年爲二十九年底至三十二年，雖與《今本竹書紀年》所載武丁伐鬼方於三十二至三十四年不符，然畢竟相去不遠，且首尾均爲三年；後者或因傳聞有誤，無妨事實之一致。[69]

四、如前所述，卜辭所見𢀛方有可能便是文獻所見之共，共之地望雖有異議，但以爲與密、阮相近則一。《史記·齊太公世家》載文王伐密須的同時伐犬夷；“密須”既卽《詩·大雅·皇矣》之密，犬夷便有可能是共卽𢀛方之裔。“犬”、“鬼”往往爲同名異譯，亦見𢀛方有可能在文獻中被稱爲鬼方。

應該強調指出的是，不能由此得出卜辭所見𢀛方便是卜辭所見鬼方的結論，𢀛方與鬼方同在殷之西北，但其具體方位未能考定，指兩者同一並無確據。[70]

要之，從現有資料來看，卜辭所見鬼方雖非卜辭所見𢀛方，但卜辭所見𢀛方便是若干文獻所見鬼方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四

上述犬方、鬼方和爲𢀛方同源異流，“犬”、“鬼”和“𢀛”爲同名異譯。而文獻和金文所見玁狁或獫狁，既可能是卜辭所見犬方、鬼方或𢀛方的後裔，也可能是三者之外另一支西遷犬人的後裔。至於匈奴，其名與“玁狁”或“獫狁”亦得視爲同名異譯，其人則可能是夏末北遷之犬人。

1. 玁狁在文獻中始見《詩經·小雅》。一般認爲，其中“采薇”一首所描述者爲懿王時事，其餘“出車”、“六月”和“采芑”三首均爲宣王時事。

玁狁的居地，史無明文，僅僅因爲它不斷侵犯宗周，其出入之地尚有蹟可循。據“出車”、“六月”，以及不期簋、多友鼎二銘，可知玁狁出入地主要爲涇水流域；而據虢季子白盤、兮甲盤二銘，則玁狁出入地尚應包括部份洛水流域。[71] 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表明涇水乃至洛水流域便是玁狁盤踞之地，但是不能排除這兩水特別是涇水流域有部份地區正是玁狁居地的可能性。而如前所述，這些地區也是商周時期犬戎活動的區域。這就是說，犬戎很可能便是玁狁或其前身。

2.《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事混夷……太王事獯鬻。”似乎混夷有別於獯鬻。然而《詩·大雅·緜》既言太王定都之後，伐木開道，混夷畏其強而驚走，則可知太王所事正是昆夷。《孟子》易以異名同實之獯鬻，乃因前文已有“文王事混夷”一句。[72] 果然，則混夷、犬夷又被稱爲“獯鬻”。

《詩·小雅·采薇·序》："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逸周書·序》亦稱："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獫、玁同音，"玁狁"應即"獫狁"。"昆夷"亦即"玁狁"或"獫狁"，二序錯舉成文，略如《孟子》；[73]蓋"昆夷"應即"混夷"，而"玁狁"[xian-jiuən]或"獫狁"[xian-jiuən]又與"獯鬻"[xiuən-jiəuk]得視爲同名異譯。[74]上引詩序等無非說文王時西、北面有昆夷亦即玁狁之難。

3.《穆天子傳》卷五："畢人告戎，曰：陖翟來侵。天子使孟悆如畢討戎"，於是"陖翟致賂：良馬百駟，歸畢之珤，以詰其成"。[75]"陖翟"，舊注："隗姓國也"；知"陖"乃"獫狁"之略稱，蓋"狁"[jiuən]與"陖"[siuən]音可轉（喻心鄰紐）。獫狁被稱爲翟（狄），亦獫狁與鬼方或犬戎同源之確證。

4.《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索隱"引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引樂產《括地譜》："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結合張、樂之言，可知"淳維"與"獯粥"實爲同名異譯，亦即小司馬所謂"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果然，則此處"淳"應讀如郭。蓋其聲傍爲𦎫而非𩫖，形近致訛。類似的例子如"埻"。《山海經·海内東經》：流沙中有國名"埻端"。據郭注，"埻音敦"；而據《集韻·入聲下》（卷十），此"埻"字讀如郭，"光鑊切"；唯獨如此，"淳維"[kuak-jiuəi]始得視爲"獯粥"[xiuən-tjiəuk]之異譯。

既然“淳維”卽“獯粥”得視作“玁狁”或“玁狁”，亦卽“犬夷”、“昆夷”等之異譯，所謂“淳維以殷時投北邊”無非是說夏末有一支犬人北遷，是爲“匈奴”[xiong-na]之祖。《史記·匈奴列傳》“索隱”引應劭《風俗通》：“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引服虔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玁狁，秦曰匈奴”；以及韋昭之言：“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等；[76]也衹能理解爲“淳維”卽“獯粥”與“葷粥”[xiuən-tjiəuk]、玁狁等同出一源。

既然匈奴係夏末北遷之犬人，則此前並無匈奴可知。“唐虞以上”云云，則似乎不應理解爲追述匈奴以前“居於北蠻”者，而是暗示玁狁或葷粥可能是匈奴的前身。《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稱：“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李注：“高辛，帝嚳。”由此可知太史公所謂“唐虞以上”乃指高辛氏，而玁狁、葷粥等皆犬戎之別稱，數者並列則不妨理解爲當時犬戎已非一支。

至於稱匈奴先祖爲“夏後氏之苗裔”，正如小司馬所說“或當然也”，不必深究。

5.《漢書·匈奴傳上》述匈奴前史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

靡家，獫允之故'；'豈不日戒，獫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於大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畎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遂取周之地[焦]（鹵）獲，而居於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鎬而東徙于雒邑。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郊，始列爲諸侯"。《史記·匈奴列傳》所載略同。

此外，《漢書·韋賢傳》載王舜、劉歆上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云云，則爲已知最早的獫狁、匈奴同族論。

由此可知，在兩漢人心目中，獫狁與畎戎乃至匈奴是一脈相承的，固然不能據此在獫狁、畎戎或匈奴之間劃上等號，但完全無妨得出數者同源的結論。

6. 上引《山海經·海内北經》的記載似乎表明，犬封即犬戎擅長馴犬，"犬夷"或"犬戎"之稱乃音義兼顧，而如果考慮到《說文》十篇上"犬部"："獫，長喙犬也"；則"獫狁"之類稱呼亦兼顧其義。而《逸周書·王會解》："匈戎狡犬，狡犬者，巨口，赤身，四尺踝"。[77]"匈戎"，當即匈奴。知匈奴與犬亦有至爲密切的關係。

7. 獫狁與犬戎、犬戎與匈奴、胡與鬼之同源關係，以下三則亦堪佐證：

一、1975年扶風縣發現的西周穆王時期（約前九世紀中葉）簋器銘[78]有載：

> 隹六月初吉乙酉，才（在）𡈼（堂）𠂤。戎伐馭，𢦏逹（率）有𤔲（司）、師氏𢓊（奔）追𨛭（攔）戎于䧹（棫）林，博（搏）戎𦳮（胡）。……

一般認爲“𦳮”即“胡”字。

“棫林”，一説見諸《左傳·襄十六年傳》：“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杜注：“棫林、函氏，皆許地。”時許都於葉，今河南葉縣，棫林在縣治東北。既然𢦏“奔追𨛭戎于棫林，搏戎𦳮（胡）”，則棫林近胡；《漢書·地理志上·汝南郡》屬縣有“女陰”，注曰：“故胡國”；知西周胡國在今安徽阜陽縣。《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引《世本》：“胡，歸姓也。”[79] 今案：“胡”、“鬼”音近；其實“胡”即“歸”，亦即“鬼”。1978年陝西武功任北村發現西周後期窖藏銅器，其中有𦳮叔、𦳮姬爲其女伯隗所作媵簋的三件蓋，亦説明了同樣的問題。[80]

另説“棫林”大致在涇水西岸，今扶風、寶雞一帶。[81] 果然，則此戎胡很可能便是穆王所伐犬戎，蓋前引《穆天子傳》卷四正稱“犬戎”爲“犬戎胡”。知犬戎亦稱爲胡，與匈奴相同。

二、《詩·小雅·出車》“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知玁狁又被稱爲西戎。而畎戎亦有西戎之稱。《國語·晉語一》：“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史記·周本紀》與同書“秦本紀”亦分別稱之爲“西夷”或“西戎”。[82]

三、《史記·趙世家》：載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信稱，若秦出兵，越句注山，斷常山一線，則“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

不出”。胡犬很可能指犬戎之犬。

8. 以下是幾點補充說明：

一、《詩·大雅·皇矣》：“帝遷明德，串夷載路。”鄭箋：“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知混夷卽玁狁又稱“串夷”，蓋“串”讀如“患”[hoan]，與“犬”同音。[83]

二、《逸周書·王會解》附“伊尹朝獻篇”稱正西有昆侖、鬼親，正北有翟、匈奴等。或以爲鬼親旣卽鬼方，而狗國卽犬戎；則犬戎、鬼方、翟、匈奴等並有別。[84] 今案：其說未安。蓋以下兩種可能性不能排除：其一，“伊尹朝獻篇”所載其實是不同時代記錄的堆積。其二，數者爲同部別出，所處地理位置不同而已。質言之，不能據以否定數者同源。

三、《魏書·高車傳》稱：“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勑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似乎表明赤狄乃至鬼方之族源與匈奴有別。但是，古赤狄或其餘種絕非隗姓卽鬼方一種，不能因高車乃至丁零與匈奴有不同起源，而否定鬼方與匈奴同源。何況，同傳又據另說稱高車之先爲“匈奴之甥也”，很可能正是由於它與部份隗姓赤狄卽鬼方有關。

四、《史記·匈奴列傳》所見匈奴部落有“渾庾”[kuən-jio]、“渾邪”[kuən-zya]，或係昆吾部落之北遷者，蓋兩名均得視爲“昆吾”[kuən-nga]之同名異譯。

要之，混夷、昆夷、犬夷（或犬戎）、串夷、葷粥、獯鬻、淳維和獫狁（或玁狁）乃至匈奴其實乃同名異譯。淳維、葷粥、獯鬻、獫狁、玁狁、匈奴爲全譯，混、昆、串、犬爲略稱。

五

犬方、鬼方、玁狁等與匈奴的同源異流關係還可以從體質人類學的證據，並結合西史的有關記載給予說明：

1. 匈奴雖然是一個複雜的部落聯合體，然核心部落是歐羅巴種之可能性不能排除，[85] 而犬方、鬼方等之種族歸類存在同樣可能性之證據如下：

一、鬼字屬像形，《說文》九篇上“鬼部”：“像鬼頭。”犬戎又被稱之爲“鬼”，應是以“鬼”字形容其人面目之異形。[86] 古代譯名往往音義兼顧。譯稱“鬼”兼顧其體貌特徵，譯稱“犬”或“玁狁”則兼顧其圖騰，諸如此類。

二、據《山海經·大荒北經》犬戎有“白犬”之稱。這很可能是因爲其膚色較白的緣故。應該指出的是被稱爲白犬的犬戎是陸終氏與鬼方氏之妹的後裔，按理說有別於一般的犬戎或鬼方氏，但既然沒有陸終氏係白色人種之記載，便不妨認爲正是陸終氏一系中出現了體貌特徵的變異，纔有了關於白犬的記載，而這一變異的根源正是娶鬼方氏之女。

膚色較白的人種屢見於古籍，如《山海經·海外西經》：“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髮。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白民之國，郭注：“言其人體洞白。”又如《逸周書·王會解》：“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麒（一說乃‘狐’字之訛），背有兩角。”《淮南子·墬形訓》亦稱：“自西北至西南方，有……白民。”高誘注：“白民，白身民，被髮，髮亦白。”

白民國人與犬人同源亦未可知。蓋《逸周書·王會解》又稱：“犬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黄金，名古黄之乘。”《山海經·海内北經》亦載：“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有一女子，方跪進柸食。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壽千歲。”“古黄之乘”，一本作“吉黄之乘”，而所謂“吉量”顯然是“古黄”或“吉黄”之訛。關於白民的“乘黄”，有種種解釋，但正確的解釋似乎應該是“古（吉）黄之乘”。[87]這說明犬戎與白民有相同的特産，似堪佐證兩者之同源。既然這些披髮、白身之人可能是白色人種，則犬戎爲白色人種之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三、《大戴禮記·帝繫》，“黄帝居軒轅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産青陽及昌意。……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産顓頊。顓頊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産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緺氏，産重黎及吳回。吳回氏産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産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六人出焉。”《太平御覽》卷三七一引《世本》：“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出焉”；大同小異。據研究，這種脅生傳說是印歐語系民族神話中的特有形態；[88]例如東漢竺大力、康孟祥譯《修行本起經·菩薩降身品第二》（卷上）：

> 於是能仁菩薩，化乘白象，來就母胎。……十月已滿，太子身成，到四月七日……夫人攀樹枝，便從右脇生，墮地行

七步，舉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爲尊。[89]

又如吳支謙譯《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90]等，均有佛陀生自其母右脇或左脇之傳說。此外，印度大神 Indra 亦有類似傳說。蓋據《梨俱吠陀》(4.18.2)，Indra 自言："余即自脇之寬廣處出來"。[91]值得注意的是，《帝繫》所載陸終氏之前無脇生者，故此傳說乃源於陸終氏所娶鬼方氏無疑，而鬼方氏爲印歐語族之嫌疑便不能排除。

2. 據希羅多德《歷史》[92]（I，103；IV，13，22，23）記載，上古歐亞草原曾發生一次民族遷徙：Arimaspi 人將 Issedones 人逐出故土，Issedones 人敗走時衝擊 Massagetae 人，後者則迫使 Scythia 人西遷，侵入了 Cimmeria 人的居地。其中，Arimaspi 意爲"獨目人"。希羅多德有關記載的主要依據是公元前七世紀後半葉 Proconnesus 島出生的希臘詩人 Aristeas 描述其中亞旅行見聞的長詩《獨目人》(Arimaspae)。因此，可以認爲這次民族遷徙至遲在公元前七世紀末已經發生。

無獨有偶，中國典籍中也有關於獨目人的記載。例如：《山海經·海內北經》："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爲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貳負神在其東，爲物人面蛇身。"同書"海外北經"："一目國在其東，一目中其面而居。一曰有手足。"同書"大荒北經"："有人一目，當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郝懿行注："此人即一目國也。"又《淮南子·墜形訓》："自東北至西北方……有一目民。"早已有人指出，這個威 [iuəi] 姓的一目國便是鬼方。被稱爲"一目"是由於面罩遮蓋了鼻、嘴，僅留一孔顯露其目之故。[93]

又據《史記·秦本紀》，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這次開疆拓土很可能引起了上述希羅多德記載的歐亞草原上遊牧部落多米諾式的遷徙，[94]而據《史記·匈奴列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知被逐西徙諸族中包括"緄戎"。"緄戎"《漢書·匈奴傳上》作"畎戎"，顏注："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緄。……昆、混、畎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知"緄戎"又名"犬戎"即"畎夷"，也可稱爲"鬼方"或"一目國"，與希羅多德有關記載若合符契。

又，同一事件，《淮南子·精神訓》載："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同書"主術訓"稱："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高注："胡，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遣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去戎來適秦。秦伐戎，得其上地。"此處"胡"應該也是指的緄戎。

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經·大荒北經》關於一目人爲"少昊之子"的敍述。其意義有待進一步探索。

3. 斯特拉波《地理志》[95]（XI, 11, 1）據 Apollodorus（約前200年）記載，希臘巴克特里亞諸王將他們的領土擴張到 Seres 和 Phryni。或以爲：Seres 既指中國，Phryni 應即 Hun（匈奴）。[96]今案：此說未安。公元前三世紀末，匈奴的勢力十分弱小，在它的

西方是強大的遊牧部落月氏。月氏的勢力範圍東起河套，西抵天山、阿爾泰山。[97] 因此，當時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勢力範圍根本不可能同匈奴接觸。[98] 換言之，Phryni 決非匈奴。

此外，Pliny《自然史》[99]（VI，20）稱，Tochari 附近居有 Phuni 人。Dionysius' Periegisis [100] 亦稱 Tochari 與 Seres 的鄰居是 Phryni。所述 Phuni、Phryni 亦有人以爲均指匈奴。[101] 今案：Pliny（23—79 年）和 Dionysius（約三至四世紀）本人對匈奴有所瞭解客觀上雖然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們有關 Phuni 和 Phryni 記載顯然是襲自 Apollodorus，不能視作他們所處時代的記錄。也就是說同樣不能將 Phuni 和 Phryni 視作匈奴。

西方史籍所見 Seres，一般認爲指中國，主要原因是該國產絲。但是，Pliny《自然史》（VI，24）稱 Seres 人"金髮、碧眼"，則所載並非產絲之漢人可知。又據同書（VI，20），Seres 人的居地大致在 Scythae 之東，其南爲印度。Seres 和印度之間是 Attacorae、Phuni、Tochari 等；結合前引 Apollodorus 關於巴克特里亞諸王伸張其勢力範圍至 Seres 的記載，可知 Seres 人其實是指當時成爲絲綢貿易中介的部落，其居地大致在今新疆及其以北地區。[102] 果然，則 Phuni 亦應求諸塔里木盆地或其以北。至於 Tochari 人，在 Pliny 等描述的時代，自河西地區經塔里木盆地直至葱嶺以西均有其蹤蹟，[103] Phuni 與之爲鄰亦未必是匈奴。

其實，斯特拉波的 Phryni、Pliny 的 Phuni 和 Dionysius 的 Phryni 顯然祇能是遲至秦穆公稱霸西戎時業已西遷的緄戎之裔。

■ 注釋

[1] 參見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卷下，科學出版社，1954年，p. 42；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p. 294；劉桓"甲骨、金文中所見犬戎與玁狁"，《殷都學刊》1994年第2期，pp. 1-4。今案：諸說似將文獻所見犬戎與卜辭所見犬方完全等同，不如指兩者同源較爲確切。

[2] 參見楊升南"卜辭中所見諸侯對商王室的臣屬關係"，胡厚宣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pp. 128-172。

[3] 詳見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第1冊第1篇，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1944年；注1所引劉桓文；以及注2所引楊升南文。

[4] 注3所引胡厚宣文。

[5] 鄭傑祥《商代地理概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pp. 186-191。

[6] 注1所見陳夢家書（出處同）。

[7] 參見王國維"鬼方昆夷玁狁考"，《觀堂集林》（卷一三），中華書局，1959年，pp. 583-606。又，《廣韻》卷四"廢部"："瘃，困極也；《詩》云：昆夷瘃矣。"今案："犬夷呬矣"、"昆夷瘃矣"乃約舉"混夷駾矣，維其喙矣"二句。桂馥《說文解字義證》，齊魯書社，1987年，pp. 122-123，以爲"犬夷呬矣"等乃"混夷駾矣"之異文；非是。參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二篇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p. 56，以及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四），中華書局，1992年，pp. 824-825。

[8] 參看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52，臺北，1988年再版，pp. 1022-1023。陳氏以爲，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夏后相元年"征淮夷、畎夷"。征淮夷又征畎夷，此畎夷，

東夷也；又云，夏桀時“畎夷入居豳、岐之間”，是畎夷已由東而西遷矣。畎夷與犬戎關係之說亦見丁驌《夏商史研究》，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pp. 80-81。今案：《太平御覽》卷八二引《竹書紀年》作“元年，征淮夷”，無“畎夷”二字，王氏據《路史·後記》一三及《後漢書·西羌傳》補。又，犬戎，《史記·周本紀》稱之爲“西夷犬戎”，則可見犬人自夷變戎的軌蹟。

[9] 見段連勤“犬戎歷史始末述——論犬戎的族源、遷徙及同西周王朝的關係”，《民族研究》1989 年第 5 期，pp. 82-89。

[10] 見本書上卷第二篇。

[11] 此外，甘肅天水縣西亦有犬丘，即《史記·秦本紀》所見“西犬丘”；紀文稱居西犬丘之秦莊公“爲西垂大夫”，知西犬丘又稱“西垂”。自東至西，稱“犬丘”之地凡四，且東西兩端之“犬丘”皆有另稱曰“垂”，堪作犬人自東而西遷徙的證據。參看注 9 所引段連勤文。

[12] 說見注 5 所引鄭傑祥書（出處同）。

[13] 參見注 8 所引陳槃書，pp. 1023-1024。關於“當水”之地望，衆說紛紜，見王貽梁、陳建敏《穆天子傳彙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pp. 16-18。

[14] 顧炎武《日知錄》卷三“大原條”。俞樾《羣經平議》十以爲大原應指山西太原。今案：果如俞說，則穆天子所遷之戎與厲、宣時期之獫狁並非同一部落。當然，這無妨犬戎與獫狁同源；何況迄今獫狁地理的研究尚未完全排斥獫狁居地在汾水流域的可能性；質言之，《詩·小雅·六月》之“大原”也在山西亦未可知。參看注 8 所引陳槃書，pp. 81-85。

[15] 李仲操“也釋多友鼎銘文”，《人文雜誌》1982 年第 9 期，pp. 95-99。

[16] 參見注 8 所引陳槃書，pp. 1031-1036。

[17] 見江永《春秋地理考實》卷一。關於“雷首”之地望，衆說紛紜，見注 13 所引王貽梁、陳建敏書，p. 227。

[18] 見張澍《姓氏辯誤》卷二二；汪遠孫《國語發正》卷一等。

[19] 參見注 8 所引陳槃書，pp. 1027-1036。

[20] 參見注 7 所引王國維文。

[21] 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長春出版社，1992 年，p. 7。

[22] 參看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科學出版社，1959 年，pp. 73-75。王玉哲“鬼方考補正”，《考古》1986 年第 10 期，pp. 926-929，890，亦主此說，可參看。今案：王文以爲《周易》有關鬼方的爻辭中出現的“三年”乃指武丁在位之第三年，似未安。

[23] 關於“鬼方易”有許多討論。例如：丁山《商周史料考證》，中華書局，1988 年，p. 78，以爲易作動詞用，讀若颺；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鬼方易》，中華書局，1979 年，p. 425，以爲易與揚爲古今字，作動詞用，是說鬼方飛揚而去，言其逃亡之速。注 3 所引胡厚宣文以爲易乃鬼方之一地。此外尚有族名、方國名等說，詳見羅琨，“‘高宗伐鬼方’史蹟考辨”，載注 2 所引胡厚宣主編書，pp. 83-127，等等。今案：此取屈萬里說，見《殷虛文字甲編考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1 年，p. 424。

[24] 參見張永山“殷契小臣辨正”，載注 2 所引胡厚宣主編書，pp. 60-82。《叔夷鎛銘》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科學出版社，1958 年，pp. 246-247。

[25] 參見注 2 所引楊升男文，以及注 23 所引羅琨文。

[26] 《禮記·明堂位》所述：“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顯係同一事件的異傳。

[27] 注 21 所引李學勤書，p. 8。

[28] 注 7 所引王國維文；注 1 所引陳夢家書，pp. 274-275；注 5 所引鄭傑祥書，pp. 317-318；趙林《商代的羌人與匈奴》，臺北：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5 年，pp. 49-54，說略同。劉運興“武丁伐鬼方進軍路線及其他”，《殷都學刊》1987 年第 2 期，pp. 22-27，則以爲殷人所伐鬼方在汾水谷地，且已東向發展至太行、常山間。

[29]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中華書局，1986 年，pp. 183-184。

[30] 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年，pp. 279-281；陳全方、尚志儒“陝西方國考”，殷墟博物苑、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編《殷墟博物苑苑刊》創刊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年，pp. 88-97；以及石樓縣文化館“山西石樓義牒發現商代青銅器”，《考古》1972 年第 4 期，pp. 29-30；楊紹舜“山西石樓諸家裕、曹家垣發現商代銅器”，《文物》1981 年第 8 期，pp. 49-53；呂智榮“陝西清澗李家崖古城陶文考釋”，《文博》1987 年第 3 期，pp. 85-86；張映文、呂智榮“陝西清澗縣李家崖古城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8 年第 1 期，pp. 47-56。

[31] 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汲古書院，1975 年，pp. 416-417；鍾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pp. 195-196。

[32] 參看注 21 所引李學勤書，p. 6。

[33]《毛傳》關於鬼方卽遠方的看法，在漢代以降頗爲流行，例如：《經典釋文・周易音義・既濟》於“鬼方”下引《蒼頡篇》：“鬼，遠也。”《漢書・匡衡傳》“化異俗而懷鬼方”，顏注引應劭曰：“鬼方，遠方也”等等。《文選》卷四八載班固“典引”：“威靈行於鬼區”；注：“鬼區，絕遠之區也。”《後漢書・班彪列傳下》：“威靈行於鬼區”；李注：“鬼區，遠方也。《易》曰：高宗伐

鬼方。”但是，《漢書·嚴助傳》載淮南王安“諫誅閩越書”：“《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量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一二引虞翻注：“高宗，殷王武丁。鬼方，國名”；均以“鬼方”爲特指。又，《周易集解》卷十二引干寶注：“高宗，殷中興之君，鬼方，北方國也。高宗嘗伐鬼方，三年而後克之”；似乎說“鬼方”乃北方之國的泛稱，然而如果理解所謂“嘗伐鬼方”不過是說高宗曾經北伐而已，則在干寶心目中“鬼方”亦爲北方一國之名稱。今案：入周以後，鬼方不復出現於史事。過去曾以爲小盂鼎、梁伯戈均與鬼方有關(例如王國維注 1 所引文)，近已辨明非是（見李學勤“論史牆盤及其意義”，《考古學報》1978 年第 2 期，pp. 149-157，esp. 153，以及“小盂鼎與西周制度”，《李學勤集——追溯·考據·古文明》，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 年，pp. 165-179）。實際上，“鬼方”衹是商代通行的名稱，西周以後成了遠方蠻夷之代名詞，但不能因此指商代鬼方爲“遠方”。參看注 21 所引李學勤書，p. 9。

[34] 見注 3 所引胡厚宣文。徐中舒“殷周之際史蹟之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 ~ 2 （1936 年），pp. 137-164，則以爲“未濟九四條”謂周伐鬼方，而殷人賞之，蓋以小邦而伐大國之敵，故有震驚、震恐之意。

[35] 見注 23 所引羅琨文。

[36] 見注 23 所引羅琨文。

[37]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卷八七。

[38] 注 30 所引陳全方、尚志儒文。

[39] 注 23 所引丁山書，p. 78，以爲“先零”乃《竹書紀年》所見“西落”之對音。今案：其說或是。

[40] 主鬼方位於南方者，最早有黃震《黃氏日鈔》卷四，最近則有王燕玉“殷周鬼方辨”，《貴州史專題考》，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pp. 1-21。關於鬼方西南說欠妥之處，侯紹莊“‘鬼方’討論述評”，《貴州文史叢刊》1984年第4期，pp. 12-17，有詳細指證。

[41] 注40所引侯紹莊文、注22所引李學勤書，p. 9。

[42] 注34所引徐中舒文。

[43] 注28所引劉運興文。

[44] 注40所引侯紹莊文。

[45]《今本竹書紀年》載帝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又載：帝芬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蘇”。又載：帝癸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克昆吾”。《史記·楚世家》“正義”引《括地志》曰：“濮陽縣，古昆吾國也。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即昆吾墟也。”

[46] 參看李學勤“談祝融八姓”，注33所引書，pp. 74-81。

[47]《史記·匈奴列傳》“索隱”引《山海經》文“犬戎”作“犬夷”。今案：“索隱”所引似爲原文。

[48] 說本丁驌《夏商史研究》，出處見注8。

[49]“陸”與“祝”韻部相同，聲母可轉（所謂來照準旁紐）；而青銅器邾公釛鍾銘文所見陸終之“終”與楚帛書所見祝融之“融”實爲同一個字。參見注33所引李學勤書，pp. 74-75；以及王國維“邾公鍾跋”，《觀堂集林》（卷一八），中華書局，1959年，p. 894。

[50] 引自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十七。

[51]《左傳·成十三年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竹添光鴻《左氏會箋》（成下第一三，葉一〇）以

爲此處以“白狄”指稱廧咎如，蓋《左傳·僖二十三年傳》：“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今案：其說非是，蓋晉與狄通婚，不僅廧咎如。參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3年，p. 405。

[52] 例如：注29所引唐蘭書，pp. 183-184。

[53] 潞氏之姓尚有妘、姜、姬三說，未知孰是；詳見注8所引陳槃書，pp. 1118-1120。

[54]《潛夫論箋校正》，（漢）王符著，（清）汪繼培箋，彭鐸校正，中華書局，1985年，p. 457。

[55] 參見注7所引王國維文。關於白狄地望，可參看注8所引陳槃書，pp. 1080-1082。

[56]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列國姓氏表》，中華書局，1993年，p. 1155。

[57] 參見注8所引陳槃書，pp. 1019-1020。

[58] 詳見胡厚宣“殷代舌方考”，《甲骨文商史論叢初集》第2冊第1篇，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專刊之一，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出版，1944年。

[59] 以上詳見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pp. 346-351。

[60] 注58所引胡厚宣文，以及注30所引陳全方、尚志儒文。

[61] 呂調陽《羣經釋地》二：“共，阮邑，鄜州西之張村驛也，清水河經其東北。”注60所引諸文意見大致相同，亦即以爲密約在今陝西關中西北部及甘肅靈臺一帶，阮約在關中東部澄城縣以北白水、黃龍兩縣之間部份地區，共大致據有富縣西南及南部地區。卜辭所見舌方則主要位於陝西中部地區而稍北，與位於陝北之鬼方爲鄰。

[62] 注31所引島邦男書，pp. 385-387。說者的結論主要依據卜辭所見受舌方

侵略之地推得。

[63] 注 1 所引陳夢家書，p. 274；陳氏並指出土方與𢀛方相鄰。

[64] 李毅夫“鬼方𢀛方考”，《齊魯學刊》1985 年第 4 期，pp. 12-15，47。

[65] 注 5 所引鄭傑祥書，pp. 284-286。該文認爲所謂李家崖文化應歸屬𢀛方。

[66] 注 31 所引鍾柏生書，pp. 198-191。注 34 所引徐中舒文則以爲鬼方之本據在山西，陝西涇洛之間亦爲其出沒之地。

[67] 董作賓《殷曆譜》下編卷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5 年，p. 39），“論𢀛方卽鬼方”條：“余疑𢀛方卽鬼方，此念蓄之已久，以卜辭別有鬼方，故未能決，今乃知蓋同音假借，先後異文也。”

[68] 詳見朱歧祥“殷武丁時期方國研究——鬼方考”，《許昌師專學報》1988 年第 3 期，pp. 72-77。又，注 8 所引丁驌書，pp. 153-163，有武丁“征𢀛方簡譜”，可參看。

[69] 參見注 68 所引朱歧祥文。

[70] 參看注 28 所引趙林書，pp. 61-68。

[71] 參見本書上卷第三篇。

[72] 注 7 所引王國維文。注 1 所引陳夢家書，p. 275，否定王氏說；非是。

[73] 注 7 所引王國維文 。

[74] “狁”與“鬻”韻部相去較遠，似不可轉，但“玁狁”或“獫狁”與“獯鬻”並非漢字之通假，而是同名異譯。具體而言，文部與覺部雖不可轉，但兩者卻均可能轉自職部（職文通轉、職覺旁轉）。類似情況屢見不鮮。考慮到原名往往係“重譯”而得，譯者往往鄉音不同，又非音韻專家，今日在對音時似不宜求諸過嚴。

[75] 參看孫詒讓“《穆天子傳》郭璞注”，《札迻》卷一一。

[76] “索隱”注《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北逐“葷粥”曰：“匈奴別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風俗通》所謂“獯粥”在此成了“鬼方”。

[77] 原文作“匈戎狡犬，狡犬者，巨身，四尺果”，據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pp. 947-948，所引孫詒讓、劉師培諸說校改。

[78] 唐蘭“𢦚簋器銘”，注 29 所引書，pp. 408-410。

[79] 裘錫圭“說𢦚簋的兩個地名——棫林和胡”，《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pp. 386-391。

[80] 盧連成、羅英傑“陝西武功縣出土楚簋諸器”，《考古》1981 年第 2 期，pp. 128-133。

[81] 唐蘭“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綜論寶雞市近年發現的一批青銅器的重要歷史價值”，《文物》1976 年第 6 期，pp. 31-39；注 29 所引書，pp. 408-410。

[82] 注 1 所引劉桓文。

[83] 注 7 所引馬瑞辰書（卷二四），p. 843，曰：“《爾雅·釋詁》串、貫竝訓‘習也’，《釋文》貫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遦’。《玉篇》：‘串，或爲慣’。《傳》以串卽貫字之假借，故以習釋之，未若《箋》謂串夷卽混夷爲允。串卽毌字之隸變，貫、毌古今字，昆、貫雙聲，畎與昆、貫亦雙聲，故知串夷、混夷爲一，皆畎夷之假借。或又省作犬夷，皆一音之轉。患字從串得音，故串夷或作患夷，亦同音假借字耳。”

[84] 參看陳槃《不見於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59，臺北，1982 年（第三版），pp. 137-139。

[85] 余太山“匈奴、Huns 同族論質疑”,《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pp. 242-271。

[86] 沈長雲“玁狁、鬼方、姜氏之戎不同族別考”,《人文雜誌》1983 年第 3 期,pp. 75-81。

[87] 乘黄在古籍中有各種異稱,《通雅》卷四六:“飛黄、訾黄、翠黄、乘黄、吉量、古皇、吉光、吉黄,一物。”今案:其說甚是。《山海經》與《逸周書》有關白民之乘黄與犬戎之吉黄的記載事實上很可能是一致的。參看注 77 所引黄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書,pp. 944-946。

[88] 詳見饒宗頤“中國古代‘脇生’的傳說”,《燕京學報》新第 3 期(1997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pp. 15-28。

[89]《大正新脩大藏經》T3, No. 184, p. 463。

[90]《大正新脩大藏經》T3, No. 185, p. 473。

[91] S. S. P. Sarasvati and S. Vidyalanrar, tr. *Ṛgveda Samhita*. New Delhi: Veda Pratishthana, 1977, pp. 1430-1431.

[92] D. Grene, tr. Herodotus, *The History*.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93] 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pp. 57-60;王克林“一目國鬼方新探”,《文博》1998 年第 1 期,pp. 30-38,66。關於“一目”,周建奇“鬼方、丁零、敕勒(鐵勒)考釋”,《內蒙古大學學報》1992 年第 1 期,pp. 31-41,別有說。

[94] 詳見注 85 所引余太山書,pp. 7-8。

[95] H. L. Jones, tr.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8 vols. London, 1916-1936.

[96] Kálmán Namäti, "The Historic-geographical Proofs of the Hiung-nu = Hun Identity." *Asiatic Quarterly*, 3rd. Ser. 29 (1910): pp. 325-369.

[97] 見注 84 所引余太山書，pp. 52-56。

[98] W. W. Tarn, *The Greek in Bactria and India*. London: Cambridge, 1951, pp. 84-85.

[99] H. Rackham, tr. Pliny, *Natural History*,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London, 1949.

[100] C. Müller, ed. "Dionysius' Periegesis, 'Scythica et Caucasica'. "In *Geographi Graeci Minores* II". Paris, 1882.

[101] J. Charpantier, "Die ethnographische Stellung der Tochare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71 (1917): pp. 347-388.

[102] 参看注 98 所引 W. W. Tarn 書，pp. 110-111。

[103] 見注 85 所引余太山書，pp. 16-21。



下卷

一　渠搜

一

相傳堯、舜、禹、湯時代已有渠搜：

1. 賈誼《新書·脩政語上》："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搜。"[1]

2.《史記·五帝本紀》：帝舜"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

又，《大戴禮記·五帝德》：帝舜"南撫交趾、大教，［西］鮮支、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夷］、鳥夷、羽民"。

又，《大戴禮記·少閒》："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

又，劉向《說苑·修文》："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鳥夷。四海之內，皆戴帝

舜之功。”[2]

3.《尚書·禹貢·雍州》:“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又,《大戴禮記·少閒》:“舜有禹代興,禹卒受命……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3]

4.《大戴禮記·少閒》:“成湯卒受天命……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

以上固難落實,但渠搜歷史之悠久由此可見。質言之,堯舜禹湯時代已有渠搜人存在之客觀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渠搜“來服”既然長期以來成了天下太平、四海歸一的像徵,表明渠搜曾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戎落。

以下是有關周代渠搜之記載:

1.《大戴禮記·少閒》:“文王卒受天命……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

2.《逸周書·王會解》:成王時成周之會,“渠叟以鼩犬”獻。

3.《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五月詔:“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昚、北發、渠搜、氐、羌徠服。”

4.《穆天子傳》卷四:“天子(穆王)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巨蒐之人𥝩奴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且具牛馬之湩,以洗天子之足,及二乘之人。甲戌,巨蒐之[人]𥝩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乃獻馬三百、牛羊五千、秋麥千車、膜稷三十車。天子使柏夭受之。”[4]

今案:至少成康間渠搜來貢,其人穆王時依然存在,沒有理由懷疑。

二

渠搜之地望。

1. 前節所引有關先周時期渠搜的傳說或記載，多位置渠搜於中原之西，或逕稱之爲“西戎”。《漢書·揚雄傳下》載雄“解謿賦”有云：“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將“渠搜”與“東海”對稱，亦渠搜故地位於中原以西之證據。

2. 《漢書·武帝紀》師古注引服虔曰：渠搜，“地名也”。又引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又引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月支可得而臣；似國名也。‘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5] 又引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此舉北以南爲對也。《禹貢》渠搜在雍州西北，渠搜在朔方。”

由此可見，渠搜人居地多得名“渠搜”。朔方有渠搜，金城之西亦有渠搜。

3. 《禹貢》所見渠搜之位置歷來有二說：一說位於《漢書·地理志下》所見朔方郡之渠搜縣；較早提出此說者，除臣瓚外，尚有酈道元。酈說見《水經注·河水三》：“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中部都尉治，王莽之溝搜亭也。《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此舉北對南。《禹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6] 另說以應劭爲代表，以爲應在金城之西。[7]

今案：後說或是。果然，則朔方之渠搜乃自西而東遷人者。

4.《穆天子傳》所見巨蒐之地望衆說紛紜，[8] 或據《禹貢》有關記載推出，蓋指巨蒐爲《禹貢》所見"渠搜"；或據《穆天子傳》所載穆王行程推出。或以爲在陰山一帶，[9] 或以爲在朔方，[10] 或以爲在肅州以西至鄯善一帶，[11] 或以爲在費爾幹納，[12] 等等。今案：第一說近是。果然，則《穆天子傳》所描述的巨蒐卽渠搜，是已知位置較東的一支。

5.《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注引《魏略·西戎傳》："中道西行尉梨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耆，姑墨國、溫宿國、尉頭國皆并屬龜茲也，楨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莎國、西夜國、依耐國、滿犂國、億若國、榆令國、捐毒國、休脩國、琴國皆并屬疏勒。"其中，"渠莎"[gia-sai] 應卽"渠搜"之異譯。然而，這個渠莎國不見載於《漢書·西域傳》，具體方位不得而知。按之《魏書·西域傳》："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里"，似乎在《魏書·西域傳》描述的時期，《魏略·西戎傳》所見渠莎國已經據有《漢書·西域傳》莎車國之王治。今案：這固然是一種可能性。但是另一種可能性同樣不能忽視：《魏略·西戎傳》所載"渠莎"其實衹是《漢書·西域傳》所載"莎車"的別名，《魏略》編者不明真相，誤一國爲二國。西域諸國，由於組成之種族較爲複雜，一國二名甚至數名者並非僅僅莎車一國。[13]

6.《山海經·海內東經》稱："國在流沙外者，大夏、豎沙、居繇、月支之國。"類似記載亦見《魏略·西戎傳》："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繇國、月氏國。"或以爲，《山海經》這則記載

是漢通西域後所附益，並非原文。[14]今案："豎沙"、"居繇"實係"堅沙"、"屬繇"之訛，可分別視爲"貴霜"、"粟弋"之異譯。《魏略》並列大夏、月氏、堅沙三者，雖無視時代差，然客觀上亦曲折地反映出大夏亡於月氏，月氏又亡於貴霜（堅沙）這一歷史過程。[15]又，雖然《魏略·西戎傳》可能是附會《山海經》的記載，但衹要考慮到渠搜的存在，就不難發現《山海經》的上述記載未必爲漢以後所附益：大夏（吐火羅）、堅沙（渠搜）、屬繇（粟特）和月氏四者早在先秦時期已經活動於流沙（騰格里沙漠）以西是無可懷疑的。

7.《太平御覽》卷一六五引《異物志》："古渠搜國，當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故渠搜國也。"這說明在鏺汗卽費爾幹納地區也有渠搜人。而這些渠搜人在《隋書·西域傳》描述的年代取代原來的吐火羅人，成爲費爾幹納地區的宗主，其名始得顯彰。中國史籍將"大宛"改稱"破洛那"（《魏書·西域傳》）或"鏺汗"也許與這一變動有關。

吐火羅人至遲在公元前140年左右進入費爾幹納，[16]渠搜人進入該地當略早於此。進入費爾幹納的渠搜人一度聚居於Khojend，該地或許因而得名"貴山"[giuət-shean]。吐火羅人進入費爾幹納後，渠搜人北遷位於費爾幹納北部的Kāsān，Kāsān亦得視爲"渠搜"之異譯。[17]這可能就是《涼土異物志》稱"古渠搜國"在"大宛北界"的緣故。

8.《太平御覽》卷七九三引宋膺《異物志》："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

行則至死。唯冬可行，尚嘔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爲。冬乃枯歇，故可行也。”按之《漢書·西域傳上》：

> 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磐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

知“大頭痛、小頭痛山”位於皮山之西、縣度之東。大小頭痛山既在“渠搜之東”,則此處渠搜應在皮山之西無疑。至於其具體位置，《水經注·河水二》透露了一點消息：

> 城南有水，東北流，出羅逝西山，山即葱嶺也，逕岐沙谷，出谷分爲二水。

“羅逝”山應即“迦舍羅逝”山；“迦舍”[keai-sjya] 與下文之“岐沙”[ngye-shea] 應爲同名異譯，“羅逝”[lai-zjiat] 應即梵文 raja 之音譯。“迦舍羅逝”猶言“迦舍王”。迦舍羅逝國，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見“渴槃陁”、《大唐西域記》卷十二所見朅盤陀。[18]《梁書·西北諸戎傳》稱渴盤陁國“王姓葛沙氏”；“葛沙”[kat-shea] 與“迦舍”、“岐沙”乃同名異譯。“迦舍”、“葛沙”既與“渠搜”得視爲同名異譯，[19] 正是宋膺《異物志》所見渠搜 [gia-shiu] 亦未可知。

三

渠搜人的生産、生活方式。

1.《史記·夏本紀》:“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序。”“集解”引孔安國曰：“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索隱”引鄭玄以爲“衣皮之人居昆侖、析支、渠搜，三山皆在西戎”。[20]

《漢書·地理志上》:“織皮昆崘、析支、渠叟，西戎卽敘。”師古曰：“昆崘、析支、渠叟，三國名也。言此諸國皆織皮毛，各得其業。而西方遠戎，並就次敍也。”[21]

由此可知，渠搜之特産爲毛織品。這種毛織品被稱爲氍毹。[22]

2.據前引《穆天子傳》，巨蒐之人具牛馬之湩，以洗穆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又獻馬三百、牛羊五千、秋麥千車、膜稷三十車。或可由此推得渠搜爲遊牧部落，兼營農耕。

3.據前引《逸周書·王會解》，可知渠搜產鼩犬；而所謂“鼩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知渠搜人能馴服猛獸。

4.《拾遺記》卷三載周靈王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駱駝高五尺。”一說“渠胥”卽“渠搜”。[23]同書卷五則載漢武帝元狩六年，“渠搜國獻網衣一襲”。此爲傳說，錄以備考。

四

渠搜的族屬，歷來有若干討論。

一說“渠搜”即“粟特”(Sugda)。[24] 今案：其說非是，蓋對音不類。說者曲爲之解，無濟於事。

一說渠搜卽戰國時河西地區之月氏。[25] 今案：應該承認此說有其合理性。一則，“渠搜”與“月氏”不妨視爲同名異譯。二則，河西地區確實可能有渠搜人活動。其時間也可能在月氏抵達河西之後。三則，《逸周書·王會解》之類典籍雖然同時並舉渠搜和禺氏（月氏），完全可能是將不同地區的同一種人誤解爲兩種，就是說這類記載也無礙渠搜卽月氏或兩者同源說成立。但是，如果考慮到有關渠搜的傳說所反映出來的渠搜人歷史異乎尋常之悠久，則將渠搜和月氏視爲兩種似乎更爲妥貼。

還有其他一些說法，[26] 茲不一一。

以下是本篇的新說：渠搜可能與少昊族同源。

一、少昊卽己姓青陽

據《左傳·昭十七年傳》疏引《世本》言“青陽卽是少皞”。但相傳黃帝之子名青陽者有二，一爲己姓，一爲姬姓。蓋據《國語·晉語四》：

>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

爲方便起見，這二青陽不妨分別稱爲己姓青陽和姬姓青陽。

由於同爲黄帝之子而有二人同名青陽，後人産生種種疑惑。[27]或以爲得姓者十四人應爲十三人，青陽、夷鼓所得“己姓”應爲“姬姓”，夷鼓便是蒼林。[28]

今案：二青陽均爲黄帝之子而同名，固然可疑，但這很可能僅僅是文字之訛，不能因此從根本上否定《國語·晉語》的記載。

一則，《史記·五帝本紀》亦載“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改“四”爲“三”，缺乏依據。

二則，《國語·晉語》明載青陽既有己姓，又有姬姓，結合《大戴禮記·帝繫》：

> 黄帝居軒轅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産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産顓頊。

更可知二者有不同的母系：己姓爲方雷氏，姬姓爲西陵氏。二青陽不應混爲一談。

《史記·五帝本紀》稱：“黄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嫘祖爲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其中，“江水”乃“泜水”之訛。[29]據此，可知《大戴禮記·帝繫》所述“青陽”當爲玄囂；既然“有天下”者並非玄囂本人，僅僅是“其後”（昌意的情况也可供參考），不同於少昊本人已有天下，玄

嚣青陽便不可能是少昊。故“索隱”認爲《史記》上引記載表明“太史公意青陽非少昊明矣”。[30]

《世本》既載少皞即青陽，又載“己姓，出自少皞”（《左傳·昭十七年傳》疏引），則少昊應爲己姓青陽。少昊既爲己姓青陽，玄嚣便是姬姓青陽。

要之，黄帝之子有二青陽，姬姓青陽與己姓青陽，前者即玄嚣，後者即少昊。

二、少昊有可能先昌意居有若水

1. 如上所述，玄嚣即姬姓青陽降居泜水，降居若水者爲昌意。但《春秋釋例·土地名之三》（卷七）引《世本》稱：“鄀，允姓之國，昌意降居爲侯也。”似乎昌意降居之處原爲允姓之國。

2. 若水流域的這個允姓國祇能是少昊所建。蓋相傳少昊之子允格居鄀、有子鄀姓，鄀之得名顯然是因爲少昊曾居若水之故。至於前引《世本》提及的“鄀”，自應求諸若水流域，否則，便應該是“若水”之訛；[31]而杜氏所謂“在襄州樂鄉縣”的鄀即所謂上鄀，應是允姓後來遷徙之地。[32]

3. 降生於若水的顓頊氏相傳東遷魯北窮桑輔佐少昊，也是少昊與若水淵源之明證。[33]

4.《爾雅·釋言》：若，“順也”。“允”之本義亦爲順；《尚書·大禹謨》：“瞽亦允若”，乃同義連用。[34]允姓之“允”、若水之“若”無疑皆爲音譯，祇是在選用漢字時，已賦予他義；兩譯稱所選漢字本義均爲“順”，自非偶然。另外，允姓與羌人的混血種名爲“婼羌”。[35]婼，據《説文》十二篇下“女部”，“不順也。從女若

聲。《春秋傳》有叔孫婼”。今案：叔孫婼似乎不可能以“不順”命名，許氏書當衍“不”字。《漢書·西域傳上》稱“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顔注：“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去胡來”這一譯稱的漢文字面意思顯與“婼”字本義相一致；換言之，“婼”字本義同“若”。[36] 從中似乎也可以看出允姓與若水的關係。

要之，在昌意降居之前若水已有允姓國，少昊之據有若水先於昌意，若水應爲少昊可以追溯的最早故地（其後裔之居地因而有得名爲“鄀”者）。少昊後來因故東遷，國號“窮桑”，“窮桑”[giuəm-sang] 與“允姓”[jiuən-sieng] 爲同名異譯。

三、“渠搜”與“允姓”得視爲同名異譯

“渠搜”，就其名稱而言，雖然既可以視爲“月氏”或“虞氏”之異譯，又可以視爲“允姓”之異譯。但如果考慮到渠搜族之年代似乎早於月氏之前身有虞氏，且始終活動於中原以西，則該族與少昊同源之可能性更大。蓋原居若水之允姓卽少昊族，除大部東遷魯北窮桑外，尚有餘衆散處朔方等地，史稱渠搜。

以下是幾點補充：

1.《山海經·大荒北經》：“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陰山、泂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之所入處。”同書“海内經”則曰：“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閒，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若”，《説文》六篇下“叒部”作“叒”，云“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象形”。一説《説文》所言是東極若木，《山海經》所説乃西極若木。[37] 今案：以上所引表明：日出、日入之處均有若木，日出處若木亦卽扶桑，而若木所生，卽

若水所出。允姓國以及昌意所據若水一般認爲即今四川雅礱江，固不失爲一說，但不排除另一種可能：雅礱江之西另有若水。上引《山海經·大荒北經》郭注稱：若木“生昆侖西附西極”；《離騷》云：“折若木以拂日。”王逸注：“若木在昆侖西極，其華照下地”；均可爲證。這就是說，允姓之來源或者更可以向西方追溯。

要之，若木所生乃有若水，若木不僅生於西極日入之處，亦生於東方日出之地（所謂“扶桑”或“窮桑”），蓋與少昊氏之遷徙有關。

2. 昌意降居之前據有若水的允姓國、自若水東遷窮桑的少昊族、作爲少昊族後裔的允姓之姦、以及後者西遷成爲塞種一部且最終散處西域各地之 Asii 等雖然同出一源，但由於彼此際遇不同，可能在語言、習俗甚至體貌特徵上存在一定的差異。

3.《廣弘明集·辨惑篇》載梁荀濟“論佛教表”引《漢書·西域傳》之文曰：“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爲月氏迫逐，遂往葱嶺南奔。”[38] 一般認爲，此處所謂“允姓之戎”應即見諸《左傳·昭公九年》之陰戎。這固然不失爲一種可能性。但似乎有必要指出下述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荀濟所引“允姓之戎”實際上是渠搜，亦即東遷窮桑的允姓國之餘衆。而被認爲是西遷允姓之戎支脈的一些部落，譬如烏孫 [a-siuən]，同樣也可能是渠搜人。

4. 既然少昊氏之號“窮桑”與“允姓”爲同名異譯，月氏前身有虞氏之祖顓頊之號“高陽”（即少昊之故號“窮桑”）與“虞氏”或“月氏”亦爲同名異譯，則“月氏”一名與“允姓”或“渠搜”也是同名異譯。因此，河西乃至西域各地與“月氏”、“允

姓”等類似的族名、國名、地名究竟得自月氏還是允姓頗難區分。不僅如此，西方史籍所載 Sakās 諸部中的 Gasiani 與 Asii（Asiani）固然可以使之對應於月氏與允姓，但也不妨指 Gasiani 爲允姓，指 Asii（Asiani）爲月氏。有關問題的徹底解決，祇能以俟來日了。

■ 注釋

[1]《今本竹書紀年》：帝堯陶唐氏“十六年，渠搜氏來賓”，或與《新書》依據相同。

[2] 劉向《新序·雜事第一》亦稱：舜“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

[3]《晉書·張軌傳》史臣曰：“渠搜是居，大禹卽而方敍。”

[4]《列子·周穆王篇》：“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

[5] 王恢，《漢書》無傳，晉氏所引見“韓安國傳”。

[6] 陸德明說略同，見《尚書正義》，中華書局影印《十三經註疏》，1991 年，p. 150。

[7] 傅寅《禹貢說斷》卷二支援應說：“以余考之，漢朔方之渠搜非此所謂渠搜，此亦當是金城以西之戎也。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若禹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陸氏之說非也。”胡渭《禹貢錐指》卷十說略同。

[8] 參看王貽梁、陳建敏《穆天子傳彙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pp. 215-216。

[9] 鄭傑文《穆天子傳通解》，山東文藝出版社，1992 年，p. 73，以爲按穆王行程考察，巨蒐居地當在陰山北艾不蓋河、錫拉木倫河一帶。注 12 所引王貽梁、陳建敏書（出處同）以爲按之傳文，巨蒐居地距陽紆之東尾僅一日程，故必在陰山東麓之北至多百里左右處。

[10] 陳逢衡《穆天子傳注補正》卷四；小川琢治“周穆王の西征”，《支那歷史地理研究續集》，東京：弘文堂，1939 年，pp. 165-408，esp. 326-327；等。

[11] 岑仲勉“《穆天子傳》西征地理概測”，《中外史地考證》，中華書局，1962 年，pp. 1-41，esp. 34。

[12] 高夷吾“讀《穆天子傳》隨筆”，《古學叢刊》第 3 期（1937 年），pp. 1-17；等。

[13]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pp. 210-215。

[14] 王國維“西胡考”，《觀堂集林》（卷一三），中華書局，1959 年，pp. 606-616。

[15] 參看注 13 所引余太山書，p. 43。

[16] 參看注 13 所引余太山書，pp. 71-72。

[17] 當然，也不排除 Khojend、Kāsān 均得名於 Gasiani，參看注 13 所引余太山書，pp. 71-72。

[18] 參看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第 6 卷），東京：岩波，1970 年，pp. 97-227，esp. 135-136，以及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 年，pp. 983-984。

[19] “迦舍”、“葛沙”也可能是 Gasiani 之漢譯，參看注 13 所引余太山書，pp. 210-215。

[20] 鄭玄說《尚書正義》亦引之。今案：鄭氏以“渠搜”爲山名，或有所據。其山蓋因渠搜人所居而得名。

[21]《宋書·禮志五》："……斑白鼲子、渠搜裘……皆爲禁物"；《宋書·符瑞志下》亦稱："渠搜，禹時來獻裘"；可以參看。

[22] 參看馬雍"新疆佉盧文書中之 kośava 卽氍毹考——兼論'渠搜'古地名"，《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 年，pp. 112-115。

[23] 岑仲勉"上古東遷的伊蘭族——渠搜與北發"，《兩周文史論叢》，商務印書館，1958 年，pp. 44-54。

[24] 注 23 所引岑仲勉文。

[25] 注 18 所引白鳥氏文，載同注所引書，pp. 223、224。

[26] 見注 10 所引小川氏文，載同注所引書，pp. 327-328。

[27] 如《左傳·昭十七年傳》疏："《晉語》稱青陽與黃帝同德，故爲姬姓。黃帝之子十四人，爲十二姓，其十二有姬有己，青陽旣爲姬姓，則己姓非青陽之後。而《世本》己姓出自少皞，非青陽也。事遠書亡，不可委悉耳。"諸如此類。

[28]《史記·五帝本紀》"索隱"："舊解破四爲三，言得姓十三人耳。今案:《國語》胥臣云: 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唯青陽與夷鼓同己姓。又云：青陽與蒼林爲姬姓。是則十四人爲十二姓，其文甚明。唯姬姓再稱青陽與蒼林，蓋《國語》文誤，所以致令前儒共疑。其姬姓青陽當爲玄囂，是帝嚳祖本與黃帝同姬姓。其《國語》上文青陽，卽是少昊金天氏爲己姓者耳。旣理在不疑，無煩破四爲三。"今案：小司馬說甚是。《漢書·古今人表》："方雷氏，黃帝妃，生玄囂，是爲青陽。絫祖，黃帝妃，生昌意"；以及《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皇甫謐曰："[黃帝] 元妃西陵氏女，曰累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節，生青陽。次妃彤魚氏女，

生夷鼓，一名蒼林。”均將己姓青陽與姬姓青陽混爲一談，未安。又，《國語·晉語四》韋注雖然承認有二青陽，一爲己姓，一爲姬姓，但又說“方雷，西陵氏之姓”，等於說己姓青陽是嫘祖所生；也是爲了否定青陽有二，致誤原因與《漢書·古今人表》等相同。

[29] 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 年，p. 217。

[30]《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宋衷曰：“玄囂青陽是爲少昊”；非是。

[31] 張澍所輯《世本·居篇》逕作：“若水，允姓國，昌意降居爲侯。”(《太平御覽》) 輯者桉曰：“杜預以昌意所封在鄀，乃襄州樂鄉，非是南郡之鄀。允姓爲秦所入者，《世本》以若水爲允姓，誤矣。”今案：輯者不知己姓青陽亦曾居於若水，因而指斥《世本》；非是。另案：此則不見載於今本《御覽》。又，同書所輯《世本·氏姓篇》：“婼，姬姓之國，黃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爲諸侯，此其後也。”輯者桉曰：“此婼在襄州樂縣，見杜預《左傳》注，《世本》以昌意降處之若水當之，非也。”今案：輯本所引見諸《太平寰宇記·山南東道四·襄州》(卷一四五)。既然昌意曾居若水，其後裔所居處名婼也是完全可能的。結合《路史·國名紀》所引《世本》關於鄀爲“允姓國”的記載，則也不妨認爲下鄀得名於允姓，而上鄀得名於昌意之後。

[32] 樂鄉之鄀，可能是自下鄀人遷允姓之戎的遺蹟。《路史·國名紀》(卷二五)：“舊鄀本商密，秦楚界上小國。《世本》云：允姓國。秦人之，後遷南郡。今襄之宜城西南有鄀亭山，上有城險固。”今案：舊鄀當得名於允格，非秦所入。

[33] 參見本書上卷第二篇。

[34] 趙和平《〈說文〉小篆研究》，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pp. 155-157。

[35] 參看本書上卷第三篇。

[36] 說詳周連寬《漢婼羌國考》,《中亞學刊》第 1 輯，中華書局，1983 年，pp. 81-90。

[37] 見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十七，巴蜀書社，1985 年。

[38]《大正新脩大藏經》T52, No. 2103, p. 129。

二　義渠

一

義渠史蹟尚可約略考知一二。[1]

《今本竹書紀年》稱：武乙"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如果相信這一記錄，則遲至殷末已有義渠國。《逸周書·史記解》所載："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與《今本竹書紀年》所述或者正是同一事件。至於《逸周書·王會解》："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則不妨理解爲後來義渠稱臣於周之後的情況。

降至春秋，據《史記·匈奴列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漢書·匈奴傳上》所載略同。

戰國時，據《史記·六國年表》，秦厲共公六年（前 471 年），

"義渠來賂"。三十三年（前 444 年），"伐義渠，虜其王"。[2] 秦躁公十三年（前 430 年），"義渠伐秦，侵至渭陽"。[3] 秦惠文王七年（前 331 年），"義渠内亂，庶長操將兵定之"。秦惠文王十一年（前 327 年），"義渠君爲臣"。秦惠文王初更十一年（前 314 年），"侵義渠，得二十五城"。[4]

義渠侵秦"至渭陽"，《後漢書·西羌傳》作"至渭陰"。傳文接著説："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于洛。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義渠遂臣於秦。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郁郅。後二年，義渠敗秦師于李伯。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準此，敗秦師於洛、秦取郁郅、敗秦師於李伯和秦取徒涇二十五城依次爲公元前 335 年、前 319 年、前 317 年和前 316 年。

今案：據《史記·張儀列傳》，義渠稱臣後，"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5]"五國伐秦"，據《史記·六國年表》，爲秦惠文王後元七年（前 318 年），義渠君襲秦，或在五國伐秦之明年。

嗣後，據《史記·秦本紀》，武王元年（前 310 年），秦又"伐義渠"。

又據《史記·匈奴列傳》，至"秦昭王時（前 306—前 251 年），

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漢書·匈奴傳上》所載略同。而據《後漢書·西羌傳》，"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時在"[周] 王赧四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五年，前 272 年)。[6]

義渠雖滅，其殘部似乎直至漢初尚在，蓋據《漢書·匈奴傳上》：

> 明年（昭帝元鳳二年，前 79 年），單于使犂汙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犂汙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犂汙王，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爲犂汙王。

爲張掖屬國千長者仍稱"義渠王"，知義渠部落尚未完全消亡。

又，《漢書·鼂錯傳》載錯上言兵事，曰：

> 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

這應該就是賈誼《新書·匈奴篇》所謂“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的背景。

二

義渠最早之居地，可追溯至涇水以北。

《史記·匈奴列傳》稱：“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索隱”引韋昭曰：“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史記·秦本紀》“正義”引《括地志》爲：“寧、原、慶三州，秦北地郡，春秋及戰國時爲義渠戎國之地，周先公劉、不窋居之，古西戎也。”《史記·匈奴列傳》“正義”引《括地志》則作：“寧州、慶州、原州，古西戎之地，即公劉邑城，周時爲義渠戎國，秦爲北地郡。”[7] 知漢代北地郡東周時曾爲義渠居地。《漢書·地理志》載：北地郡有“義渠道”；《後漢書·西羌傳》載公元前319年“秦伐義渠，取郁郅”；注：郁郅，“縣名，屬北地郡”；以及前引《今本竹書紀年》關於周伐義渠、《逸周書》關於義渠位於周之正北的記載，均可佐證。

《後漢書·西羌傳》載公元前316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注：“徒涇，縣名，屬西河郡。”[8] 果然，則漢西河郡戰國時亦爲義渠勢力範圍。

一說徒涇當在甘肅涇州境，蓋義渠在寧州西北界，其東南接涇州。漢西河郡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地，與義渠故地相距太遠。[9]

今案：秦代義渠之根據地固然在涇水之北，但不能完全排除其勢力伸張一度達到後來漢西河郡之可能性。[10]

一則，據《後漢書·西羌傳》，“周貞王八年（前461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卽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知義渠曾與諸戎一起雜居“中國”，且在諸戎被逐後繼續存在於汧、隴之東。前335年，義渠敗秦師於洛，則更說明義渠還試圖東向發展。

二則，據《史記·匈奴列傳》，“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秦之上郡包括後來漢西河郡之西部，其地之一部取自義渠亦未可知。

三

或以爲義渠乃吐火羅之支族。[11] 其說略曰：《墨子·節葬下》：“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列子·湯問篇》亦有類似記載：“秦之西有儀渠［注：又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祡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儀渠”應卽“義渠”，知其人有火葬

之俗。吠陀文謂火曰 agni，焚曰 dagdha，火葬則爲 agnidagdha，正相當於“義渠登遐”，是義渠語借用印度語之證。蓋天山南路，上古已有印度之移民。“義渠”既與“焉耆”爲同名異譯，焉耆人操吐火羅語，則義渠亦得爲吐火羅人，本印度移民，初居天山南路（據《大唐西域記》卷一二，在且末之西），春秋時始徙殖隴西。

今案：此說未安。

一則，《列子·黄帝篇》：“而帝登假”。“假”即“遐”之借字。知“登遐”並非僅用於義渠人火葬。

又，《禮記·曲禮下》：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假”。鄭注：“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耳”。知《墨子》、《列子》所謂“燻上”或“燻則煙上”，乃指死者因而昇天仙去，此外别無它解。

“登遐”亦作“登霞”、“登假”或“升假”，意思相同。《楚辭·遠遊》：“載營魄而登霞兮”；《莊子·德充符》：“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同書“大宗師”：“[古之真人] 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者也若此”；以及《漢書·郊祀志下》載谷永之言：“世有僊人……登遐倒景”（顏注：“遐亦遠也”）；《淮南子·齊俗訓》：“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許注：“假，上也”）；等等。均可佐證。[12]

二則，古代焉耆之地果有說吐火羅語者，也不等於焉耆人便是吐火羅人，當然也不能僅僅因“義渠”與“焉耆”爲同名異譯，得出義渠人是吐火羅人的結論。[13]

四

或指義渠爲羌。[14] 其說如下：

1.《呂氏春秋·義賞篇》："氐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荀子·大略》作："氐羌之虜也，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知羌人亦有火葬之俗，與義渠同。今案：習俗並非判定族屬的主要標誌，同族之人習俗可能不同，異族也可能有相同習俗。何況《後漢書·西羌傳》以下有關羌人之記錄言及習俗時，均未及火葬，說明該俗似乎不是羌人的主要葬俗。

2.《漢書·趙充國傳》："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義渠安國是義渠人，宣帝命安國兩次巡行西羌各地，安國不辱使命，正是由於他熟悉西羌語言風土的緣故。義渠人而熟悉西羌，可見兩者之關係。今案：熟悉西羌語言風土者，不是非羌人莫屬。何況，如《漢書·趙充國傳》所載，安國的使命完成得並不出色，也許正是由於他其實並不真正熟悉西羌語言風土的緣故。

3.《後漢書·西羌傳》傳首敍述義渠事蹟，顯然將義渠目爲西

戎，而西戎包括大量氐羌；據此或者也可推測義渠與氐羌較爲接近。今案：傳首敍述包括義渠在内的西戎事蹟，無非是要説明西戎之畔服與中國治亂之關係，以史爲鑒，爲正文敍述西羌歷史張目；不能據以爲義渠與羌人同族。

要之，不能將義渠視爲羌族。[15]

五

或指義渠爲匈奴、狄或白狄。[16]其説略曰：

前引《漢書·鼂錯傳》記鼂錯上書將義渠稱爲“降胡”，且稱其飲食長技與匈奴即胡同。

又，《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附“公孫賀傳”：“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爲平曲侯。”亦可證漢人目義渠爲匈奴。

由此可見，《通志·氏族略二》引應劭《風俗通義》：“義渠，狄國，爲秦所滅”，不爲無據。

今案：此説亦難成立。

一則，“胡”固然主要用來指稱匈奴，但不是衹有匈奴纔能被稱爲“胡”，如西域諸族也被稱爲“胡”（見《漢書·元帝紀》）。不能因義渠被稱爲“胡”便指爲匈奴人。

二則，《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附“公孫賀傳”“正義”曰：“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也就是説所

謂公孫賀“義渠人”，其實是義渠道人。《漢書·地理志下》載“北地郡”有“義渠道”。

賀父渾邪，亦寫作“昆邪”。據《史記·孝景本紀》及《史記·李將軍列傳》等，景帝時，歷任典屬國、隴西太守；前元六年（前151年），以擊吳楚功封平曲侯。據服虔注，渾邪爲“中國人”。但從其名“渾邪”來看，有可能是昆吾人之裔，[17]質言之，應該是一個漢化了的昆吾人（《漢書·藝文志》有《公孫渾邪》十五篇），與義渠無直接關係。或因渾邪作爲昆吾之裔，原籍在西漢北地郡義渠道，其子賀於是也就成了“義渠（道）人”了。

既然義渠與匈奴有別，則義渠屬狄說也就失去了基礎。

六

義渠與允姓之戎同源。

1 “允姓”爲允格之後，[18]義渠 [ngiai-gia] 與“允姓”[jiuən-sieng]、“允格”[jiuən-keak] 得視爲同名異譯。

2. 允格爲少昊後。而據《路史·後紀四·炎帝紀下》注：“義渠、大荔、驪戎爲少昊後”；知兩者均祖少昊。

3. 允姓之居地在瓜州，亦卽涇水上游，今平涼至固原一帶；義渠之居地在涇水以北。兩者極爲接近。因此，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所謂義渠，其實是允姓之一支。

4. 義渠與烏氏均源自允姓，但後來發展成獨立的部落，故上

引《史記·匈奴列傳》並舉兩者。

5. 焉耆與允姓同源，故亦與義渠同源，“焉耆”[ian-tjiei] 以及焉耆國王治名“員渠”[hiuən-gia] 與“義渠”得爲同名異譯。但是，義渠與後來建國於西域的焉耆之間，畢竟由於分道揚鑣已久，習俗乃至體貌特徵方面必有很大區別，不能簡單類比。例如：《魏書·西域傳》和《周書·異域傳》皆載焉耆國人“死亡者皆焚而後葬”，這與前述義渠人火葬之俗應有區別，未必襲自後者。

■ 注釋

[1] 本節所述參見陳槃《不見於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59,臺北,1982 年（第三版）,pp. 143-151；以及王宗維“西戎八國考述”,西北大學西北歷史研究室編著《西北歷史研究》(1986 年號),三秦出版社，1987 年，pp. 1-55；esp. 22-36。

[2]《史記·秦本紀》：厲共公“三十三年（前 444 年），伐義渠，虜其王”。

[3]《史記·秦本紀》：躁公“十三年（前 430 年），義渠來伐，至渭南”。水南爲陰，“六國年表”“渭陽”當爲“渭陰”之誤。

[4]《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一年（前 327 年），縣義渠。……義渠君爲臣。……（後元）十年（前 315 年），伐取義渠二十五城”。今案：“十年”或爲“十一年”之奪誤。《史記·匈奴列傳》則載：“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梁玉繩《史記志疑》卷四，中華書局，1981 年，pp. 142-143，以爲“縣義渠”三字衍文。

[5]《戰國策·秦策二》所述略同："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

[6] 梁玉繩《史記志疑》卷四（出處見注 4）引《大事記》謂事當在周赧王四十四年（前 271 年）。一說秦滅義渠當在昭襄王三十六年（前 271 年），見郭忱殿"秦滅義渠及其地望考"，《西北史地》1996 年第 1 期，pp. 6-9。

[7] 此處所引兩條《括地志》均有校改，見賀次君《括地志輯校》（卷一寧州定安縣），中華書局，1980 年，p. 42。

[8]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卷八七："涇誤，當作經。李兆洛以爲在山西境。"

[9] 說見黃山《後漢書集解校補》（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卷八七附）。

[10] 參看馬長壽《氐與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pp. 95-96，以及注 1 所引王宗維文。

[11] 岑仲勉《兩周文史論叢》，商務印書館，1958 年，pp. 178-180，339。

[12] 參見孫詒讓《墨子閒詁》，中華書局，1986 年，pp. 171-172；楊伯峻《列子集釋》，中華書局，1985 年，pp.167-168。

[13] 參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pp. 37-40，210-215。

[14] 蒙文通《古族甄微》，巴蜀書社，1993 年，pp. 160-163；注 10 所引馬長壽書，pp. 96-97。

[15] 詳見注 1 所引王宗維文。

[16] 李白鳳“義渠考”,《東夷雜考》,齊魯書社,1981 年,pp. 190-192;注 1 所引王宗維文;以及楊銘“義渠族屬辨”,《陝西博物館館刊》第 4 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 年,pp. 153-156。

[17] 參看本書下卷第三篇。

[18] 參看本書上卷第三篇。

三　昆吾

一

《大戴禮記·帝繫》："顓頊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産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緺氏，産重黎及吳回。吳回氏産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産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由此可知昆吾爲陸終六子之一。[1]而據《山海經·大荒北經》：

> 黄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肉食。

其中"融吾"應即"祝融、昆吾"二名之合；[2]此處"祝融"或指陸終。蓋據《史記·楚世家》：

>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産焉。其長一曰昆吾。……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

可見陸終很可能繼吳回之後，復居火正，亦爲祝融；甚至“陸終”一名 [liuk-tjiuəm] 本身就是“祝融”[tjiuk-jiuəm] 之音轉。[3] 而上引《山海經·大荒北經》之文一本正作“黃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牡，是爲犬戎”；[4] 似可爲證。

昆吾，陸終之後；楚祖季連亦陸終後，於昆吾爲兄，故《左傳·昭十二年傳》載：楚靈王於昆吾有“皇祖伯父”之稱。

《國語·鄭語》：“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己姓昆吾、蘇、溫、顧、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韋注：“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爲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衛是也。”又注“昆吾、蘇、溫、顧、董”曰：“五國皆昆吾之後別封者。”由此可知，昆吾己姓。

《元和姓纂·二十三魂》（卷四）引《世本》：“昆吾，古己姓國。夏時侯伯祝融氏之後。”《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産焉。其長一曰昆吾……”“索隱”引宋忠注：“昆吾，國名，

己姓所出。”《史記·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有夏，昆吾。”“正義”：“昆吾，陸終之子。虞翻云：昆吾名樊，爲己姓，封昆吾。《世本》云：昆吾，衛者也。”於昆吾己姓說皆同。獨《漢書·古今人表》顏注：昆吾，“姒姓國也”。一說“姒姓無昆吾國，師古注姒字必己之譌”。[5] 今案：“己”與“巳”形似易訛，而“巳”[ziə]與“姒”[ziə] 音同，兩說之異或者緣此而生。

二

昆吾可以追溯的故地，一說在衛卽帝丘（濮陽），一說在許（舊許卽許昌）。

《左傳·哀十七年傳》：“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杜注：“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虛。今濮陽城中。”《史記·楚世家》“索隱”引《左傳》此文，曰：“今濮陽城中有昆吾臺。”“集解”則引《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正義”引《括地志》也說：“濮陽縣，古昆吾國也。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卽昆吾墟也。”又，《後漢書·郡國三·東郡》：“濮陽，古昆吾國”；注引杜預曰：“古衛也”；知昆吾氏曾居衛帝丘。

《左傳·昭十二年傳》：楚靈王稱其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杜注：“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由此可知昆吾氏曾居許。

一說昆吾氏先居衛，後遷許。《國語·鄭語》：“昆吾爲夏伯矣。”

韋注："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爲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爲夏伯，遷於舊許。《傳》曰：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本竹書紀年》載帝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又載帝廑四年"昆吾氏遷于許"，或本韋注。

一說衛帝丘本夏后相所居，相爲寒促子所滅，昆吾作伯，當在相滅之後。昆吾居衛，亦當在相滅之後。亦卽昆吾居許在前，居衛在後。[6]

今案：據《大戴禮記·帝繫》，昆吾之祖爲吳回；而據《史記·楚世家》，吳回之兄重黎爲高辛氏火正。既然昆吾之祖與高辛氏同時代，則"爲夏伯"之昆吾，應該不是陸終之長子樊，而很可能是樊之後某一代昆吾氏。因此，這樣一種可能性不能排除：居衛的是樊，而居許者乃爲夏伯之昆吾。（據《今本竹書紀年》，昆吾作伯始自帝仲康六年。）[7]這就是說，夏后相居帝丘之後，夏伯昆吾氏始遷於許。

另外，據《舊唐書·地理志一》："武德二年，置范州，治昆吾城。五年，州廢，縣屬濟州。"唐范縣在今山東范縣東南二十里，與濮陽之昆吾故城相去百三十餘里，昆吾盛時爲夏伯，其境界或東至范縣，故范縣亦有其遺址。[8]

三

《詩·商頌·長發》："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顧、昆吾，

鄭注："皆己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左傳·昭十八年傳》："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杜注："昆吾，夏伯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

若據《今本竹書紀年》，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克昆吾"；則似乎在滅亡前夕，昆吾曾向商湯發動進攻，以致招來滅頂之災。[9]

《史記·殷本紀》："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爲亂"或即《今本竹書紀年》所謂"伐商"。

一說昆吾亡時居安邑。

1.《尚書·湯誓》"正義"引皇甫謐云："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2.《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七·解州·安邑縣》(卷四六)："昆吾亭，《舊圖經》云：在縣西南一十里。……《宋永初山川記》曰：安邑有昆吾亭，古昆吾國也。"案：晉、宋時之安邑故城，在今山西夏縣北。

此說的基礎是桀都安邑：[10]《尚書·湯誓》："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又曰：鳴條之野"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正義"則曰："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卽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又曰："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此外，如《太平御覽》卷一九四引《帝王世紀》：

“桀敗於鳴條之野。案《孟子》舜卒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在安邑之西。”又如《史記·殷本紀》“正義”引《括地志》：“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今涑水與青龍河之間的丘陵地帶仍名鳴條崗。[11]

另說時昆吾居許。《今本竹書紀年》帝癸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商師征三朡，戰于郕，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或以爲鳴條在今陳留縣西北，與許之昆吾接壤，夏邑在舊許之西百數十里。蓋湯自陑西行，以征夏邑，昆吾與桀皆出師逆之，故戰於鳴條。[12]此說之基礎在於桀都河南。

今案：桀都安邑說既不可信，[13]似乎不存在夏亡時昆吾居安邑的可能性。

四

夏亡後，部份昆吾人經山西、陝西逐步遷徙。

1.《後漢書·郡國一·河東郡·安邑縣》劉注引《帝王世紀》：“縣西有鳴條陌。湯伐桀，戰昆吾亭。”如前所述，湯伐桀時昆吾國不在安邑西，安邑有昆吾亭，似乎是夏亡之後、西遷昆吾氏留下的蹤蹟。

2.《山海經·中山經》：“[陽山] 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

其上多赤銅”。按此昆吾山在陽山西二百里。《隋書·地理志中》河南郡：陸渾縣有“陽山”。隋陸渾縣故城在今河南嵩縣東北伏流城北三十餘里。知昆吾之山約在今山西夏縣。[14]

3.《文選》卷八載揚雄“羽獵賦序”：“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注引晉灼曰：“昆吾，地名，上有亭。”又，宋敏求《長安志》卷十六曰：“昆吾亭在［藍田］縣境。漢宣帝霍皇后葬亭之東。”由此可知陝西藍田縣亦有昆吾亭。

4.《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伊州》：“《禹貢》九州之外，古戎地，古稱昆吾。周穆王伐西戎，昆吾獻赤刀。後轉爲伊吾，周衰，戎狄雜居涇渭之北、伊吾之地”。所述頗多猜測之辭，有種種不確，但似乎均起因於伊吾一帶古稱“昆吾”。這不妨視作昆吾氏遷居陽關以西的證據。

5.《山海經·大荒西經》：“大荒之中，有龍山，日月所入。有三澤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也”。龍山既爲日月所入，當在西方荒遠之地。[15] 此雖傳說，亦反映昆吾西遷路途之遙。

6.《史記·匈奴列傳》所見匈奴部落有“渾庾”[kuən-jio]、“渾邪”[kuən-zya]者，或出自昆吾氏，蓋兩名均得視爲“昆吾”[kuən-nga]之同名異譯。這似乎說明昆吾有一支北遷。

7.此外，昆吾氏似有南遷者。《太平御覽》卷七九引《苻子》：“黃帝將適昆虞之丘。”《北堂書鈔》卷一六引作：“適昆吾之丘。”“昆吾之丘”亦見《淮南子·墬形篇》：“昆吾丘在南方；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立登保之山；暘谷、榑桑在東方。”暘谷、榑桑均在極東之地，故在南方之昆吾丘，亦極遠無疑。

又，《拾遺記》卷十稱：“至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之精。”此亦昆吾氏南遷之影響。

五

昆吾氏善冶。

1.《逸周書·大聚解》：“［武王］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孔注：“昆吾，古之利冶。”而據《墨子·耕柱》：“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採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由此可知昆吾氏曾掌陶冶。

2.《山海經·海內經》：“昆吾之丘。”郭注：“此山出名金也。《尸子》曰：昆吾之金。”又，《拾遺記》卷一〇：“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於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丹。鍊石爲銅，銅色青而利。”說亦相類。

今案：“昆吾之丘”固然可能是昆吾氏遷徙之遺蹟，但昆吾既爲古之利冶，出名金或名銅之處冠以“昆吾”之名也未嘗不可能。

3.《尸子·勸學篇》[16]：“夫學譬之猶礪也，昆吾之金而銖父之錫，使干越之工鑄之以爲劒，而弗加砥礪，則以刺不入，以擊不斷。”知名金或名銅亦被冠以“昆吾”之名。

4.《列子·湯問篇》：“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既然名金或名銅被冠以“昆吾”之名，利刃被稱爲“錕鋙（昆吾）之劍”

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5.《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河圖》：“流洲多積石，名昆吾石，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昭如水精。”[17]知錕鋙之劍乃鍊昆吾石而成。“昆吾石”之得名顯然亦與昆吾善冶有關。

6.《山海經·中山經》“昆吾之山”郭注：“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刃，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類似記載如《博物志》卷二引《周書》：“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火浣布汙則燒之，即潔，刀切玉如臈”。[18]由此可知切玉之利器亦附會以“昆吾”。[19]

7.《尸子·勸學篇》：“昆吾之金。”《玉篇·玉部》（卷一）引作“琨珸之金”。一說“琨珸”偏旁從王，與文王、武王全盂鼎作玟王、珷王者爲一例。[20]今案：其說未安。昆吾爲夏伯，稱王未見明確記載。《山海經·大荒南經》郭注：“昆吾，古王者號”；何所據而云然，不得而知。《史記·司馬相如傳》“琳瑉琨珸”；“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琨珸，山名也，出善金。”“索隱”引司馬彪曰：“石之次玉者。”知“琨珸”偏旁從玉，若非因爲“昆吾”被用來指稱出善金之玉石山，便是鍊昆吾石所成“昆吾之劍”切玉如切泥故。質言之，字當從玉，不從王。

昆吾氏又善陶。

1.《呂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後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鮌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21]

2.《說文》十篇下“壺部”：“壺，昆吾圜器也”。一說壺亦陶

器之一，始於昆吾。所謂“昆吾作陶”，卽製壺也。“昆吾”急讀合音爲“壺”。“壺”其實是以製器人之名爲器名。《爾雅·釋器》“康瓠謂之甈”，郭注：“瓠，壺也”，“康瓠”亦“昆吾”之轉。[22]

六

前引《大戴禮記·帝繫》稱：陸終氏娶鬼方氏之妹女隤氏，“三年，啓其左脅，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據研究，這種脅生傳說是印歐語系民族神話中的特有形態。例如，《魏略·西戎傳》：

> 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有］青毛，［爪］（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

又如：吳支謙譯《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

> 菩薩初下，化乘白象，冠日之精，因母晝寢而示夢焉。從右脇入，夫人夢寤。……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化從右脇生，墮地卽行七步。[23]

既然《帝繫》所載黃帝以下、陸終氏之前均無脅生者，此傳說乃源自陸終氏所娶鬼方氏無疑，鬼方氏既有印歐語族之嫌疑，則陸終之後昆吾氏亦存在同樣的嫌疑。[24]

■ 注釋

[1] 參看李學勤“談祝融八姓”，《李學勤集——追溯、考據、古文明》，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 年，pp. 74-81。

[2] 說本丁驌《夏商史研究》，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pp. 80-81。

[3] “陸”與“祝”韻部相同，聲母可轉（所謂來照準旁紐）；而青銅器邾公釛鍾銘文所見陸終之“終”與楚帛書所見祝融之“融”實爲同一個字。參見注 1 所引李學勤文；以及王國維“邾公鍾跋”，《觀堂集林》（卷一八），中華書局，1959 年，p. 894。

[4] 引自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一七，巴蜀書社，1985 年。

[5] 梁玉繩《人表考》，載吳樹平、王佚之、汪玉可點校《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中華書局，1982 年，p. 816。

[6] 參見陳奐《詩毛氏傳疏》卷三〇；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見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p. 210；以及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文物出版社，1985 年，pp. 116-117；鄒衡“夏文化分佈區域內有關夏人傳說的地望考”，《夏商周考古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年，pp. 219-251。

[7]《史記·殷本紀》“正義”稱昆吾爲“帝嚳時陸終之長子”，不確；與帝嚳

同時者爲陸終之父吳回。

[8] 參看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52，臺北，1988年再版，pp. 1337-1338。

[9] 徐文靖《竹書紀年統箋》(卷四) 疑伐商者非濮陽之昆吾,而是姒姓之昆吾,與桀同姓，故爲桀而伐。今案：此說未安。

[10]《尚書·湯誓》"正義"引皇甫謐："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似乎是說昆吾雖不在安邑,卻因趕赴桀難而遭滅亡。梁玉繩 (出處同注5) 則以爲:"昆吾國在衛,與桀異處而同日亡者,必爲卿士于夏朝,故安邑有昆吾亭。"

[1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山西夏縣禹王城調查",《考古》1963年第9期，pp. 474-479，esp. 474，圖一。

[12] 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卷一〇)，修綆堂書店，1937年，p. 64。鳴條在陳留平丘,說者稱據《太平御覽》卷八二引《淮南子·主術訓》許慎注。案: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宋本《太平御覽》(p. 387),"陳留"作"陳州",誤。

[13] 關於桀都地望，請參看雷學淇《介庵經說二·夏都考》、金鶚《求古錄禮說八·桀都安邑辨》、孫星衍《尚書今古文註疏·商書序疏》，以及注6所引鄒衡文等。

[14] 注8所引陳槃書，p. 1339。

[15] 岑仲勉"漢族一部份西來之初步考證",《兩周文史論叢》，上海商務，1958年，pp. 18-43，疑昆吾之所食在于闐附近。今案：其說無據。

[16] 汪繼培輯，浙江書局據湖海樓本校刻《二十二子》，光緒三年 (1877年)。

[17]《說郛》弓六十六引東方朔《海內十洲記》:"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

里。去東岸十九萬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冶其石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晶狀，割玉物如割泥。"見《說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p. 3075。《太平御覽》卷三四四引《十洲記》則作："流洲在西海中，上有山川，積石爲昆吾，冶其石成鐵。作劍，光明照如水精狀，割玉如泥。"

[18]《太平御覽》卷三四五引《博物志》作："《周書》云：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浣布汙，燒之則絜；切玉刀切玉如泥（一云切玉如蠟蜜）。"

[19]《三國志·魏書·華陀傳》裴注引曹植《辯道論》提及方士甘始之言："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抱樸子內篇·論仙》則稱："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閒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此論。"所述"割玉刀"或"切玉之刀"，或者也是"昆吾之劍"。

[20] 注8所引陳槃書，pp. 1332-1333。

[21]"昆吾作陶"亦見《世本》(《史記·龜策列傳》"集解"引）以及《太平御覽》卷八三三引《尸子》。

[22] 王獻唐《炎黃氏族文化考》，齊魯書社，1985年，pp. 94，201。

[23]《大正新脩大藏經》T3，No. 185，p. 473。

[24] 參看本書上卷第四篇。

徵引文獻

漢語文獻（1）

《抱朴子內篇校釋》（增訂本），（晉）葛洪撰，王明校釋，中華書局，1985年。

《北堂書鈔》，（隋）虞世南撰，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年。

《博物志》，（西晉）張華撰，范寧校證，中華書局，1980年。

《冊府元龜》，（宋）王欽若等編，中華書局影印，1982年。

《長安志》，（宋）宋敏求著，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587冊）。

《楚辭章句》，（東漢）王逸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062冊）。

《春秋大事表》，（清）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中華書局，1993年。

《春秋地理考實》，（清）江永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181冊）。

《春秋地名考略》，（清）高士奇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176冊）。

《春秋公羊傳》，《十三經註疏》本，中華書局影印，1991年。

《春秋穀梁傳》，《十三經註疏》本，中華書局影印，1991年。

《春秋釋例》，（晉）杜預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146冊）。

《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註疏》本，中華書局影印，1991年。

《春秋左傳注》，楊伯峻注，中華書局，1990年。

《大戴禮記解詁》，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中華書局，1983 年。

《東觀漢記校注》，（東漢）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

《讀書雜志》，（清）王念孫著，中華書局，1991 年。

《爾雅》，《十三經註疏》本，中華書局影印，1991 年。

《爾雅校箋》，周祖謨校箋，江蘇教育出版社，1984 年。

《爾雅義疏》，（清）郝懿行撰，中國書店，1982 年。

《風俗通義》，（東漢）應劭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62 冊）。

《風俗通義校注》，（東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中華書局，1981 年。

《古本竹書紀年輯證》，方詩銘、王修齡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管城碩記》，（清）徐文靖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61 冊）。

《管子校釋》，顏昌嶢著，邊仲仁、夏劍欽點校，嶽麓書社，1996 年。

《國語》，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國語發正》，（清）汪遠孫撰，皇清續經解，南菁書院本。

《過庭錄》，（清）宋翔鳳撰，皇清續經解，南菁書院本。

《韓非子集釋》（增訂本），陳奇猷校注，中華書局，1962 年。

《漢書》，（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中華書局，1975 年。

《鶡冠子》，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48 冊）。

《後漢書》，（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中華書局，1973 年。

《後漢書集解》，（清）王先謙撰，中華書局影印，1984 年。

《華陽國志校補圖注》，（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淮南子校釋》，張雙棣校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

《黃氏日鈔》，（宋）黃震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707-708 冊）。

《集韻》，（宋）丁度等修定，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36 冊）。

《介庵經說》，（清）雷學淇撰，叢書集成初編本。

《晉書》，（唐）房玄齡等撰，中華書局，1982年。

《經典釋文》，（唐）陸德明撰，中華書局影印，1983年。

《經史問答》，（清）全祖望撰，皇清經解，道光本。

《舊唐書》，（後晉）劉昫等撰，中華書局，1975年。

《鉅宋廣韻》，（宋）陳彭年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3年。

《括地志輯校》，（唐）李泰等著，賀次君輯校，中華書局，1980年。

《禮記》，《十三經註疏》本，中華書局影印，1991年。

《歷代名畫記》，（唐）張彥遠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812冊）。

《列子集釋》，楊伯峻撰，中華書局，1985年。

《路史》，（宋）羅泌撰，羅苹注，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383冊）。

《論衡校釋》，（東漢）王充撰，黃暉校釋，中華書局，1990年。

《呂氏春秋校釋》，陳奇猷校釋，學林出版社，1984年。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吳）陸璣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70冊）。

《毛詩傳箋通釋》，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中華書局，1992年。

《毛詩正義》，《十三經註疏》本，中華書局影印，1991年。

《孟子正義》，焦循撰，沈文倬點校本，中華書局，1991年。

《墨子閒詁》，（清）孫詒讓著，孫以楷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

《穆天子傳彙校集釋》，王貽梁、陳建敏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穆天子傳通解》，鄭傑文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2年。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顧實著，中國書店，1990年。

《穆天子傳注補正》，（清）陳逢衡撰，江都陳氏叢書本，清道光二十三年。

《潛夫論箋校正》，（東漢）王符著，（清）汪繼培箋，彭鐸校正，中華書局，1985年。

《潛研堂文集》，（清）錢大昕撰，皇清經解，道光九年本。

《青學齋集》，（清）汪之昌撰，新陽汪氏青學齋本，1931 年。

《求古錄禮說》，（清）金鶚撰，皇清續經解，南菁書院本。

《羣經平議》，（清）俞樾撰，皇清續經解，南菁書院本。

《羣經釋地》，（清）呂調陽撰，《觀象廬叢書》，咸豐八年刊本。

《人表考》，（清）梁玉繩撰，《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吳樹平、王佚之、汪玉可點校，中華書局，1982 年，pp. 465-943。

《日知錄》，（清）顧炎武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58 冊）。

《三國志》，（晉）陳壽撰，中華書局，1975 年。

《山海經廣注》，（清）吳任臣注，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1042 冊）。

《山海經箋疏》，（清）郝懿行著，巴蜀書社，1985 年。

《山海經校注》，袁珂校注，巴蜀書社，1993 年。

《商君書錐指》，蔣禮鴻撰，中華書局，1986 年。

《尚書古文疏證》，（清）閻若璩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66 冊）。

《尚書今古文註疏》，（清）孫星衍撰，皇清經解本，1829 年。

《尚書正義》，《十三經註疏》本，中華書局影印，1991 年。

《尸子》，汪繼培輯，浙江書局據湖海樓本校刻《二十二子》本，1877 年。

《詩經》，《十三經註疏》本，中華書局影印，1991 年。

《詩毛氏傳疏》，（清）陳奐撰，皇清續經解本，南菁書院。

《詩譜·唐譜》，（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六之一，（清）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影印，1982 年。

《十洲記》，（漢）東方朔，《說郛》卷六十六。

《拾遺記》，（晉）王嘉撰，（梁）蕭綺錄，齊治平校注，中華書局，1981 年。

《史記》，（漢）司馬遷撰，中華書局，1975 年。

《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日] 瀧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史記志疑》，（清）梁玉繩撰，賀次君點校，中華書局，1981 年。

《世本》，（清）雷學淇校輯，叢書集成初編本。

《世本》，（清）張澍稡集補注，叢書集成初編本。

《釋名疏證補》，（清）王先謙撰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

《水經注》，（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水經註疏》，（後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年。

《說郛三種》，（明）陶宗儀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說文解字義證》，（清）桂馥撰，齊魯書社，1987 年。

《說文解字注》，（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

《說苑校證》，（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中華書局，1987 年。

《宋書》，（梁）沈約撰，中華書局，1983 年。

《隋書》，（唐）魏徵、令狐德棻撰，中華書局，1982 年。

《太平廣記》，（宋）李昉等編，汪紹楹點校，中華書局，1986 年。

《太平寰宇記》，（宋）樂史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489-470 冊）。

《太平御覽》，（宋）李昉等撰，中華書局影印，1985 年。

《唐朝名畫錄》，（唐）朱景玄撰，于安瀾編《畫品叢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 年，pp. 63-88。

《通雅》，（明）方以智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57 冊）。

《通志》，（宋）鄭樵撰，中華書局影印，1987 年。

《王會篇箋釋》，（清）何秋濤箋釋，江蘇書局校刊本，1891 年。

《魏書》，（北齊）魏收撰，中華書局，1984 年。

《文選》，（梁）蕭統編，（唐）李善注，中華書局影印，1983 年。

《吳越春秋輯校彙考》，周生春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新書》，（漢）賈誼撰，吳雲、李春臺《賈誼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

《新唐書》，（宋）歐陽修、宋祁撰，中華書局，1975 年。

《新序》，（漢）劉向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696 冊）。

《姓氏辨誤》，（清）張澍撰，棗華書屋藏版。

《姓觿》，（明）陳士元撰，叢書集成初編本。

《荀子集解》，（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1992 年。

《逸周書彙校集注》，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李學勤審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藝文類聚》，（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禹貢說斷》，（宋）傅寅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57 冊）。

《禹貢錐指》，鄒逸麟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玉海》，（宋）王應麟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943 冊）。

《玉篇》，（梁）顧野王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24 冊）。

《元和郡縣圖志》，（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中華書局，1983 年。

《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中華書局，1994 年。

《劄迻》，（清）孫詒讓撰，光緒二十年，1894 年刊本。

《戰國策集注彙考》，諸祖耿撰，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年。

《周禮》，《十三經註疏》本，中華書局影印，1991 年。

《周書》，（唐）令狐德棻等撰，中華書局，1983 年。

《周易集解纂疏》,(清)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中華書局,1994年。

《竹書紀年統箋》,(清)徐文靖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303冊)。

《竹書紀年義證》,(清)雷學淇撰,北京修綆堂書店,1937年。

《莊子集釋》,(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中華書局,1985年。

《左氏會箋》,[日]竹添光鴻撰,井井書屋印行,1903年。

漢語文獻(2)

《合集》= 郭沫若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甲骨文合集》,中華書局,1982年。

《懷》= Hsü Chin-hsiung 許進雄. *Oracle Bones from the White and other Collections* 懷特等收藏甲骨文集.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Toronto, Canada 1979.

《屯南》=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小屯南地甲骨》上冊,中華書局,1980年。

《乙》=董作賓主編《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乙編》(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1948年。

《英藏》=李學勤、齊文心、艾蘭編《英國所藏甲骨集》,中華書局,1985年。

漢語文獻(3)

《大唐西域記校注》,(唐)玄奘、辯機著,季羨林等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

《大正新脩大藏經》,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小野玄妙等編纂,大藏出版株

式會社，1924 年—1934 年。

《大智度論》，（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正新脩大藏經》T25，No. 1509。

《高僧傳》，（梁）慧皎撰，湯用彤校注，中華書局，1992 年。

《廣弘明集》，（唐）道宣編纂，《大正新脩大藏經》T52，No. 2103。

《太子瑞應本起經》，（吳）支謙譯，《大正新脩大藏經》T3，No. 185。

《悟空入竺記》（《遊方記抄》二），（唐）圓照撰，《大正新脩大藏經》T51，No. 2089。

《修行本起經》，[後漢] 竺大力、康孟祥譯，《大正新脩大藏經》T3，No. 184。

漢語文獻（4）

岑仲勉“漢族一部份西來之初步考證”，《兩周文史論叢》，上海商務，1958 年，pp. 18-43。

岑仲勉“上古東遷的伊蘭族——渠搜與北發”，《兩周文史論叢》，上海商務，1958 年，pp. 44-54。

岑仲勉“《穆天子傳》西征地理概測”，《中外史地考證》，中華書局，1962 年，pp. 1-41。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 年。

陳槃《不見於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59，臺北，1982 年（再版）。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52，臺北，1988 年（第三版）。

陳全方、尚志儒“陝西方國考”，殷墟博物苑、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編《殷墟博物苑苑刊》創刊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pp. 88-97。

丁山“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1（1935年），pp. 87-12。

丁山《商周史料考證》，中華書局，1988年。

丁驌《夏商史研究》，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

董作賓《殷曆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5年。

耿世民“古代維吾爾語佛教原始劇本‘彌勒會見記’（哈密寫本）研究”，《新疆文史論集》，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1年，pp. 170-194。

耿世民“哈密本回鶻文‘十業道譬喻鬘’初探”，《維吾爾古代文獻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年，pp. 300-311。

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段連勤“犬戎歷史始末述——論犬戎的族源、遷徙及同西周王朝的關係”，《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pp. 82-89。

段渝“古代巴蜀與南亞和近東的經濟文化交流”，《社會科學研究》1993年第3期，pp. 48-55, 73。

高夷吾“讀《穆天子傳》隨筆”，《古學叢刊》第3期（1937年），pp. 1-17。

龔維英“上古時代戰勝者襲用戰敗者稱號的初步考察”，《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5年第3期，pp. 122-124。

顧頡剛“九州之戎與戎禹”，《古史辨》第7冊（下），開明書店，1941年，pp. 117-138。

顧頡剛《史林雜識》，中華書局，1963年。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第一二節）”，《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

三冊，中華書局，1996年，pp. 346-355。

顧實《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中國書店，1990年。

郭忱殿“秦滅義渠及其地望考”，《西北史地》1996年第1期，pp. 6-9。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科學出版社，1958年。

郭沫若“夏禹的問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pp. 302-309。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侯紹莊“‘鬼方’討論述評”，《貴州文史叢刊》1984年第4期，pp. 12-17。

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第1冊第1篇，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1944年。

胡厚宣“殷代𢀛方考”，《甲骨文商史論叢初集》第2冊第1篇，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專刊之一，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出版，1944年。

胡厚宣“甲骨文土方爲夏民族考”，日知主編《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pp. 340-353。

黃盛璋“敦煌寫本《西天路竟》歷史地理研究”，《歷史地理》創刊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pp. 10-20。

黃盛璋“回鶻譯本《玄奘傳》殘卷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與對音研究”，《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pp. 9-32。

黃盛璋“試論所謂‘吐火羅語’及其有關的歷史地理和民族問題”，《西域史論叢》第2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pp. 228-268。

黃文弼“中國古代大夏位置考”，《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pp. 76-80。

黃文弼“重論古代大夏之位置與移徙”，《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pp. 81-84。

李白鳳“義渠考”，《東夷雜考》，齊魯書社，1981 年，pp. 190-192。

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科學出版社，1959 年。

李學勤“論史牆盤及其意義”，《考古學報》1978 年第 2 期，pp. 149-157。

李學勤“秦國文物的新認識”，《文物》1980 年第 9 期，pp. 25-31。

李學勤“論多友鼎之時代及意義”，《人文雜誌》1986 年第 6 期，pp. 87-92。

李學勤“談祝融八姓”，《李學勤集——追溯·考據·古文明》，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 年，pp. 74-81。

李學勤“小盂鼎與西周制度”，《李學勤集——追溯·考據·古文明》，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 年，pp. 165-179。

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長春出版社，1992 年。

李學勤“三星堆與蜀古史傳說”，《走出疑古時代》，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 年，pp. 204-214。

李學勤“《帝繫》傳說與蜀文化”，《走出疑古時代》，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 年，pp. 214-223。

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李毅夫“鬼方𢀛方考”，《齊魯學刊》1985 年第 4 期，pp. 12-15，47。

李仲操“也釋多友鼎銘文”，《人文雜誌》1982 年第 9 期，pp. 95-99。

林梅村“祁連與昆侖”，《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 年，pp. 64-69。

劉桓“甲骨、金文中所見犬戎與玁狁”，《殷都學刊》1994 年第 2 期，pp. 1-4。

劉起釪“我國古史傳說時期綜考”，《古史續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pp. 1-73。

劉起釪“由夏族原居地縱論夏文化始於晉南”,《古史續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pp. 132-166。

劉雨“金文𦍒京考”,《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3期，pp. 69-75。

劉運興“武丁伐鬼方進軍路線及其他”,《殷都學刊》1987年第2期，pp. 22-27。

盧連成、羅英傑“陝西武功縣出土楚𣪘諸器”,《考古》1981年第2期，pp. 128-133。

呂智榮“陝西清澗李家崖古城陶文考釋”,《文博》1987年第3期，pp. 85-86。

羅琨“‘高宗伐鬼方’史蹟考辨”，胡厚宣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pp. 83-127。

馬雍“新疆佉盧文書中之 kośava 即氍毹考——兼論‘渠搜’古地名”,《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pp. 112-115。

馬雍、王炳華“公元前七至二世紀的中國新疆地區”,《中亞學刊》第3輯，中華書局，1990年，pp. 1-16。

馬長壽《氐與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蒙文通《古族甄微》，巴蜀書社，1993年。

錢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學報》第10期（1931年），pp. 1955-2008。

錢穆“古三苗疆域考”,《古史地理論叢》，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2年，pp. 72-95。

錢穆“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3冊，中華書局，1996年，pp. 465-478。

裘錫圭“說㦰簋的兩個地名——棫林和胡”,《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pp. 386-391。

屈萬里《殷虛文字甲編考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1年。

饒宗頤"上古塞種史若干問題——《于闐史叢考》序",《中國文化》第8期（1993年），pp. 165-170。

饒宗頤"中國古代'脇生'的傳說",《燕京學報》新第3期（1997年），北京大學出版社，pp. 15-28。

沈長雲"玁狁、鬼方、姜氏之戎不同族別考",《人文雜誌》1983年第3期，pp. 75-81。

石樓縣文化館"山西石樓義牒發現商代青銅器",《考古》1972年第4期，pp. 29-30。

唐蘭"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綜論寶雞市近年發現的一批青銅器的重要歷史價值",《文物》1976年第6期，pp. 31-39。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中華書局，1986年。

童書業"帝堯陶唐氏名號溯源",《古史辨》第7冊（下），開明書店，1941年，pp. 1-30。

童書業"晉公𥂴銘'□宅京𠂤'解——春秋晉都辨疑",《中國古代地理考證論文集》，中華書局，1962年，pp. 77-83。

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王力《同源字典》，商務印書館，1982年。

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pp. 188-290。

王國維"鬼方昆夷玁狁考",《觀堂集林》（卷一三），中華書局，1959年，pp. 583-606。

王國維"西胡考",《觀堂集林》（卷一三），中華書局，1959年，pp. 606-616。

王國維“邾公鍾跋”,《觀堂集林》(卷一八),中華書局,1959年,p. 894。

王國維“月氏未西徙大夏時故地考”,《觀堂集林》(別集一),中華書局,1959年,pp. 1156-1158。

王靜如“吐火羅及吐火羅語”,《王靜如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8年,pp. 89-152。

王靜如“重論ārśi, ārgi與焉夷,焉耆”,《王靜如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8年,pp. 153-162。

王克林“一目國鬼方新探”,《文博》1998年第1期,pp. 30-38,66。

王獻唐《炎黃氏族文化考》,齊魯書社,1985年。

王燕玉“殷周鬼方辨”,《貴州史專題考》,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pp. 1-21。

王玉哲“鬼方考補正”,《考古》1986年第10期,pp. 926-929,890。

王仲犖《敦煌石室內地志殘卷考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王宗維“西戎八國考述”,西北大學西北歷史研究室編著《西北歷史研究》(1986年號),三秦出版社,1987年,pp. 1-55。

徐文堪“揭開吐火羅人起源之謎”,《吐火羅起源研究》,昆侖出版社,2005年,pp. 49-103。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河南省考古學會、河南省博物館編《夏文化論文選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pp. 133-150。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

徐朝龍“中國古代‘神樹傳說’的源流”,西江清高編《扶桑與若木——日本學者對三星堆文明的新認識》,巴蜀書社,2002年,pp. 205-228。

徐中舒、鄭德坤、馮家昇“月氏爲虞後及氏和氐的問題”,《燕京學報》第13期(1933年),pp. 209-238。

徐中舒“殷周之際史蹟之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 ~ 2(1936年), pp. 137-164。

徐中舒“夏史初曙”,《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3期, pp. 12-15。

徐中舒“再論小屯與仰韶”,河南省考古學會、河南省博物館編《夏文化論文選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年, pp. 1-34。

薛方昱“玁狁考辨”,《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pp. 136-145。

楊寬“說虞”,《禹貢半月刊》第7卷第6—7合期(1937年), pp. 39-49。

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第九篇,《古史辨》第7冊(上),開明書店, 1941年, pp. 269-277。

楊銘“義渠族屬辨”,《陝西博物館館刊》第4輯,西北大學出版社, 1997年, pp. 153-156。

楊紹舜“山西石樓諸家裕、曹家垣發現商代銅器”,《文物》1981年第8期, pp. 49-53。

楊升南“卜辭中所見諸侯對商王室的臣屬關係”,胡厚宣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pp. 128-172。

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卷下,科學出版社, 1954年.

楊樹達“杜伯鬲跋”,《積微居金文說》,科學出版社, 1959年, pp. 142-143。

楊希枚“論先秦姓族和氏族”,《先秦文化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年, pp. 197-210。

楊向奎“應當給有虞氏一個應有的歷史地位”,《文史哲》1956年第7期, pp. 47-49。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 1979年。

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 1986年。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

余太山“匈奴、Huns 同族論質疑”，《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pp. 242-271。

余太山“貴霜的族名、族源和族屬”，《文史》第 38 輯（1994 年），pp. 18-28。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余太山“樓蘭、鄯善、精絕等的名義——兼說玄奘自于闐東歸路線”，《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 年，pp. 477-485。

余太山“托勒密《地理志》所見絲綢之路的記載”，《早期丝绸之路文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pp. 145–164。

張映文、呂智榮“陝西清澗縣李家崖古城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8 年第 1 期，pp. 47-56。

張永山 “殷契小臣辨正”，胡厚宣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pp. 60-82。

趙和平《〈說文〉小篆研究》，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

趙林《商代的羌人與匈奴》，臺北：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5 年。

趙鐵寒“春秋時期戎狄的地理分佈及其源流（上）”，《大陸雜誌》11 ~ 2（1955 年），pp. 38-45。

鄭傑祥《商代地理概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山西夏縣禹王城調查”，《考古》1963 年第 9 期，pp. 474-479。

鍾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

周連寬“漢婼羌國考”，《中亞學刊》第 1 輯，中華書局，1983 年，pp. 81-90。

周及徐《漢語印歐語詞彙比較》，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年。

周建奇“鬼方、丁零、敕勒（鐵勒）考釋”,《內蒙古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pp. 31-41。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劄記》，中華書局，1985年。

朱歧祥“殷武丁時期方國研究——鬼方考”，《許昌師專學報》1988年第3期，pp. 72-77。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鄒衡“夏文化分佈區域內有關夏人傳說的地望考”，《夏商周考古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pp. 219-251。

鄒衡“關於夏商周時期北方地區諸鄰境文化的初步探討”，《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pp. 253-293。

漢語文獻（5）

[法] 伯希和“吐火羅語與庫車語”，馮承鈞譯，[法] 伯希和、烈維著《吐火羅語考》，中華書局，1957年，pp. 64-135。

日語文獻

羽田亨“吐魯番出土回鶻文摩尼教徒祈願文の斷簡”,《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言

語宗教篇》，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8年，pp. 325-347。

桑原隲藏“張騫の遠征”,《東西交通史論叢》,東京：弘文堂,1944年,pp. 1-117。

小川琢治“周穆王の西征”，《支那歷史地理研究續集》，東京：弘文堂，1939年，pp. 165-408。

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汲古書院，1975年。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第6卷），東京：岩波，1970年，pp. 97-227。

西方文獻

Adams, D. Q. “The Position of Tocharian among the Other Indo-European Languag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3 (1984): pp. 395-402.

Bailey, H. W. “Ttaugar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8 (1937): pp. 883-921.

Barthold, W.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London: E. J. W. Gibb Memorial Trust, Porcupine Press Inc., 1977.

Beal, S. *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of Hiuen Tsiang (A. D. 629).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94.

Boodberg, P. “Two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rdies* 1 (1936): pp. 283-307.

Burrow, T. “Tokharian Elements in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5, pp. 667-675.

Charpantier, J. "Die ethnographische Stellung der Tocharer."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71 (1917): pp. 347-388.

Enoki, K. "The Yüeh-shih-Scythians Identity, A Hypothesi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istor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acts, Collection of Papers Presented*, compiled by the Japanes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 1957. Tokyo, 1959: pp. 227-232.

Gabain, A. von with W. Winter.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X. Ab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Klasse für Sprachen, Literatur und Kunst.* 1956, Nr. 2. Berlin, 1958.

Grene, D., tr. Herodotus, *The History*.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Gutschmid, A. von. *Geschichte Irans und seiner Nachbarländer: von Alexander dem Grossen bis zum Untergang des Arsaiden*. Tübingen, 1888.

Hansen, O. "Zur soghdischen Inschrift auf dem dreisprachigen Denkmal von Karabalgasun."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44 (1930): pp. 3-39.

Henning, W. B.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9 (1938): pp. 545-571.

Henning, W. B. "The Bactrian Inscrip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23 (1960): pp. 47-55.

Henning, W. B.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 In G. Ulmen, ed. *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The Hague, Paris, New York, 1978: pp. 215-230.

Jones, H. L., tr.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8 vols. London, 1916-1936.

Kent, R. G. *Old Persian, Grammar, Text, Lexicon*. New Haven, 1953.

Kingsmill, T. W. "The Intercourse of China with Eastern Turkestan and the Adjacent Countries in the Second Century B. C."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82, pp. 74-104.

Le Coq, A. von, "Türkische Maniehaica aus Chotscho I." *Phil.-hist. Khasse. 1911. Anhang. Abh.* VI. Vorgelegt von Hrn. Müller in der Sitzung der phil.-hist. Klasse am 19. Oktober 1911, Zum Druck verordnet am gleichen Tage, ausgegeben am 25, April 1912: pp. 393-451.

Leumann, E. "Über eine von den unbekannten Literaturspachen Mittelasiens." *Mémoire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t.-Pétersbourg* VIII[e] série, IV~8 (1900): pp. 1-28.

Marquart, J. *Ērānšahr nach der Geographie des Ps. Moses Xorenaci*. Berlin, 1901.

Müller, C., ed. "Dionysius' Periegesis, 'Scythica et Caucasica'." In *Geographi Graeci Minores* II. Paris, 1882.

Müller, F. W. K. "Handschriften-Reste in Estrangelo-Schrift aus Turfan, Chinesisch-Turkestan I."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asse*. Berlin, 1904, pp. 348-352.

Müller, F. W. K. "Beitrag zur genaueren Bestimmung der unbekannten Sprachen Mittelasiens."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asse*. Berlin, 1907, pp. 958-960.

Müller, F. W. K. "Toχrï und Kuišan (Küšä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asse. Berlin, 1918, pp. 566-586.

Müller, F. W. K. und A. von Gabain. "Uigurica IV."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asse*. Berlin, 1931, pp. 675-727.

Namäti, Kâlmân. "The Historic-geographical Proofs of the Hiung-nu = Hun Identity." *Asiatic Quarterly*, 3rd. Ser. 29 (1910): pp. 325-369.

Narain, A. K. *The Indo-Greeks*. Oxford, 1957.

Pelliot, P. "Tokharien et Koutchéen." *Journal Asiatique* 1 (1934): pp. 23-106.

Pulleyblank, E. G.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I-II." *Asia Major* 9 (1962): pp. 58-144, 206-265.

Pulleyblank, E. G.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Vowel Systems of Old Chinese and Written Burmese." *Asia Major* 10 (1963): pp. 200-221.

Pulleyblank, E. G.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6, pp. 9-39.

Pulleyblank, E. G. "The Wu-sun and Sakas and the Yüeh-chih Migra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3 (1970): pp. 154-160.

Pulleyblank, E. G. "Why Tocharians?" *The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23 (1995): pp. 415-430.

Rackham, H., tr. Pliny, *Natural History*,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London, 1949.

Richthofen, F. F. vo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vol. 1. Berlin, 1877.

Samolin, W. "Ethnographic Aspects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Tarim Bas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 (1958): pp. 45-67.

Sarasvati, S. S. P. and S. Vidyalanrar. tr. *Ṛgveda Samhita*. New Delhi: Veda

Pratishthana, 1977.

Sieg, E. und W. Siegling. "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Indoskythe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asse*. Berlin, 1908, pp. 915-932.

Sieg, E. "Ein einheimischer Name für Toχrï."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asse*. Berlin, 1918, pp. 560-565.

Stevenson, E. L., tr. & ed. *Geography of Claudius Ptolemy*. New York, 1932.

Tarn, W. W. *The Greek in Bactria and India*. London: Cambridge, 1951.

Thomas, F. W. "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1, pp. 807-836.

八　俄語文獻

Гамкрелидзе, Т. В. & Вяч. Вс. Иванов. "Первые индоевропейцы в истории: предки тохар в древней Азии." *Вестник древрней истории* (1989/1): pp. 14-39.

Иванов, Вяч. Вс. "К Определению Названия «Тохарского В» Языка."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1959, 5: pp. 188-190.

Тугушева, Л. Ю. *Фрагменты Уйгурской версии Биографии Сюань-изана*. Москва, 1980.

索引

【說明】本索引收入正文中主要人名、地名、族名和物名等。條目按漢語拼音順序排列。條目後數字爲本書頁碼。

後記

我在研究塞種史的過程中，有三個問題一直縈繞腦際：有虞氏是否月氏前身、西域之大夏與中原之大夏有無淵源、允姓與塞種的關係如何。顯然，對於研究塞種史來說，這些問題都是不應迴避的。

月氏前身爲有虞氏、西域之大夏與中原之大夏同族，早已有由徐仲舒先生提出，允姓卽塞種更是史有明文。但長期以來，無論信者疑者，對此均未作進一步的闡發或批判。在中亞古代史研究有了長足進步的今天，似乎已有可能對這些觀點和資料作一番較爲深入的檢討。

此外，對於我的塞種史研究來說，有一個重要環節一直未能妥然解決，這就是引發希羅多德所述前七世紀末歐亞草原民族遷徙運動的 Arimaspi（獨目人）之比定。在此也嘗試著提出自己最近的一些思考。

因此，本書可以說是我的《塞種史研究》一書的續篇。

對於先秦史的無知，是我一再推遲本課題研究的原因。而本

書終於得以完成，與宋鎮豪先生的悉心指導，以及常玉芝、陳爽、陳健文、丁一川、胡振宇、李解民、羅琨、彭邦炯、沈培、王邦維、王震中、楊升南、虞萬里、張永山諸先生的多方面的援手是分不開的。

應該指出的是，我曾試圖在上述有關塞種前史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一個關於古代中國歐羅巴種人的假說：既然塞種諸部有歐羅巴種之嫌疑，其淵源又可以東向追溯，其意義自不待言。畏友徐文堪先生的中肯批評，使我認識到這不是單純的歷史文獻學研究所能完成的任務，從而決定擱置這一打算，並修改了各章的相關文字。

對於諸位先生的指點、幫助和批評，謹在此鳴謝。

本書的出版，得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梅維恒教授（Prof. Victor H. Mair）的資助，此志。

余太山

1999年4月12日

再版後記

十多年前，我寫《古族新考》（中華書局，2000 年），雖然說的是 Sakā，其實是在追尋 Tochari 的源流。祇是因爲 Tochari 問題太複雜，當時未敢直接亮出有關的看法。終於在去年底草成“吐火羅問題”一文，乘再版之機，合并發表。

《古族新考》出版後，不少學者以爲我和 A. K. Narain (On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The Tokharian-Yuezhi and their Chinese Homeland, *Papers on Inner Asia*, No. 2, Bloomington, Indiana, 1987) 一樣，主張印歐人起源於中國。其實不然，我從未說過中國是印歐人或吐火羅人的故鄉。

我欣賞 W. B. Henning 的假說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 G. Ulmen (ed.) *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The Hague, Paris, New York, 1978, 215-230)，認爲自己的假說和他的假說不僅不矛盾，而且可以銜接起來，構成一個更完整的假說。

原作的觀點、思路及其表達方式再版時維持不變，僅依據文獻整理的新成果對引文作了若干校正。

余太山

2010 年 7 月 10 日

余太山主要出版物目錄

一、專著

1 《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9月.

2 《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2月。

3 《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6月。

4 《古族新考》，中華書局，2000年6月。

5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11月。

6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中華書局，2005年3月。

7 《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

二、論文

1 《魏書·嚈噠傳》考釋，《文史》第20輯（1983年），pp. 258-263。

2 《魏書·粟特國傳》辨考，《文史》第21輯（1983年），pp. 57-70。

3 嚈噠史研究中的若干問題，《中亞學刊》第 1 輯（1983 年），中華書局，pp. 91-115。

4 《魏書·小月氏、大月氏傳史實辨考》，《學習與思考（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生院學報）》1984 年第 3 期，pp. 64-69。

5 關於頭羅曼和摩醯邏矩羅，《南亞研究》1984 年第 3 期，pp. 9-15。

6 嚈噠史二題，《中華文史論叢》1985 年第 2 期，pp. 189-204。

7 關於嚈噠的覆亡，《西北史地》1985 年第 4 期，pp. 38-43。

8 柔然與西域關係述考，《新疆社會科學》1985 年第 4 期，pp. 67-77，80-81。

9 柔然、阿瓦爾同族論質疑——兼說阿瓦爾即悅般，《文史》第 24 輯（1985 年），pp. 97-113。

10 條支、黎軒、大秦和有關的西域地理，《中國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pp. 57-74。

11 關於董琬、高明西使的若干問題，《文史》第 27 輯（1986 年），pp. 31-46。

12 馬雍《西域史地文物叢考》編後，《新疆社會科學》1986 年第 4 期，pp. 124-126。

13 嚈噠的族名、族源和族屬，《文史》第 28 輯（1987 年），pp. 109-125。

14 《太伯里史》所載嚈噠史料箋證（宋峴漢譯），《中亞學刊》第 2 輯（1987 年），中華書局，pp. 51-64。

15 烏孫考，《西北史地》1988 年第 1 期，pp. 30-37。

16 奄蔡、阿蘭考，《西北民族研究》1988 年第 1 期，pp. 102-110，114。

17 《漢書·西域傳》所見塞種，《新疆社會科學》1989 年第 1 期，pp. 67-78。

18 匈奴、鮮卑與西域關係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89 年第 1 期，pp. 153-171。

19 大夏和大月氏綜考，《中亞學刊》第 3 輯（1990 年），中華書局，pp. 17-46。

20 匈奴、Huns 同族論質疑，《文史》第 33 輯（1990 年），pp. 57-73。

21 Who were Toramana and Mihirakula? *Asia-Pacific Studies* 1990, pp. 95-108.

22 塞種考，《西域研究》1991 年第 1 期，pp. 19-33。

23 大宛和康居綜考，《西北民族研究》1991 年第 1 期，pp. 17-45。

24 關於鄯善都城的位置，《西北史地》1991 年第 2 期，pp. 9-16。

25 安息與烏弋山離考，《敦煌學輯刊》1991 年第 2 期，pp. 82-90。

26 罽賓考，《西域研究》1992 年第 1 期，pp. 46-61。

27 關於 Huns 族源的臆測，《文史》第 34 期（1992 年），pp. 286-288。

28 張騫西使新考，《西域研究》1993 年第 1 期，pp. 40-46。

29 東漢與西域關係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3 年第 2 期，pp. 19-39。

30 西漢與西域關係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4 年第 1 期，pp. 9-24；第 2 期，pp. 125-150。

31 兩漢西域戊己校尉考，《史林》1994 年第 1 期，pp. 8-11，7。

32 貴霜的族名、族源和族屬，《文史》第 38 輯（1994 年），pp. 18-28。

33 漢魏通西域路線及其變遷，《西域研究》，1994 年第 1 期，pp. 14-20。

34 前秦、後涼與西域關係述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4 年第 4 期，pp. 68-73。

35 西涼、北涼與西域關係述考，《西北史地》1994 年第 3 期，pp. 1-5。

36 第一貴霜考，《中亞學刊》第 4 輯（1995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pp. 73-96。

37 新疆出土文書劄記：I. 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緣禾”、“建平”年號；II. 關於“李柏文書”，《西域研究》1995 年第 1 期，pp. 77-81。

38 前涼與西域關係述考，《中國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pp. 139-144。

39 兩漢西域都護考，《學術集林》卷五，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pp. 214-242。

40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的綠洲大國稱霸現象，《西北史地》1995年第4期，pp. 1-7。

41《榎一雄著作集》第1—3卷《中亞史》(書評)，《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一卷(1995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pp. 381-389。

42 南北朝與西域關係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pp. 1-32。

43《後漢書·西域傳》與《魏略·西戎傳》的關係，《西域研究》1996年第3期，pp. 47-51。

44 說大夏的遷徙——兼考允姓之戎，《夏文化研究論集》，中華書局，1996年，pp. 176-196。

45《魏書·西域傳》原文考，《學術集林》卷八，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pp. 210-236。

46 允姓之戎考——兼說大夏的西徙，《中國國際漢學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pp. 673-711。

47 關於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的體例，《西北師大學報》1997年第1期，pp. 17-22，92。

48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南北道綠洲諸國的"兩屬"現象——兼說貴霜史的一個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pp. 1-5。

49《史記·大宛列傳》與《漢書·張騫李廣利傳、西域傳》的關係，《學術集林》卷一一，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pp. 162-179。

50 曹魏、西晉與西域關係述考，《文史》第43輯（1997年），pp. 61-71。

51 有虞氏的遷徙——兼說陶唐氏的若干問題，《炎黃文化研究（炎黃春秋增

刊)》第 4 期（1997 年）,北京: 炎黃春秋雜誌社,pp. 52-59,67; 第 5 期（1998 年），pp. 62-66，75。

52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族名、國名、王治名，《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pp. 238-251。

53 《梁書・西北諸戎傳》與《梁職貢圖》,《燕京學報》新 5 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pp. 93-123。

54 昆吾考，《中華文史論叢》第 58 輯（1999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pp. 245-257。

55 評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漢譯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署主辦《中國出版》1999 年第 4 期，中心插頁。

56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的里數，《文史》第 47 輯（1999 年第 2 期），pp. 31-48；第 48 輯（1999 年第 3 期），pp. 129-141。

57 讀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書品》1999 年第 4 期，pp. 29-34。

58 關於甘英西使，《國際漢學》第 3 輯，鄭州：大象出版社，1999 年，pp. 257-263。

59 犬方、鬼方、舌方與獫狁、匈奴同源說，《歐亞學刊》第 1 輯，中華書局，1999 年，pp. 7-28。

60 中國史籍關於希瓦和布哈拉的早期記載，《九州》第 2 輯，商務印書館，1999 年，pp. 157-160。

61 荀悅《漢紀》所見西域資料輯錄與考釋,《中亞學刊》第 5 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年，pp. 216-238。

62 馬雍遺作目錄，《中國史研究動態》2000 年第 3 期，pp. 26-29。

63 樓蘭、鄯善、精絕等的名義——兼說玄奘自于闐東歸路線，《西域研究》

2000 年第 2 期，pp. 32-37。

64 義渠考，《文史》第 50 輯（2000 年第 1 期），pp. 153-158。

65 漢晉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地望，《歐亞學刊》第 2 輯，中華書局，2000 年，pp. 37-72。

66 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1 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pp. 180-210。

67 讀華濤《西域歷史研究（八至十世紀）》，《書品》2001 年第 4 期，pp. 35-39。

68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山水，《史林》2001 年第 3 期，pp. 50-56。

69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宗教、神話傳說和東西文化交流，《西北民族研究》2001 年第 3 期，pp. 115-127。

70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吐魯番學研究》2001 年第 1 期，pp. 116-123；第 2 期，pp. 104-111。

71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制度和習慣法，《西北民族研究》2001 年第 4 期，pp. 5-14。

72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人口，《中華文史論叢》第 67 輯（2001 年第 3 期），上海古籍出版社，pp. 62-76。

73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人種和語言、文字，《中國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pp. 51-57。

74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社會生活，《西域研究》2002 年第 1 期，pp. 56-65。

75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物產，《揖芬集——張政烺

先生九十周年華辰紀念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5 月，pp. 437-453。

76 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地望，《歐亞學刊》第 3 輯，中華書局，2002 年 4 月，pp. 163-183。

77 魚國淵源臆說，《史林》2002 年第 3 期，pp. 16-20。又載山西省北朝文化研究中心主編《4-6 世紀的北中國與歐亞大陸》，科學出版社，2006 年，pp. 140-147。

78 有關嚈噠史的笈多印度銘文——譯注與考釋（劉欣如譯注），《西北民族論叢》第 1 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 12 月，pp. 44-66。

79 新發現的臘跋闥柯銘文和《後漢書·西域傳》有關閻膏珍的記載，《新疆文物》2003 年第 3—4 輯，pp. 43-47。

80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的認知和闡述系統，《西北民族論叢》第 2 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12 月，pp. 43-47。

81 《史記·大宛列傳》要注，《暨南史學》第 2 輯，2003 年，pp. 56-79。

82 《水經注》卷二（河水）所見西域水道考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2 集，2004 年 4 月，pp. 193-219。

83《梁書·西北諸戎傳》要注，《西北民族研究》2004 年第 2 期，pp. 93-104。

84 《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有關大秦國桑蠶絲記載淺析，《西域研究》2004 年第 2 期，pp. 14-16。

85 《周書·異域傳下》要注，《吐魯番學研究》2003 年第 2 期，pp. 54-72。

86 《後漢書·西域傳》要注，《歐亞學刊》第 4 輯，中華書局，2004 年 6 月，pp. 261-312。

87 《隋書·西域傳》的若干問題，《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004 年第 3 期，pp.

50-54。

88 渠搜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古史文存·先秦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11月，pp. 331-344。

89 隋與西域諸國關係述考，《文史》第69輯（2004年第4期），pp. 49-57。

90 《漢書·西域傳上》要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3集，2004年10月，pp. 125-178。

91 《隋書·西域傳》要注，《暨南史學》第3輯，2004年，pp. 92-123。

92 漢文史籍有關羅馬帝國的記載，《文史》第71輯（2005年第2期），pp. 31-96。

93 匈奴的崛起，《歐亞學刊》第5輯，中華書局，2005年6月，pp. 1-7。

94 裴矩《西域圖記》所見敦煌至西海的“三道”，《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pp. 16-24。

95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有關早期SOGDIANA的記載，《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法國漢學》第10輯），中華書局，2005年12月，pp. 276-302。

96 《通典·邊防七·西戎三》要注，《文史》第74輯（2006年第1期），pp. 139-160。（與李錦繡合作）

97 《魏略·西戎傳》要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pp. 43-61。

98《魏書·西域傳》(原文)要注，《西北民族論叢》第4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pp. 24-75。

99 宋雲行紀要注，《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pp. 565-591。

100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關於東西陸上交通路線的記載，《中國古代史論

叢——黎虎教授古稀紀念》，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pp. 242-251。

101 關於法顯的入竺求法路線——兼說智猛和曇無竭的入竺行，《歐亞學刊》第 6 輯(古代內陸歐亞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卷上)，中華書局，2007 年 6 月，pp. 138-154。

102 劉文鎖著《沙海古卷釋稿》序，中華書局，2007 年 7 月，pp. 1-3。

103《漢書·西域傳下》要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4 集，2007 年 8 月，pp. 187-233。

104 伊西多爾《帕提亞驛程志》譯介與研究，《西域研究》2007 年第 4 期，pp. 5-16。

105 《穆天子傳》所見東西交通路線，《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 3 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pp. 192-206。

106 希羅多德《歷史》關於草原之路的記載，《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 4 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pp. 11-23。

107 宋雲、惠生西使的若干問題——兼說那連提黎耶舍、闍那崛多和達摩笈多的來華路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5 集，2008 年 4 月，pp. 25-45。

108 馬小鶴著《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0 月，pp. 1-2。

109 托勒密《地理志》所見絲綢之路的記載，《歐亞學刊》第 8 輯，中華書局 2008 年 12 月，pp. 85-98。

110 《那先比丘經》所見"大秦"及其他，《歐亞學刊》第 9 輯，中華書局 2009 年 12 月，pp. 109-114。

111 "History of the Yeda Tribe (Hephthalites): Further Issues." *Eurasian Studies* I,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 pp. 66-119.

112 Αλοχον 錢幣和嚈噠的族屬，《中國史研究》2011 年第 1 輯，pp. 5-16。

113 《絲瓷之路——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發刊詞，《絲瓷之路——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創刊號，商務印書館，2011 年，pp. i-iii。

114 關於驪靬問題的劄記，《絲瓷之路——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創刊號，商務印書館，2011 年，pp. 235-244。